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著

赵 洵 译

# 致友人的 二十封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封面设计：毛国宣

内 部 发 行

书号：3190·008

定 价：0.66元

# 致友人的二十封信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 著

赵 洵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Аллилуева Светлана  
ДВАДЦАТЬ ПИСЕМ К ДРУГУ

\* \* \*

HARPER & ROW, PUBLISHERS  
NEW YORK AND EVANSTON

\* \* \*

TWENTY LETTERS TO A FRIEND

Copyright © 1967 by

Copex Establishment

(根据纽约“哈伯和罗出版社”1967年俄文版译出)

致友人的二十封信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 1/8 印张 160 千字

1979年12月第1版 197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40,000 册

统一书号: 3190·008 定价: 0.66 元

内 部 发 行





斯大林和女儿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



斯大林与妻子娜佳(左二)同伏罗希洛夫一家



七岁时的作者

## 为了纪念我的母亲

这些信是一九六三年夏天在离莫斯科不远的茹科夫卡村前后三十五天的时间里写的。不受拘束的书信形式使我能够推心置腹地叙述一切，所以，我认为我写的这一切是一种自白。

当时，我甚至于没有想到有出书的可能。

现在，当这种可能性出现的时候，我未做任何改动，虽然从那时候起已经过了四年，我也远离了俄罗斯。除了在整理付印时，对手稿所做的必要的改正，非实质性的删节和增加注释以外，本书还是当年在莫斯科我的友人阅读时的那个样子。

现在我希望每一位将读我这些信的人，都把这些信看作是写给他个人的。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

一九六七年五月于洛卡斯特谷

这里是如此寂静。离这儿只不过三十公里的地方，就是莫斯科。它像一座正在喷吐着火焰的人的火山，被欲望、野心、政治、娱乐、会见、痛苦、忙碌……的岩浆烤得灼热。那里正在召开世界妇女大会，举行世界电影节，跟中国正在谈判，新闻——从世界各地传来的新闻，从早到午，从午到晚，接连不断。……匈牙利客人刚刚抵达；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演员正在街头漫步；非洲妇女在国营百货公司选购纪念品……不管你什么时候去红场，那里都挤满了各种肤色的人们。每个人都把各自独特的命运，各自的性格和精神带到这里来。

莫斯科沸腾着，如波涛汹涌，忙得喘不过气来。它不断地在渴求新的东西：事件，新闻，轰动一时的消息。每个人，莫斯科的每个人，都想第一个知道最新的消息。这就是现代生活的节奏。

这里却是恬静的。

夕阳把树林和草地染成一片金色。这片树林是座落在奥金佐沃、巴尔维哈和罗马什科沃之间的一处小小的绿洲。这

里已经不再修建别墅和开辟马路。森林经过清理，林间空地上的野草已经刈倒，枯树也砍掉了。莫斯科人常来这里散步。正如广播和电视里讲的，“假日最好的休息”是野游：背上旅行囊，拄根手杖，从奥金佐沃车站步行至乌索沃车站，或者伊利因斯科耶，穿过我们的景色迷人的树林，取道幽静美妙的林间小径，越过峡谷、空地和白桦幼林……莫斯科的游客，花上三、四个小时在森林中闲步一番，呼吸呼吸它的氧气，于是，他会觉得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精神抖擞，浑身是劲，从操劳忙碌中休息过来了。于是，他把一束已经蔫了的野花插在郊区电气火车的行李架上，急急忙忙奔回那沸腾的莫斯科。可是从此以后，他将在很长一段时间老是劝你们——他的熟人：到树林中去闲步一番度过星期天吧！于是这些人，都将踏着小径，正好沿着我的篱笆墙，从我居住的这所房子前面走过。

三十七年的全部岁月，我一直居住在这片森林里，生活在这块地方。我的生活变了，这些房子变了，这都没有什么关系；森林依旧，乌索沃仍然无恙，那科尔丘加村，以及你可以登临环眺四野的村后的小山也都依然故我。一些村庄也还是老样子。村民们仍然从井里汲水，在煤油炉上烧饭，屋内隔墙可闻哞哞的牛叫，咯咯的鸡鸣，然而从那十分简陋的灰色的屋顶上，现在也立起电视的天线，姑娘们穿上了尼龙衬衫和匈牙利凉鞋。这里虽然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只要一下火车，你还是能够闻到芳草和桦树林的清香，一切都一如往昔：我所熟悉和珍爱的一片松林，依旧昂然挺立；通往彼得罗夫斯科耶和兹纳缅斯科耶去的路仍是那些乡间小径。这儿就是我的故里。

我的故里是这块地方——不是城里，不是克里姆林宫。我在克里姆林宫度过二十五年的岁月，它使我不能忍受。这才是我的故里。我死后，就让人们把我埋在这块地方，这罗马什科夫<sup>①</sup>的土地里，葬在车站旁小山上的墓地里吧！这儿多么开阔，可以极目远望，四周是田野和蓝天……山顶上还有一座古老而美丽的教堂。不错，它断了香火，已经破旧不堪，然而在教堂的围墙内，树木如此葱郁茂盛地生长起来，整个教堂悠然地处在一片翠绿之中，还继续祷告永恒的善降临人间。请一定把我埋葬在此处吧！不要把我葬在城里。决不。那儿令我窒息。

我把上面的想法告诉你，无比善良的朋友，我要告诉你，你会理解的。你想知道我的一切吗？对我的一切都感兴趣吗？那么你也应该了解这一点。

你说你对我的一切都有兴趣——有关我的生活以及我知道的、看见的周围的每一件事。我想，我周围曾发生过许许多多有趣的事，自然是许许多多。但是，过去曾发生过什么，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去思考曾发生过的事。那么，你是否也愿意和我一起去思考呢？

我将把一切都写给你。离别的唯一好处是可以写信。我将把我能写的和力所能表达的一切都写给你。今后的五个星期我将见不到你，我的朋友，我的理解一切和愿意理解一切的朋友！

---

① “罗马什科夫”俄语的意思是野菊花。（凡以序号为标志的注释，是译者所加，以下均同）

我给你的信将是很长的。你将在信中看到应无尽有的事物：肖像，速写，小传，爱情，大自然，著名的大事和小事，以及我了解的一切朋友和熟人的思想、言论和判断，这一切将是五光十色的，未加整理的，不是井井有条的，这一切将向你倾注，会使你感到意外，我的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

看在上帝的分上，请不要认为我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很有意思的。正好相反，就我这一代人来说，我经历过的生活真是非常的单调，乏味极了。也许，当我把一切都写完之后，某种难以忍受的重负终于会从我的肩上卸下来，那时，我的生活才是刚刚开始吧……我暗暗希望能够如此，这是我珍藏在心灵深处的一个希望。我背负着的这块石头已经使我疲惫不堪，也许我终将把它甩掉。

是的，我这一代的同庚人经历过的生活与我比起来要有意得多，特别是那些比我大五、六岁的人，他们都是最出色的人，他们壮志满怀，一腔热血，走出大学的课堂，奔赴卫国战争的疆场。他们之中能活下来而又回来的人不多，那些回来的都是时代的精华。他们是我们明天的十二月党人。他们还将教导我们大家应该怎样生活。他们将发表他们的意见，这是肯定的。俄罗斯是如此渴望听到聪明智慧的言论，俄罗斯殷切地期待新的言论和行动。

我永远赶不上他们。我没有建树过任何丰功伟绩。我从来没有成为舞台上的演员。我的生活都是在幕后度过的。然而幕后不也很有趣吗？

幕后是半明不暗的。从那里你能看到观众在鼓掌，他们



欣喜欲狂、目瞪口呆、全神贯注地听着台词，被耀眼的五彩灯光和布景照得睁不开眼睛。在那里也能看到演员在扮演各种角色：沙皇，上帝，奴仆，跑龙套。你可以看到他们什么时候在演戏，什么时候像常人一样地相互谈话。幕后是半明不暗的，有老鼠、胶水和陈旧的布景的气味。不过在这里进行观察是多么有趣呀！在幕后生活的有：化妆师，提词人，服装管理人员。这些人无论如何不愿意改变他们自己的生活 and 命运。没有人比他们更懂得人生不过是个大舞台，懂得在这个舞台上，并非人人都能扮演他们预定想要充当的角色。戏正在演着，激情沸腾，英雄挥舞利剑，诗人朗诵颂歌，沙皇在加冕，古堡在倒坍，一眨眼古堡又升起，雅罗斯拉芙娜<sup>①</sup>在要塞旁像布谷鸟般地哭泣，仙女和魔鬼在飞翔，国王在显灵<sup>②</sup>，哈姆雷特忧思万千——而人民沉默无言<sup>③</sup>。

1963年7月16日

- 
- ① 雅罗斯拉芙娜是俄国故事《伊戈尔远征记》中伊戈尔的妻子。当伊戈尔被俘后，雅罗斯拉芙娜在要塞城边“像布谷鸟”那样哭泣。
- ② 指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中的国王显灵。
- ③ “人民沉默无言”出自普希金的诗剧《鲍里斯·戈东诺夫》。该剧最后一幕中，臣民被召来歌颂、赞美王位凯觐者季米特里。普希金把这场戏题名为“人民沉默无言”。

# 1

我的故事是很长的，这些信也将是很长的。我先讲一件后面发生的事情，然后再回过头来从头说起。请千万别把这本书看作一部小说，一本传记，一本回忆录，它将不会有连贯的叙述。

现在是一个美妙的清晨，森林中的早晨。鸟儿在歌唱，阳光透过浓密的绿叶洒进幽暗的森林。今天我要从结尾说起，谈一谈 1953 年 3 月初我在父亲家中度过的日子，那时我正守着垂危的父亲。真是像现在人们所说的那样，这是某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吗？这用不着我去判断，我们以后将会看见。我关心的不是时代，而是人。

那些日子是可怕的。我觉得：我脚下的稳固坚实而又熟悉的大地晃动起来了。这一感觉开始于 3 月 2 日。这一天，有人把我从社会科学院的法语课堂里叫了出来，告诉我说：“马林科夫要你到勃利日尼去”（“勃利日尼”俄语词意是“近”的意思，是我父亲在孔策沃的别墅的名字，用以区别他的较远的一些别墅）。除了我父亲，从来还没有任何别人请我到他的别墅

去。这本身已经是很不寻常的事。我怀着异常心慌意乱的感觉到那里去了。

当我们驶进大门，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以手示意让汽车停在房前的甬道上时，我感到一切都完了……我从汽车里一出来，他们就挽住我的手臂。他们两人都满面泪痕，对我说：“我们进去吧！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会告诉你一切的。”

一到前厅就已经感觉出来，整个房子里跟往常完全不一样了。大家习惯的肃静，那种人人敛声屏息的肃静不见了，有人在跑来跑去，忙乱不堪。终于有人告诉我：父亲在夜间中风后一直失去知觉。这时我反倒心安了一些，我原以为他已去世了。

人们告诉我说：似乎是夜里中风的，他们是凌晨三时左右在这间房里发现他的，就在这儿，躺在沙发旁边的地毯上；他们决定把他抬到隔壁房间，放在他通常睡觉的沙发上。此刻他就躺在那里。医生也都在那地方。有人对我说：“你可以进去。”

我迷迷糊糊地听见有人说话，我此刻已经呆若木石了。许多细节对我不再有什么意义，我能领会的只有一件事：他就要死去了。我虽然还未和医生交谈过，但是对父亲行将辞世我已毫不怀疑——这时我已经看见周围的一切，这整个的家，这一切的一切都正在我的眼前死去。在整个三天中，我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我很清楚，别的结果是不会有有的。

我父亲躺着的大厅里挤满了人。我从来不认识的、初次为他治病的医生们（许多年来一直照料我父亲的伏·尼·维诺

格拉多夫院士正关在狱中)在他周围正忙得不可开交。他们把蚂蝗放在他的颈上和脑后,作心电图,透视肺部。一个护士不断地给他注射,一个医生不停地把病情记在本子上。一切的一切都照该做的那样做着。人人都在忙于试图拯救一个再不能挽回的生命。

医学科学院正在某处召开一次特别会议商量进一步措施。隔壁的小厅里不停地开着另一个医疗会议,也是决定该怎么办。从某一个科学研究所取来了一套人工呼吸设备,几个年轻的专家跟来了,看来除了他们,别的人都不会使用它。那套笨重的机械放在一边闲着,而年轻的医生们只是目瞪口呆地望着周围发生的一切,完全被眼前发生的事情压得心情十分沉重。忽然间,我发现好像认识一位年轻的女医生,可是,我在什么地方见过她呢?……我们点点头,什么也没有说。没有人说话,大家都保持着沉默,像在庙堂里一样,任何人也不说无关的事情。人人都感到这间房里正在发生一桩非常事件,一桩非常重大的事件,因而一举一动都恰如其分地行事。

只有一个人行为举止几乎有失体统,那就是贝利亚。他激动万分,他那张本来就使人厌恶的脸,此刻因强烈膨胀起来的欲望而变得歪扭不堪。他有着强烈的欲望:他图虚荣,残暴,狡猾,他需要权力,权力……在这责任重大的时刻,他竭力控制着自己不要狡猾过头,也不至于不到火候!一切都明明白白地写在他的脸上。他走近病榻,久久地注视着病人的脸。我父亲有时睁开眼睛,但显然处于没有知觉或半知觉状态。这时贝利亚一动不动地凝视父亲知觉模糊的眼睛,此时此刻,他

还想表示他是“最可靠的，最忠心的”，一如他曾经不遗余力地使父亲相信的那样。不幸的是，他的这种伎俩处处得逞已为时太久了。

在最后几分钟，当一切即将结束之际，贝利亚突然瞧见了 我，他命令说：“把斯维特兰娜带出去？”站在我周围的人眼睛望着他，但没有人动弹。这一时刻刚过，贝利亚就第一个跳到过厅上，这时大厅一片寂静，人们还在这里默默地伫立在死者临终的榻前，此时传来他那带着不加掩饰的胜利者的高嗓门的喊叫声：“赫鲁斯塔廖夫，来车！”

贝利亚这号人在巧言令色的侍臣中是一个杰出的现代标本，在他身上体现了东方式的奸诈阴险、谄媚逢迎和口是心非，甚至连通常不易受骗如我父亲那样的人，也被他所蒙蔽。这个多头毒蛇干出来的许多罪行，现在玷污了我父亲的名字。在许多事情上，他们共同有罪过；但也有许多事情，我毫不怀疑是他狡猾地捉弄了我的父亲，而事后他却掩面窃笑！这是全体“上层”都知道的。

现在，他内在的一切毒恶的东西都翻出来了，再也无法抑制他自己了。不只我一个人，很多人都理解这一情景，然而他们怕他怕得要死。他们知道当我父亲弥留之际，在俄罗斯再没有人比这个可怕的人握有更大的权力和力量。

像医生诊断的那样，父亲失去了知觉。这是极厉害的中风。他的右体瘫痪，丧失了说话能力，他几次睁开眼睛，但眼神犹如云雾，没有人知道他是否还能认出什么人。每当他睁开眼睛，他们都朝着他俯下身去，力图听到一个字或者哪怕是

从他的眼睛里察看出他的意愿。我一直坐在他身边，握着他的手，他望着我，很难说他是否还能看见我。我除了吻他，吻他的脸和手，再无别事可做了。

奇怪的是，在他得病的那几天（此刻他的灵魂已经飞去，只剩下了躯体），以及随后在圆柱大厅向遗体告别的日子里，我爱父亲是那样强烈和温柔，胜于我一生中的任何时候。他和我十分疏远，和我们——他的所有的孩子们以及一切亲人都是疏远的。最后这几年，一些孩子们的巨幅放大照片出现在他别墅的一些房间的墙上——一个小男孩在滑雪，另一个男孩站在繁花盛开的樱桃树前。然而在他的八个孙儿、孙女、外孙、外孙女中，竟有五个他没有时间（连一次都没有）找来见上一面。可是连从来未见过面的孙儿、孙女、外孙、外孙女也都爱他，现在仍然爱他。在那些日子，当他终于安息在临终的卧榻之上时，他的面容变得美丽而安详。悲痛和爱使我的心都碎了。

我以前从来没有，以后也没有经受过如此强烈而又矛盾的感情冲击。几乎所有这些天，当我呆呆地、无言地站在圆柱大厅里的时候（我一直站着，不管怎么敦促我坐一下，甚至于把椅子推到我身后时，我面对眼前发生的事物，无法坐下，只能站着），我懂得某种解放正在来临。我还不知道，也没有意识到是什么样的解放，它将以何种形式出现，但我明白，这是一种解放，它对所有的人说，对我也是一样，是摆脱一种共同的压迫，这种压迫像一块巨石，压在一切心灵、精神和思想上。与此同时，我凝视那美丽的容颜，它安详而又显得忧

伤；听着哀乐（这是一支古老的格鲁吉亚民间摇篮曲，旋律悲切而富有表现力），感到悲痛欲绝。我觉得自己是个完全无用的女儿；而且从来也不是一个好女儿，我住在家中，如同路人。对这一寂寞的心灵，这位多病的，被一切人所遗弃的，住在自己的奥林匹斯<sup>①</sup>山上的孤独的老人，我从未予以帮助。然而，不管怎么说，他却是我的父亲，他爱过我，曾尽他所能爱过我，而且他使我得到的不仅仅是恶，而且也有善……

这几天，我什么东西也没有吃，也哭不出来，一种顽石般的冷静和悲哀压着我。

父亲死得很困难，很可怕。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暂时也是唯一的一次看着人死去。上帝只赐给善者以毫无痛苦的死亡。溢血症从大脑逐渐扩散到所有的神经中枢。他的心脏是健康强壮的，因此溢血一点一点地影响到呼吸中枢，造成窒息。他的呼吸越来越短促。在最后十二个小时缺氧现象已经明显地在发展，脸色变暗，面容也变了，逐渐地变得不能认识，嘴唇发黑了。最后的一两小时简直就是缓慢地被憋死的。濒死的痛苦十分怕人。大家眼看着这种苦楚把他闷死了。有这么一瞬间，我不知道是否实际是这样，我觉得显然是在最后一分钟，他忽然睁开眼睛，目光扫过站在他周围的每一个人。那目光十分可怕，显示出好像是疯狂，也许是愤怒和充满对死亡以及俯身在他脸前的医生的陌生面孔的恐惧。这一瞬间，这一目光扫过了每一个人。然后，一种无法理解的和可怕的情景出

---

① 奥林匹斯山为希腊神话中宙斯等诸神居住的仙山。

现了，至今我也不明白，但也不能忘记，他突然举起左手（是那只能动弹的手），好像指向上空某处，也好像威胁着我们每一个人。那手势是无法理解的，但是充满威胁，没有人说得他指的是什么和指向谁……紧接最后一次挣扎之后，那灵魂终于挣脱了肉体。

我觉得自己快要憋死了。我紧紧抓住站在我身边的那位我认识的医生，她因为给我抓得很痛而呻吟了一声，我们两人紧紧靠在一起。

灵魂飞去，肉体安静下来。面容变得惨白，回复到平日所熟悉的模样，几秒钟后变得平静、安详、美丽了。他周围的人呆呆地默然地站了几分钟，我不知有多少分钟，好像很久，很久。

随后，政府成员一齐奔向门口。他们必须去莫斯科，到中央去，人们都在那里坐等消息呢。他们去通知那人人内心中暗暗等待的消息。说句公道话，和我一样，他们的心也被忧伤和解脱这两种矛盾着的感情撕碎了。

除了那个唯一的败类贝利亚以外，在这些日子里，这里所有的人都忙忙碌碌，愿意出一把力，与此同时心中又惴惴不安，结局会怎么样呢？这些日子许多人流了真诚的眼泪。我看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都眼含泪水。事实是，除了一个共同的事业把他们和父亲联系在一起之外，父亲那天赋的、非凡的性格所具有的魅力是如此巨大，它能抓住人们，使他们仰慕，而无力抵抗。许多人亲身经历过因而知道这一点，虽然有些人现在装出一副样子，好像



他从未感受过这一点，也有些人没有做出类似的样子。

最后，所有的人都走了。遗体还躺在原来的卧榻上，要停放几小时，这是一种风俗习惯。大厅里剩下布尔加宁和米高扬未走，我也留下了，坐在靠对面墙的沙发上。有一半的灯都已熄灭，医生都回家了，只留下一个护士，她是个老护理员，我在克里姆林宫医院已认识她很久了，她这时正在轻轻地收拾屋子中间那张大餐桌上的东西。

这间大厅曾是举行盛大宴会的地方，也是政治局小圈子里的人常来的地方。这张餐桌是他们边进午餐或晚餐，边商量和决定国家大事的地方。到我父亲这里来“吃饭”，这就意味着来决定这个或那个问题。这房间的地板上铺着大地毯，靠墙是沙发和安乐椅，墙角上有个壁炉，我父亲喜欢冬天有火。另一角放着唱机和唱片，我父亲收藏了很多俄罗斯、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民歌，他除了民歌不承认还有别的音乐。他在这间房里度过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段岁月，差不多是二十年。此刻，这个房间正在告别它的主人。

我父亲的服务人员和警卫人员来此和他告别，他们都怀着诚挚的感情和真正的悲伤。厨师、司机、警卫、值班调度人员、园丁以及一向侍候在餐桌左右的女服务员都轻轻地走了进来。他们默默地走到榻旁，都哭了。他们像孩子那样用手，用袖子、头巾擦着眼泪。许多人哭得抽抽噎噎，女护士一边流泪，一边把**缬草酊**①给他们服下。可是我在旁边看着这一切，

---

① 缬草酊是一种强心剂。

坐一会儿，站一会儿，就像块石头，连一滴眼泪都没有……我不能离去，只是看着，看着，我的眼睛只能看着他。

瓦连琴娜·伊斯托明娜(人们叫她瓦列奇卡)在这所别墅里跟我父亲十八年，这时来告别。她扑通一声跪倒在沙发旁，把头放在死者胸上，像村妇那样嚎啕大哭起来。她哭了很久，谁也不想去阻止她。

所有这些侍候过我父亲的人都爱我父亲。他在生活上不难侍候。相反，他生活朴素，简单，平易近人，对服侍他的人很有礼貌，如果说他也责骂人的话，那只是对“首长们”，对警卫部队里当将军的，当警卫长的。服务人员都不能说他任性和残暴，相反，他们倒常请他帮助办点事情，也从来没有遭到他的拒绝。最后这几年，比起我来，瓦连琴娜和其他服务人员对他的事知道得更多，也见得更多。我不住在这里，对父亲也很陌生。在这张大餐桌旁，瓦列奇卡见过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她总是侍候这些盛大宴会。她也见到过许许多多有趣的事(当然只是在她那狭小的眼界之内)，现在，我们见面的时候，她还十分生动地、有声有色地、幽默地对我讲述。她和所有给我父亲做过服务员的人一样，至死都相信世界上再没有比父亲更好的人。任何东西，任何时候也不能改变他们的这种信念。

深夜，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凌晨，来人搬运遗体去作解剖。一阵神经性的痉挛使我全身颤抖。如果能流出眼泪，大哭一场也会好些！不，只是浑身发抖。抬来了担架，把遗体安放在上面。我第一次见到父亲裸着的身子。那是一具美丽的身躯，

一点不衰老，不像老年人的身体。像一把刀子刺进我的心脏，感到一阵奇怪的疼痛，这时我才感受和理解“血肉相联”的道理。于是我意识到那个赋予我生命的肉体已经不再有生命，不再呼吸了，而我还要继续活下去，活在这个世界上。

当你还没有亲眼看到生育你的人死亡之前，你永远不会理解这一切。如果你想理解什么是死亡，你就要看见它，哪怕只看一次，看见“灵魂”如何“飞去”，又如何留下易腐的肉体。当时，这一切我并不是理解到的，而是感受到的，这一切掠过我的心头，在我的心上留下了它的烙印。

遗体运走了。一辆白色的汽车开到别墅门前，于是大家都出来了。那些站在外面和台阶上的人们一齐脱下帽子。我站在门口，有人给我披上一件大衣，我仍在全身发抖。这时有人抱住了我的肩，原来是布尔加宁。汽车门砰地一声关上，车子开走了。我把脸偎在布尔加宁的胸上，终于大哭起来。他也哭着，一面抚摸我的头。大家都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开始散去。

我走进服务人员住的厢房。这厢房和正房由一条长长的走廊连接着，由厨房端食物出来要由此经过。所有留下来的人——护士、服务人员、警卫都聚集在这里。我们坐在服务人员的食堂里。这是一个大房间，里面有一架收音机，一个酒柜。这些人一遍又一遍谈论着这一切都是怎样发生和经过的。有人一定要我吃点东西。他们说：“今天日子不好过呢，你又一点也没有睡，很快就得到圆柱大厅去，你养着点身子吧！”我吃了点东西，在小沙发上坐了一会儿，时间已是清晨五点钟。

我朝厨房走去。在走廊上我听到有人大声哭泣，这是在浴室冲洗心电图的那位护士，她泣不成声，哭得那样伤心，就好像她的全家都一齐死了似的……别人对我说：“你瞧，她把门锁上，已经哭了好半天了。”

大家都坐在食堂里，好像是无意识地等待着同一件事。过一会儿，早上六点钟，无线电台将广播一条我们已经知道的消息。然而人人都需要听到它，似乎不如此，我们就不能相信似的。终于到了六点钟。于是，列维坦的很缓慢的声音，也许是听起来像列维坦的声音开始了。这个声音总是宣告重大事件的。于是大家都明白：真的，这是真的，这件事确是发生了。于是所有的人，男的，女的，大家都又重新哭起来……我也嚎啕大哭。略使我宽慰的是，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所有的人都明白刚刚发生了一桩什么事情，而且他们正在和我一起哭泣。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真心实意，没有虚伪，没有人想在别人面前故作一番忠诚或悲痛的表演。大家都是彼此多年相识。他们也都了解我，都知道我是一个坏女儿，我父亲是个坏父亲。他们也清楚父亲毕竟爱我，我也爱他。

这里没有人把他看作上帝，超人，天才，也没有人把他看作恶人，他们爱他，尊敬他，是因为他有着一般人的品德，在这方面，仆人们的判断总是正确无误的。

## 2

为什么今天我写给你的正是这件事？为什么我正是想从这里开始？

从那时到现在十年过去了。十年，对我们这急风骤雨般的超音速时代来说，不是很短的时间。从那时起我再没有回过孔策沃那阴森的别墅，也没有去过克里姆林宫。没有什么东西能吸引我去看看这些地方。我父亲从来不爱东西，他过的是清教徒式的生活，从东西上表现不出他的性格，他身后遗下的房子、房间、寓所，都不能表现出他这个人。

我喜欢回忆的地方是我母亲住过的家：我们直到 1932 年以前，在克里姆林宫住过的旧寓所和位于乌索沃附近的别墅祖巴洛沃，这里的一切都能感到母亲的细心安排。这些以后再谈。

十年过去了，我的生活很少改变。和以往一样，我生活在父亲盛名的荫庇之下。和他在世时一样，我和我的孩子们过着比较有保障的生活。其它方面也没有变化：一些人关怀，一些人憎恶，所有的人毫无例外地对我抱有好奇心，应得和不应

得的烦恼和激动，以及那许许多多的受之有愧的向我表示的热爱和忠诚——所有这一切都从四面八方压挤着我，依然如父亲在世时那样。我没有能力冲破这些牢笼。

他人已不在了，可是他的影子仍然继续笼罩着我们所有的人，而且还经常继续操纵着我们，而我们则经常还是按着他的指令办事。

可是生活处处都在沸腾。整整一代人成长起来了。对于这一代人来说，斯大林的名字几乎是不存在的，和这个名字有关的许多其它的事物，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也都不存在。这一代人将带来某种我们所不知道的生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们正拭目以待。人们想要幸福，利己主义的幸福，他们要求鲜艳的色彩，明快的声音，五彩缤纷的礼花，火一般的热情。还不只这些，我知道：他们还要文化与知识；他们要求俄罗斯最终也能有欧洲式的生活；他们想讲世界各种语言；要看一看世界各地，对此他们如饥似渴，急不可待。他们想要舒适，想要漂亮的家具和衣服，不要土里土气的箱子，不要俄式粗呢上衣。他们要换上一切外国的东西：衣服、发式、理论、艺术、哲学思潮统统都要，对自己的成就，自己的俄罗斯的传统，则都无情地予以抛弃。过了这么多年清教徒式的生活，斋戒了这么久之后，经过这么多年的闭关自守、与世隔绝之后，当这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的时候，难道能对这一切加以谴责吗？

不，我不必去谴责这一切。即或我不喜欢抽象艺术，我也能明白，这种艺术不仅对无知无识的孩子们，而且对很聪明的

头脑也具有吸引力。我不必同抽象艺术去辩论，我也不会去和他们辩论，因为我知道，这些人们对现在和将来的感觉都比我敏锐。为什么要妨碍他们去想他们愿意想的事呢？

其实可怕的并不是这些，并不是在这些方面的兴致和热情。可怕的是无论对新的、旧的、本国的和外国的都一概不知道，而且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无知状态。可怕的是无知地认为，我们今天已经取得了一切；只要生铁再多四倍，鸡蛋再多两倍，牛奶再多三倍，那么这个没有出息的人类所梦寐以求的人间天堂就真的成为现实了。

请原谅，我扯得太远了……这是因为我想，这过去的十年中，我的个人生活很少变化。我把全部的时间都用于思考往事，力求了解它的意义，想得简直快傻了。这难道不正是可怜的哈姆雷特所干的事吗？他不是因此而看不起自己吗？

我继续过着奇怪的，无所做为的，具有两重性的生活。和十年前一样，我的生活仍旧是：表面是一回事，内心完全是另一回事。表面上和从前一样，我的生活是安定而有保障的，处于“上层”的大树和叔叔阿姨们的荫庇之下，然而我的内心生活，和以前一样，和他们在兴趣、习惯、精神、事业、语言、文字上完全格格不入，不过我今天的这种感觉比以前更加强烈罢了。当我把我的生活逐渐形成的过程向你倾吐之后，你将明白，过去也好，现在也好，结果必然如此。

我是不会、也不能写我自己不知道或未亲眼见过的事情的。我不是写评论的作家。我从未打算去写一本父亲的传记，这样的传记至少得包括上世的二十年和本世纪的五十年，

我只能判断我目睹的或亲自经历过的事，或至少是我能理解的那些范围以内的事。我可以写我在家中和父亲一起度过的二十七年，写那些曾经常常出入我们家的人，和我们家关系密切的人，写我们周围的一切，以及形成我们的生活方式的事物，我还可以写这种生活方式中的形形色色的人们，以及他们因各种利害关系而发生的冲突，也许我还能写些旁的什么……

这一切只组成我父亲生活的一小部分，大约有三分之一吧，而且在总的生活中只占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也许只是微观的部分吧！但是，生活也需要通过显微镜去观察，因为我们已太习惯于在“基本上”，“在总的方面”去判断事物。肤浅的教条主义和不近情理难道不是由此产生的吗？

可是，我们家庭的生活，那社会中的微小部分，是很有特色的，正如文学评论中常说的，是很典型的。

二十世纪，革命把一切都搅乱了，一切都改变了位置。富和贫，贵族和穷人的位置也变换了。然而，尽管有这一切再安排和变动，财富被剥夺和重新分配，俄罗斯依旧是俄罗斯，它仍然必需生活下去，建设自己，向前发展，努力取得新的东西，不落后于他人，赶上甚至于超过他人……

也许在这共同的志向中，在这共同的洪流中，就是生活，那么在家庭的记事中，片断中，从那些和我们关系密切，但不为外人所知晓的人物的肖像中，也能找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你说：一切都是有趣的。这一切对你来说都是有趣的。但我不相信别人对它也有浓厚的兴趣。当然，出于好奇心，大家都



想知道这些。

离孔策沃不远就是那幢阴森的空房子。我母亲去世后，父亲就在这幢房子里度过了他最后的二十年。我曾说过：父亲的东西不能反映他的为人，因为东西对他是无所谓的。也许我这样说不对吧？不管怎么说，这幢房子总有些像他最后二十年的生活。但这房子没有什么和我连在一起的东西，我从来就不喜欢它。

这幢房子是建筑师米·依·梅尔让诺夫 1934 年建造的，他给我父亲在南方修造过好几处别墅。原来这幢房子盖得很出色，是一幢现代化的轻巧的平房，它安卧在花园、森林、一片繁花之中。整个房顶是一片宽敞的，作日光浴用的平台，我多么喜欢在平台上散步或跑着玩啊！

我记得当时我们全家人都来看这幢新房子，一片欢声笑语。我母亲的姐姐安娜姨妈和她的丈夫斯坦尼斯拉夫·雷登斯来了，我母亲的哥哥巴维尔舅舅和他的妻子叶芙根尼娅·亚力山得罗芙娜、斯瓦尼泽舅舅和玛丽亚舅妈、我哥哥雅可夫（雅沙）和瓦西利等人来了。当时，还和母亲在世时一样，充满了欢乐，济济一堂。大家都把孩子带来了，他们嘻笑玩闹，父亲也很喜欢这样。我母亲的父母——外祖父和外祖母也来了。那样说是完全不对的，说母亲去世后，她的家人和父亲断绝了来往，正相反，他们都尽量设法使他愉快，解除他的痛苦，体贴他，父亲对他们也很亲切热情。

然而贝利亚的夹鼻眼镜已经在某个房间的角落里闪闪发光，虽然那时他还不声不响，不露锋芒，而且也很谦虚朴

索……他不时从格鲁吉亚来，向父亲顶礼膜拜，而且还为看新别墅来过一次。当时和我们关系亲密的人，没有不憎恨他的，首先是雷登斯和斯瓦尼泽两家，早年他在格鲁吉亚“契卡”<sup>①</sup>工作时，他们就很了解他了。在我们亲人的圈子里，有着对他一致的憎恶并怀着一种莫名的恐怖。据父亲告诉我，妈妈早在1929年就“大闹过一场”，说“她要求一定不许这个人进我们的家门”。

这是我长大后父亲对我说的，而且解释道：“我问她：贝利亚到底有什么不对头？拿出事实来！你没有能说服我，我没有看到事实！可是她一个劲儿地喊：‘你还需要什么样的事实！我看他就是个坏蛋！我不能和他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那时我对她说：‘去你的吧！他是我的同志。他是一个优秀的“契卡”人员，他用先发制人的办法帮助我制止了格鲁吉亚的米格列尔<sup>②</sup>人的叛乱。我信任他，我需要事实！’”

可怜的妈妈！聪明的妈妈！事实是以后才暴露的啊……

总之，当时我们孔策沃的勃利日尼别墅宾客盈门，人人都欢欢喜喜，高高兴兴。

如今，再也无法认出当年的房子了。按照我父亲的计划，这幢房子改建了多次。也许他无法得到心灵的平静吧！因为每次都是这样的：不管他到南方什么地方去休假，等到下一个休假季节来临之前，那里整个他住过的房子都经过改建了。不是嫌阳光太少，就是需要在阴凉处有个平台。如果是平房，

---

① “契卡”全称是非常委员会，即肃反委员会。

② 米格列尔人为格鲁吉亚西部山区的民族。

那么就再增建一层；如果是二层楼房，那么，就拆掉一层。

孔策沃的勃利日尼别墅也是如此。现在它是一幢二层楼房。我父亲既然是一个人住在这里，那么二层楼就根本没有入住过。也许他曾经想把我和哥哥，以及他的孙儿们搬到二层楼住吧？我不知道，可是他从来没有对我们说过。二层楼是1948年增建的。次年，1949年，他在二楼的大厅里为中国的一个代表团举行过一次盛大招待会，此后，二层楼就再没有使用过。

我父亲一直住在一楼。事实上，他只住一间房子，他的一切活动都在这间房子里。他在沙发上睡觉，到晚上就在沙发上给他铺好卧具。旁边放着一张小桌子，桌上放着工作必需的几架电话。这里有一张大餐桌，上面堆满文件、报纸和书籍。没有外人时，他就在这张桌子的一头吃饭。房里还有一个酒柜，放着餐具，有一格放着药品。我父亲自己选择他要吃的药，他所承认的医学界的唯一权威是伏·尼·维诺格拉多夫院士，这位医生曾每年给他看一、两次病。他房间里铺着一条又大又柔软的地毯，有一个壁炉，这就是我父亲仅有的奢侈品和舒适的享受，这是他所喜欢的和同意用的。从前梅尔让诺夫设计的办公室、卧室、餐厅都按这间房子的规格进行了改造。偶尔我父亲搬到其中一间去住，他也就把他所习惯的生活方式带到那里去。

战后，我父亲最后的这些年中，全体政治局委员几乎天天都来此进“午餐”。他们就在这个大厅里吃午饭，在这里接待外宾。我很少到那里去，我在这里见到的唯一外宾就是约瑟

夫·布罗兹·铁托,那是在1946年。但是,大概兄弟共产党的所有其他领导人,如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都到这里来过。1953年3月我父亲就安息在这个大厅里,靠墙的那张沙发就是他临终之榻。

当时,梅尔让诺夫曾安排了几间“儿童室”。但是后来这几间房子被改建成一个统间,和其它房间一样,已经毫无特点,里面放上一张沙发,一张桌子,铺上了地毯。曾经安排作卧室的一间干脆改成了穿堂,摆着一个书橱和一个衣柜。一架三角钢琴也放到这里来了,因为放在父亲住的大厅里会妨碍他。这架钢琴什么时候,以及为了什么原故出现在我们家的,我不知道,十分可能从来没有人用过它。

这幢房子令我喜爱之处,是它那美丽的花园和四面环绕的凉台<sup>①</sup>。从春到秋我父亲都在户外凉台上度过。有一个凉台四面都安装了玻璃,另外两个是敞着的没有装玻璃,一个有顶,一个露天。他晚年特别喜欢西边的小凉台,从这里可以欣赏落日的余晖。西凉台面对着花园。另一个玻璃花厅也面向花园,是最后这几年增建的,由此举目可见满园盛开的樱花。

花园、花卉以及四周的树林是父亲的爱好,是他的消遣、休息和乐趣。他从来不像真正的园艺爱好者那样,拿起铁锹,

---

① 俄国旧式平房,多建有凉台,这是比阳台宽大的房间,有的四面都装着玻璃窗,有的不装,基本都有顶,是夏天吃茶的地方。另外有一种与阳台类似的设施叫做花厅,是冬季放花用的,有取暖设备,四面都是玻璃。阳台较小,多在楼上。

翻土挖地，可是他喜欢园子里种满花草树木，收拾得整整齐齐。他喜欢繁花满树，喜欢随处可见鲜红熟透的樱桃、苹果、西红柿；他要求园丁做到这一切。偶尔自己也拿起花剪修整一两条干枝，这就是他在园里干的唯一的活儿。花园里，森林中，也象在森林公园中一样，修了枝，割了草，到处是各种消暑小亭，有的有顶，有的露天，有的什么也没有，只有地板一块，上面放着一张桌子，一张躺椅，一个柳条矮榻。父亲总是在园中徘徊，似乎在为自己寻觅一处舒适而安静的地方，然而终无所获……夏天他整天这样在园中徘徊，留连忘返，叫人们把文件、报纸和茶送到园中，这也是他的一种“奢侈”，他认为这是一种“奢侈”，然而希望享有的一种“奢侈”。在这上面表现出他对生活有着健康的情趣，他对大自然，对土地怀着无穷的爱恋；这也是他的唯理论，在晚年他想健康长寿。

我最后一次去孔策沃是父亲生病的时候，去世前两个月。使我深感意外而且不甚愉快的是，他墙上挂满似乎是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儿童放大像片——一个小男孩在滑雪，一个小女孩捧着角制杯子给一只小羊喂牛奶，有一群孩子在樱桃树下玩耍，诸如此类；大厅里出现了画家亚尔-克拉夫钦科的一整套作品（尽是复制品，不是真迹），画的是苏维埃作家：有高尔基、肖洛霍夫，还有一些什么人记不清了。还有一幅列宾的《扎波罗什人对苏丹的答复》复制品，镶在玻璃框子里，也挂在这儿。父亲非常喜欢这幅画，而且津津乐道地对随便什么人去背诵《答复》里的那些下流话。墙上更高的地方，还挂着一张列宁的画像，也并非一幅优秀的作品。

对我来说，这些现象很不习惯，也觉得奇怪。因为，总的说来，我父亲从来不喜欢绘画、照片这类东西。只是在我母亲亡故之后，在市内我们家里，父亲的办公室和餐厅挂着母亲的巨幅照片。可是父亲并不住在这个寓所，实际上这也不说明任何问题。一般说“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这一公式，也不知是谁胡想出来的。这个说法只能表示：我父亲的办公室在克里姆林宫，他在那里工作，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和部长会议大楼里工作。

父亲一死，孔策沃这个家就经历了奇怪的事变。这个家的主人去世的第二天，人还没有安葬，根据贝利亚的指示，孔策沃的全体服务人员和警卫人员，以及在别墅工作的整个班子都被召集在一起，吩咐他们立即将父亲的遗物全部搬走，谁也不知道搬往何处；而全体人员也都得离开这个地方。

没有人有可能和贝利亚争辩。什么也不明白、完全不知所措的人们收拾我父亲的遗物，他的书籍、家具和餐具，他们含着眼泪把这东西装上卡车。东西都被运走了，大约是送往某个仓库去了吧？当时国家保安部和克格勃有的是这类仓库。忠心耿耿地在这里工作过十年、十五年的服务员都被抛出大门。全体统统被赶得各自东西，警卫部队的军官们都调往其它城市，其中有两个人在这些日子里开枪自杀。人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明白他们犯了什么罪，为什么向他们大兴问罪之师。唉！很不幸，这是我父亲自己批准的制度：他的家里全部人员都是国家保安部的工作人员，人人都得绝对服从上级的任何命令。当时这一切都没有和我打过任何招呼，这

些我只是后来才知道的。

1955年贝利亚自己“垮台”之后，又着手恢复父亲的旧居，遗物又被运了回来，过去的服务员和警卫长被请回来协助把东西放置到原来的地方，使房子恢复旧观。已经着手准备在这里办一个纪念馆，就象位于高尔克<sup>①</sup>的列宁旧居那样。但是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召开了，此后，自然任何人再也没有建立纪念馆的想法了。父亲的警卫人员居住的房子，现在是一处医院或疗养院。正房本身则关闭着，阴森森的，一片死寂。有时我作梦还梦见这幢房子，梦见它的那总令人觉得空荡荡的房间，醒来时还吓得浑身发冷。

从波克伦那亚山开始的那条马路如今已成了郁郁葱葱的林荫路。居住在库图佐夫大街新楼里的莫斯科人常来这里散步。通往莫斯科大学的公路上，你能望见围绕在这幢房子周围的树林已是杂草丛生，荒芜一片了。这是一座阴森森的房子，一座阴森森的纪念碑。现在，就是送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到那里去，死也不去。也许，它就是我们称之为“个人崇拜时代”的意味深长的纪念碑吧？我父亲喜爱这幢房子。它适合他的口味；他认为他住着方便。也许，他那到处找不到归宿的心灵，想要在这幢房子的屋顶下得到栖息吧！这是可以想象的。这里，对他这样的心灵来说，倒是一个真正的安息之处。

---

① 列宁的乡村别墅，在莫斯科郊区，列宁在这里逝世。

然而，曾几何时，我们还有过另外一个家，是的，亲爱的朋友！你瞧，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另一个样子的家，一个欢乐的、阳光灿烂的、到处是孩子们欢声笑语、有快乐而殷勤好客的人们、到处生机勃勃的家。那是母亲主持一切时我们的家。这个家是她创建的。在这个家里，处处是母亲的音容、意愿、操劳和安排。在这里，父亲既不是上帝，也不是“崇拜对象”，他只是家里的普普通通的父亲。这所房子以它的革命前的主人的名字命名，叫作祖巴洛沃，距我今天住的地方有两公里，离乌索沃车站不远。

我的父母从1919年就生活在这里，一直到1932年我母亲去世。此后，不论是这里，还是城里的旧寓所，父亲都不能再住下去了，他在克里姆林宫里换了一套房子，只有我们这些孩子还住在这里。他为自己孔策沃建了勃利日尼新别墅。至于我们这些人——孩子、亲戚（那些还没有被赶走的和没有被捕的亲戚）、外祖父和外祖母仍然象过去一样在祖巴洛沃度夏。不过没有母亲就一切完全变样了，一切都变得无可辨认了……

我想回顾往昔，回顾那充满阳光的童年，那些岁月对我们孩子们来说，是在母亲创造和组织的生活圈子里无忧无虑度过的。那是童话般的岁月，那些日子就是在这儿附近，在这郊区消逝的。你现在应该明白：我为什么不厌其烦地描写茹科夫卡了吧？我现在就坐在这里的森林中写这些信。

现在，我就向你讲述这些岁月。



### 3

我度过童年的那幢阳光充沛的房子，以前属于祖巴洛夫的后代，他是一个来自巴统的石油企业家。他和他父亲老祖巴洛夫和曼多尔夫有亲，这个人是巴尔维哈一处庄园的主人，他的一幢德国哥特式的住宅如今成了俱乐部，至今屹立在湖滨。整个这个区都属于曼多尔夫家族。离乌索沃不远的锯木厂也是他的，紧挨着这个厂子，以后出现了著名的“高尔克第二”国营养鸡场。乌索沃车站、邮局、通往锯木厂的铁路支线（这条支线已经一片荒芜，废弃不用了），那一直延伸到奥金佐沃的一大片美丽的森林（管林人原是德国人，他种了一排排云杉，在乡间小路两侧形成了林荫路，这里有许多骑马来游玩的人），这一切都曾属曼多尔夫所有。祖巴洛夫在离乌索沃火车站不远的地方，拥有两起庄园，都是德国式的建筑，房子有砖石结构的尖屋顶，四面筑有又高又厚的围墙，都是砖砌的，墙头上还覆盖着瓦。

祖巴洛夫一家在巴库和巴统拥有几处炼油厂。我父亲和阿·伊·米高扬都熟悉祖巴洛夫这个名字，他们在二十世纪

初就在他家的炼油厂领导过罢工，还在工人中组织过工人小组。革命以后，1919年，当有可能使用莫斯科郊外许多被丢下的别墅和庄园时，父亲和阿·伊·米高扬都想起祖巴洛夫这个名字来了。阿·伊·米高扬一家和孩子、伏罗希洛夫、沙波什尼科夫<sup>①</sup>和别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家庭都迁进了当时称之为祖巴洛夫二村的那幢房子，而我们父母则住进了邻近的较小的祖巴洛夫四村。

阿·伊·米高扬的别墅至今还保留着它那主人丢下家流亡国外时所留下的那个样子。花厅里摆着一个主人心爱的大理石雕的狗；屋内陈设着当年从意大利运来的大理石雕像；墙上挂着古老的巴黎织花戈白林挂毯<sup>②</sup>；楼下房间的窗子是用彩色玻璃镶嵌成的图画。小花园、大花园、网球场、暖花房、暖室、马廐都和原来一样。每当我到这位善良的老朋友的亲切的家中时，总是十分愉快。你一走进那间古色古香的餐厅，那里老是摆着那雕花的酒柜，挂着老式玻璃大吊灯，一个座钟也老是摆在壁炉上。阿那斯塔斯·米高扬的十个孙儿孙女都在房前房后的草地上嬉戏，然后就在这个桌上进午餐。她的五个儿子都在这里长大成人。我妈妈也常来这里，她是这房子已故的女主人的好友。

在我们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纪，稳定的状态和牢固的家庭

---

① 鲍里斯·米海伊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1882—1945)，苏联元帅。三十年代是红军参谋长和副人民国防委员，1941—1942年再次出任参谋长，1943年被任命为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院长。

② 戈白林挂毯是世界最名贵的一种挂毯，以图案及纺工精美著称。

传统真是使人非常愉快的事，如果这些精神在什么地方还保存下来的话……

可是我们的庄园却改个没完。起初，我父亲立刻就把房屋周围的树林清理了，砍掉了一半树木，腾出了一片空地，房子变得比较明亮、暖和，也不那么潮湿了。林子也进行了清理，并加以维护，春天把枯树叶子耙净。我家门前有一处美丽的明快透光的白桦幼林，一片洁白。我们这些孩子就在这片林子里采蘑菇。不远的地方办了养蜂场，蜂场旁边的两块空地，夏天种上荞麦，供蜜蜂采蜜。那挺拔的干爽的松树林的四周留出空地，这些空地也精心地进行过清理，长着草莓和黑覆盆子果树丛，这儿的空气分外新鲜而且芬芳。后来，我已长大成人，这时我才明白，父亲对大自然的特有的兴趣，他的这种非常务实的兴趣，从根本上说，是极其深厚的农民感情。他对大自然不能单纯地袖手旁观，他要主宰它，永不停止地去改造它。他把大片土地种上果树，种上许许多多的草莓、覆盆子、黑豆树<sup>①</sup>。离我家稍远有一小块长着灌木的空地，用铁丝网圈了起来，里面养着火鸡、野鸡和珍珠鸡；鸭子在小水池里游着。这一切都不是一下子就出现的，而是逐渐繁荣起来，发展起来的。所以，我们这些孩子实际上是在一个小小的地主庄园以及它的农村生活方式下长大的，我们这里每年要割草，采蘑菇和浆果，每年有自家产的新鲜蜂蜜，自己的糖醋泡菜，自己养的家禽。

---

① 黑豆树是多年生灌木，我国东北地区和苏联都生长这种灌木，果实呈黑豆形，是一种名贵的浆果，可酿酒，制糖酱，学名黑茺子，醋栗属。

是的，对这些家园我父亲比母亲兴趣更大些。我母亲只关心房前的大丁香树，只要每年春天能繁花满枝就行了。她还在阳台旁边种了一整排茉莉花，还让人给我搞了一个小园子，保姆教我挖地翻土，种上旱金莲和金盏花。

我母亲关心的是另外一些事情，她关心的是对我们的教育和培养。我在妈妈身边度过的童年只有六年半，可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已经能读能写俄语和德语，会画画儿，捏泥塑，用剪刀胶水制做剪纸，已经能听写乐谱<sup>①</sup>。我哥哥和我很幸运，母亲给我们找来了极好的生活老师<sup>②</sup>（以后我还要讲到我的保姆）。这对我哥哥瓦西利尤为重要，他那时已经是个有着难于管教名声的孩子。瓦西利身边有一位极好的“先生”（大家都这样称呼他）亚力山大·穆拉廖夫。他总能想出有趣的活动：到河边和树林去散步，钓鱼，在河边的小棚子里夜宿，烧鲜鱼汤吃，出去采坚果，采蘑菇，还有其它许多活动，真是数不胜数。当然，这些都是有教育目的的，是和上课、阅读、画画、饲养兔子、刺猬、青草蛇以及对儿童有益的消遣交替进行的。

生活老师纳塔利亚·康士坦丁诺芙娜和亚力山大·穆拉廖夫一年到头轮换着和我们在一起。她教我们作泥塑，用木头制造玩具，教我们染色，画画，真是应有尽有，不一而足……她还教我们德语。我不能忘记她教的那些课程，她的课总是很有意思，有许多游戏，她是一位天才的教育家。

是我母亲的手转动了这架机器，可是她自己几乎从来不

---

① 指听着别人弹钢琴自己写出乐曲的谱子。

② 革命后不用帝俄时代富有人家使用的“家庭教师”字样，以示尊重。

在家，不在我们的身旁。在那些年代，一个女人，尤其是一个女党员，花时间去带孩子是一件很不体面的事。母亲起先在一个杂志社工作，后来又进了一个工业学院去学习，她老是在这里或那里开会，其余的空闲时间都给了我父亲；父亲对她来说，就是全部生命。轮到我们孩子们份上的通常只有她的教训和考察我们的知识而已。她是严格的、对孩子要求很高的母亲。我完全记不得她对我有过什么温存：她怕把我惯坏了，因为父亲已经很爱我，疼我而且娇惯我。当时我们当然一点也不知道我们那许多游戏、消遣、全部的欢乐和有意思的童年，都应该感谢她的安排。这是我们以后才明白的，但是，这时她已不在人间了……

我们家的儿童节日是多么好玩啊！当时克里姆林宫里的孩子全请来了，一共二、三十个。那时住在克里姆林宫里的人很多。他们的生活简朴而愉快。我们经常演出儿童节目，每次演出我们都要和亚力山大和纳塔利亚两位老师共同准备很长时间。

我记得母亲在世时我过的最后一个生日，那是1932年2月，我满六周岁的时候。这个生日是在克里姆林宫家中过的，家中挤满了孩子。举行了儿童音乐会：朗诵了俄文诗和德文诗，演唱了歌颂突击手和讽刺两面派的唱段。我们穿着民族服装跳乌克兰民间舞蹈，那服装是我们自己用彩色纸张和纱布制作的。我哥哥瓦西利的同岁同学阿尔乔姆·谢尔盖耶夫（现在是满胸勋章的将军了）把熊皮褥子披在身上装作狗熊，用四只“脚”在地上爬着，同时有人在朗读克雷洛夫的寓言诗，

听众狂喜得尖声叫喊起来。

墙上挂着我们儿童的壁报和绘画。后来，宾主全体——父母们和孩子们——一齐到餐厅吃茶点糖果。我父亲也参加了这个节日。当然他只是消极地在一旁看着，觉得挺有趣。有时为了解闷，他也喜欢孩子们的嘻戏喧哗。

这一切都深深印入我的脑海，永志不忘。啊，那在祖巴洛沃森林中的游戏场多么美好啊！我们有翘翘板，秋千架，还架了一间“鲁宾逊小屋”，这小屋是在三棵松树之间用木板搭起来的，要上去得爬绳梯。总有别家孩子在我家作客。在瓦西利房里不是住着阿尔乔姆·谢尔盖耶夫，就是住着托利亚·罗宁。奥利亚·斯特罗耶娃常在我这里作客，她是我母亲一位老朋友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布哈林，大家叫她“卡佳”，和她的母亲埃斯菲利亚夏天通常都住在我们的别墅。

家里总是有许多客人。尼古拉·布哈林也常住在我们祖巴洛沃，他是大家喜爱的人。他很爱各种动物，我们家满是他带来的动物。刺猬在阳台上跑来跑去，青草蛇盘在瓶子里，矮种小狐狸在花园里乱跑，受了伤的大雕关在笼里。我模糊地记得布哈林穿着托尔斯泰服<sup>①</sup>、粗麻布裤子，穿着凉鞋。他常和孩子们一起玩，和我的保姆聊天，还教她学骑车、打汽枪。和他在一起大家都十分愉快。许多年后，布哈林早已不在人间，“布哈林狐狸”仍在克里姆林宫跑来跑去。这时，克里姆林宫已经无人居住，空荡荡的了。那只狐狸在泰尼茨基花园里

---

① 指托尔斯泰常穿的半长的立领上衣，腰中束带。后来的革命者、民粹派，甚至高尔基都喜欢穿这种衣服。

见人就躲藏起来……

格·奥尔忠尼启则<sup>①</sup>在我们祖巴洛沃住的时间很长。他和我父亲很要好，他的妻子季娜和我妈妈也是好朋友。我不想一一提到那些常来我家作客以及和我们有来往的那些人的名字了。我那时还小，许多事已记不得了，也不想去问那些记得的人，因为我只想写下我自己知道和记得的，以及曾经目睹过的事。

遇到节日或者是过生日的时候，家里的大人通常都要热闹一番。这种时候，谢苗·布琼尼总是携带着他那潇洒的手风琴，演奏一些俄罗斯和乌克兰歌曲。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都唱得特别好。我父亲也会唱歌，他的听力很好，声音既高亢又清亮（讲话时却相反，不知为什么，嗓子有点闷，又低，声音也不大）。我记不得母亲是否也会唱歌，只听说她难得有时也出来跳个格鲁吉亚民间快步舞，舞得轻盈而优美。一般说来，我们家中没有什么格鲁吉亚的风俗习惯，因为我父亲已经完全俄罗斯化了。

从总的方面说，那些岁月里，“民族问题”并不是使人们很注意的问题，人们更有兴趣的是全人类的品质。在那个时候，有一次我哥哥瓦西利对我说：“你知道吗？我们的爸爸以前

---

<sup>①</sup> 格里哥里·康士坦丁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1886—1936），1903年成为一名布尔什维克，积极参加了格鲁吉亚革命运动。1920年领导高加索的共产党，1921—1926年领导外高加索的党，1930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国家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1932年任重工业委员。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站在斯大林一边反对托洛茨基，但被认为曾试图限制清洗范围，1956年第二十次党代会上赫鲁晓夫曾谈到他的死。

是个格鲁吉亚人。”我只有六岁，不懂“以前是格鲁吉亚人”这话的意思，所以他解释给我听：“格鲁吉亚人穿契尔克斯服<sup>①</sup>，见人就杀，用匕首杀人。”这就是我们当时对我们民族祖根的全部理解。当有同志从格鲁吉亚来时，总是带着礼物——葡萄酒，葡萄，水果等，慷慨相赠（这是格鲁吉亚人的习惯，不送是不好的），我父亲总是十分生气。这些东西送到我家时，总是在父亲大骂之下给送了回去，结果罪过就落到他的“俄罗斯妻子”，我母亲的身上……实际上，我母亲生于高加索，长于高加索。她热爱格鲁吉亚，也非常了解它。可是在那些年月，“慷公家之慨”的作风是不受鼓励的。

我们在克里姆林宫的家，由母亲请来的管家照管。她叫卡罗琳娜·蒂尔，是一个从里加（拉脱维亚）来的德国人。她是一位可爱的老妇人，十分整洁，非常善良，按老样式把头发向头顶上梳成发髻，用梳子卡住。我母亲把我家微薄的收入全部委托给她，由她管着一家大人和孩子的伙食，总之她管理全部家务。当然，这指的是我确实记得的一段时间——大概是从1929年到1933年。这时妈妈到底建立起我们家的某些秩序，自然是在那些年月对党的工作者规定的很简朴的低工资的范围之内。在这以前，总是妈妈自己管理家务，她领到各种供应券、口粮和实物供应，根本没有服务人员之说。虽然如此，重要的是家里有着正常的生活，这生活是由女主人管着，家里没有契卡人员的影子，那时也没有警卫人员。唯一的一位警

---

① 高加索人穿的半长上衣，上面饰一排子弹。



卫员只管跟随我父亲乘车出门，和我们家毫无关系，不准进我们的住宅。

那时，所有苏维埃上层领导人，大体上都是这样生活的。他们谁也不贪图奢侈的生活，不想置办东西。他们努力给孩子以良好的教育，雇用旧时的家庭教师和德国保姆，而妻子们都工作，努力多读书学习。体育运动刚刚时兴，她们都打网球，别墅里有网球场和木球场。她们既不在化妆品上用心，也不注意服装打扮，可是她们照样非常漂亮，非常迷人。

夏天我父母按照他们自己规定的传统到索契去休假。第一次把我也带去是1930年或1931年。我们住在一个小小的别墅里，靠近马采斯塔，我父亲就在那里洗温泉治疗风湿病。只是在我母亲死后，才开始给父亲专门盖了几处别墅。我母亲没有享受过像后来这种毫无限制的用公款建立的豪华生活。这一切发生在她死后。这时我们家已经公家化了，军事化了，管理我们家务的是国家保安部的全权代表。妈妈在世时我们的生活是正常而朴素的。

在那些遥远的岁月里，我父母常和朋友们一起到南方去度假，有时和我母亲的教父阿·索·叶努基泽<sup>①</sup>同行，他是我们全家的好友。有时和阿·伊·米高扬、伏罗希洛夫或莫洛托夫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一同去。至今我保留着当年在森林中举行愉快的野餐时的照片，大家一起乘车出发，一切都那样愉快，简单。

---

① 阿·索·叶努基泽(1877—1937)，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参加革命运动，革命后被选为苏共中央委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清洗中失踪。

有时我父亲为了消遣，用一支双筒猎枪去打鹰，或者夜里打开汽车灯，打那撞进灯光中的兔子。打弹子、打地球、打木棒，这些游戏都需要好眼力，是父亲力所能及的运动项目。他从不游泳，也不会游。也不喜欢晒太阳。他只喜欢在森林中，在阴凉处散步，但这些也会很快使他厌倦，然后就躺在榻上看书、看文件或看报。他能几小时地和客人坐在桌前就餐，这已纯系高加索的习惯：吃饭能吃几小时，不只是喝酒、吃东西，而且简直就是在杯盘之间讨论、判断、争论和解决一切问题。妈妈已经习惯于这样的生活方式，那些更适合她这样年龄和性别的其它娱乐她是不知道的，在这方面她是一位理想的妻子。甚至当我还非常小的时候，我还需要妈妈喂奶的时候，在索契休假的父亲突然生了小病，妈妈将我留给保姆和母山羊“纽西卡”，自己就毫不犹豫地到父亲那里去了。她的位置在那里，而不是在孩子身旁。

总之，我们也有过一个普普通通的家，有朋友，有亲戚，有孩子，有家庭的节日。在城里的家如此，夏天的祖巴洛沃更是这样。祖巴洛沃原是一个偏僻、荒芜、长满杂草的庄园，这所房子很阴暗，有着尖屋顶，摆满了古老的家具。我父亲将它改造成阳光充沛、收获十分丰富的园地，有花园菜园，盖起各种各样的有收益的房舍。原先的宅邸进行了改建，那哥特式高屋顶被拆掉，房间重新作了设计。古老家具拉走了，只在楼上妈妈的小房间里留下了几把椅子，一张桌子，一个高大的穿衣镜，镶着金边，雕花的镜脚也是镀金的，这些东西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母亲和父亲住楼上，孩子们和外祖母、外祖父以及来往的客人住楼下。夏天，我们生活的中心在楼下凉台和二楼我父亲的阳台上。我的保姆不断打发我去二楼：“去吧，把黑豆果给爸爸送去。”或者“给爸爸送紫茄花去。”于是我就摇摇晃晃地去了，不管送的是什么，父亲总报我以热烈的发散着烟草味的亲吻，母亲却总是向我提出这样那样的叮嘱。

尽管母亲很年轻，1931年她才满三十岁，却为全家所尊敬，人人都很爱她。她聪明、美丽、对人毫无例外地彬彬有礼，有分寸，可是当她觉得某些东西不容置辩的时候，又很坚定，顽强，一丝不苟，寸步不让。只有她一个人能够把我们家的这些形形色色、性格各异的亲属全都团结起来，使之和睦友爱，她是公认的一家之长。

母亲对我大哥雅可夫特别温存，真心地爱他。大哥是我父亲第一位妻子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生的，我母亲只大他七岁，他也尊敬他的继母，而且爱她。她尽一切可能使他那不轻松的生活得到安慰，他第一次结婚时，我母亲帮助了他，在父亲面前保护他，因为他总是无辜地受到父亲不公正和冷淡的对待。母亲对斯瓦尼泽一家人——父亲第一个早年故去的妻子的两位姐妹莎什科(亚力山德拉)和玛丽科(玛丽亚)，她的弟弟亚力山大及妻子玛丽亚都极其友爱。母亲自己的双亲、两个哥哥(我的费加舅舅和巴维尔舅舅)和姐姐安娜、安娜的丈夫斯坦尼斯拉夫·雷登斯——所有这些人都经常到我们家来，大家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友好的大家庭。他们之间从不争吵，从不为琐事口角，没有市侩气息。

这些年代在父亲周围亲近他的那个圈子里的人，都是按生活本来面貌认识生活的人，他们在极其不同的各个领域工作，每个人带来自己的见闻和想法。在那些年月，父亲不可能和生活隔绝。发生这种情况只是后来的事，当他和一切诚实的、诚恳的，心地善良的，能与他平等相处的，和他亲近的人隔绝之后的事。

亚力山大·斯瓦尼泽是苏联金融界一位重要活动家，长期在国外——伦敦、日内瓦、柏林生活和工作。他是那种受过西方教育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中的一个。巴维尔舅舅是个军人，经验丰富，参加过国内战争，曾在总参谋部和军事学院工作；姨父雷登斯是捷尔仁斯基的战友，有经验的老契卡人员。两个舅舅的妻子（玛丽亚舅妈是歌剧演员，任尼亚舅妈说话犀利无比），姨妈安娜，还有两个老布尔什维克，我的外祖父外祖母，所有这些人都把各种消息带到我父亲这里来，有时他甚至主动请他们来说些“小广播”。这个圈子里的人讲的情报，不是被收买的，谈话也是不顾情面的。他们在我母亲身边形成一个圈子，这圈子在她死后不久就消失了，起初还是逐渐消散的，但到了1937年，最终地一去不复返了。

这些人值得逐一单独地去写。他们都有杰出的禀赋，才华横溢，都是很有趣的人物。几乎他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悲剧性地中断了，他们每个人那种天才施展、春风得意的命运都未能得以善终。为了尊重对他们的记忆，出自我对他们的深深的感谢之情，以及我对他们的爱，为了他们就是我那曾经充满阳光的家中，我称之为“童年”的一切，我也该对你说一说这

些人。如果你见过他们，认识他们，你一定会喜欢他们每一个人……

此外，在我们的时代，极其不相类似的人的命运往往交织在一起，结合在一起。人们的历史奇异地、意想不到地发生变化，命运忽上忽下地变换位置——在突然不可思议的飞黄腾达之后，接踵而来的是灾祸临头，跌入深渊……革命和政治对人的命运和生命铁面无情……因此，我想家庭的记事不是没趣的……在这些记事中总会有历史题材的零章片断吧，当然，一般说来，任何虚构出来的题材，和一个真实人的真实生活相比也许更加宏伟壮观吧？



## 4

如果我不讲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给你听，你就不会理解我妈妈的性格和她的短暂的一生。我外祖父和外祖母的一生也是很有意思的，而且在许多方面都带有时代的特征。首先，妈妈所接受的传统本身以及她童年时代的生活方式和所受到的教育，这些都在许多方面决定了她的性格。

我们的外祖父谢尔盖·雅可夫列维契·阿利卢耶夫写了一本有关他自己一生的回忆录，写得很有趣，是1946年出版的。当时出的不是全文，有很多的删节\*。1954年这本书又再版了一次，但删节得更多，这一版删得完全没有意思了。

外祖父出身于沃罗涅什省的一个农民家庭，但他不是纯粹的俄罗斯人，而是有着较多的吉普赛人的混血，因为他的祖母是吉普赛人。大概是吉普赛的血统传给了阿利卢耶夫家族一副南方的、异国的相貌：漆黑的眼睛，洁白的牙齿，黝黑的皮肤，清瘦的身材。在我妈妈的哥哥巴维尔身上，这些特点表

---

\* 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所出版，手稿现存该所。（以\*号标志的是俄文版原著的注释。以下均同）

现得最为明显(从外貌上看,他简直是印度人,很像年轻时的尼赫鲁),在我妈妈身上也是如此。也许是因为吉普赛血统的缘故,外祖父的性格中充满了追求自由的渴望和那没完没了的迁居的热情。

我外祖父这个沃罗涅什省的农民,很早就开始从事各种手艺,他生了一双真正的巧手,对各种技术活儿都聪明能干,他先做钳工,后来进了外高加索铁路工厂。对格鲁吉亚,对它那大自然,对它那充沛的阳光,外祖父一生都眷恋不已。他爱南国的富饶,他十分熟悉和了解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的性格。他在梯比里斯、巴库和巴统都住过。在这些地方的工人小组他遇见了社会民主党人,遇见了米·伊·加里宁和伊·费欧列托夫<sup>①</sup>,并于1898年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所有这些事在他的回忆录中都写得十分有趣,他谈到那些年月的格鲁吉亚、进步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对格鲁吉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以及当时外高加索革命运动中所特有的令人赞叹的国际主义。可是,非常可惜,这种国际主义以后看不见了。

我的外祖父从来不是一位理论家,也从来不是党的出名的活动家,他只是党的战士,普通工人,他是这样一些人其中的一个:没有他们,就不可能保持各种联系,不可能进行日常工作,也就不可能实现革命本身。以后,在二十世纪初的那些年月,他和他的家人住在彼得堡,在电灯公司当技术工人。他

---

<sup>①</sup> 伊·费欧列托夫(1884—1918),布尔什维克活动家,著名的巴库二十六人委员会委员之一,1918年9月被反革命分子杀害。

从来都是全神贯注地工作，人们十分器重他这位优秀的技术人员，本行的专家能手。外祖父一家在彼得堡住在四间一套的不大的房子里，这样的房子对我们今天的教授来说也是梦寐以求的了……他的孩子在彼得堡的中学读书，以后都成了真正的俄国知识分子。这就是1917年革命时他家的情况。关于这一切我以后还会告诉你。

革命后我外祖父就在电气化有关部门工作。他修建过沙图拉水电站，曾在那里住了很长时间，有一个时期，他曾担任列宁格勒电气化协会主席的职务。作为一位老布尔什维克，他和革命老干部有密切的联系，他熟悉他们，他们也熟悉他，敬爱他。他温文尔雅，待人彬彬有礼，性情柔和，和什么人都能处得很好。但是与此同时他有着内在的坚强，是个决不肯屈膝的人，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活了七十九岁，于1945年逝世）他都骄傲地保持了她的这个“我”字，保持了过去年代一个革命者—理想主义者的精神，保持了心地的纯洁，无比的真挚和正派，这一切溶合为一个浑然整体。在具有这些情操的同时，他为人随和，但是对那些不理解这些品质，或距离这些品质千里之遥的人们来说，他也许是个很不随和的人。

我外祖父身材很高，晚年偏瘦，显得四肢又长又细。他衣着整洁，甚至穿得有点讲究——这已经是彼得堡的派头了——下巴上蓄着楔形的胡须，上唇上留着灰白的小胡子，有点像加里宁。甚至于在大街上有些孩子都喊他：“加里宁爷爷！”直到晚年，他那乌黑的像块煤炭似的眼睛仍然保持着那热情的，生气勃勃的，黑亮黑亮的光辉，还是那样会突然愉快



地、有感染力地纵情大笑起来！

外祖父住在我们祖巴洛沃时，他的一大群孙儿孙女都非常崇拜他。他的房间里有一具木工台，有各式各样的工具，有许许多多奇形怪状的铁块、铁丝，总之是那些使我们孩子们羡慕得目瞪口呆的东西。他听任我们在这一堆杂七杂八的东西里随便翻，并且想拿什么就拿什么。外祖父不断地做活儿，焊接呀，车削呀，刨呀，磨呀，家务中必须做的各种修修补补的活儿他都做，他也管修理电线。很多人跑来请他帮忙或向他请教。他喜欢走得很远去散步。住在祖巴洛沃二村（阿·伊·米高扬也住在这里）的巴维尔舅舅的孩子，妈妈的姐姐安娜姨妈的儿子，也常到我们这里来。外祖父喜欢带孙子们玩，到林中去采蘑菇和坚果。我记得，当我走累了的时候，外祖父就让我骑在他的脖子上，我仿佛在小径的上空高高地飞着，而其余的人在林中小径上慢慢地移动着步子——我可以伸手够到坚果。

母亲的死使他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摧残，他变了，变得非常孤癖，沉默寡言。外祖父从来为人谦虚，从不引人注目，他不能忍受哗众取宠的作风，他的沉静、温文尔雅、性情柔和都是天生的品质，但也许是他从优秀的俄国知识分子那里学来的，革命使他一生都和这些知识分子联结在一起。1932年以后，他闭门索居，常常一连几个小时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出来，在里面磨这磨那，干东干西。对待孙儿孙女更加温柔。他有时住在我们家，有时住在妈妈的姐姐、他的女儿安娜家里，但更多的时间住在我们的祖巴洛沃。后来，他开始多病了。一定是他的心灵先病了，以后一切疾病由此而生，因为总的说

来，他身体素来像铁一样结实。

1938年我妈妈的哥哥巴维尔舅舅去世。这是对他的又一次打击。1937年安娜的丈夫斯坦尼斯拉夫·雷登斯被捕，后来，在战后，1948年安娜·谢尔盖耶芙娜本人也被捕入狱。谢天谢地，外祖父没有活到这一天，他是1945年6月因患胃癌发现得太晚去世的。他的病并非是上了年纪得的病，并非是肉体上的病，而是内心的伤痛，但他从不对别人喋喋不休地诉说他的痛楚，从不要什么，挑剔什么。

战前他就开始写回忆录了。他一向喜欢写东西。我那时还很小，就常收到他从南方寄给我的长信，信中详细地描述他热爱而又熟悉的南方的美丽风光。他有着高尔基般的华丽的文笔。他很爱高尔基，他完全同意作为作家的高尔基的主张，即每一个人都应该写自己的生活。他写得很多，而且醉心于写作，可惜他生前没有看到他的书出版，虽然他的老朋友加里宁极力向出版社推荐这位老布尔什维克和天生的叛逆者的手稿。

他的病在最后一年急转直下。他消瘦得十分可怕。在他死前不久我在医院看到他时，我被吓呆了。他像一具活的枯干的尸体，已经不能说话，只是用一只手遮住眼睛，无声地哭泣着，他很明白：大家是来和他诀别的……当他静卧在棺木里时，像一位印度的圣者——他那消瘦而清秀的脸孔变得十分美丽，那鹰钩鼻是细长的，胡须洁白如雪。他的灵柩停在革命博物馆大厅里，许多人，许多老布尔什维克都来向他的遗体告别。老革命家李特文-谢多依在墓地讲了话。这些话我当

时没有完全懂，但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我现在才真正懂了这些话的意义，他说：“我们，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理想主义者老的一代人……”

我外祖父和外祖母的婚事是非常浪漫的。当我外祖母还不到十四岁的时候，她把一个衣服包从窗子扔了出来，跑出家门，奔到梯夫里斯<sup>①</sup>工厂一个年青工人——我外祖父那里。在她出生和长大的格鲁吉亚，青春和爱情都来得很早，所以这件事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

不寻常的倒是她为了一个二十岁的穷钳工，抛下了她那小康之家，亲爱的父母和一大家兄弟姐妹。为了纪念她的家，外祖母一生都珍藏着一张全家福的照片：全家都坐在房前的一辆四轮马车上，这里有一匹心爱的马，还卧着一只狗，车夫牵着马笼头，全家老少都身体笔直地坐在车上，直望着镜头……

我们的外祖母欧里加·叶甫根尼耶芙娜娘家姓费多连科，生在格鲁吉亚，在这里长大。她一生都热爱这个地方，热爱这里的人民，热爱她的故乡。她本人就是各民族的奇怪的混合体。她父亲叶甫根尼·费多连科虽然姓乌克兰的姓，却在格鲁吉亚长大，而且一直生活在那里。费多连科的母亲是格鲁吉亚人，他也讲格鲁吉亚话。费多连科和一个德国姑娘玛格达林娜·艾赫戈里茨结了婚，艾赫戈里茨的娘家是德国移民。

---

① 现称梯比里斯。

在格鲁吉亚从叶卡捷琳娜二世时起就有德国移民区，这些德国人整村地住在一起。玛格达林娜·艾赫戈里茨正象人们常见的那样，开一个小酒馆，做一手好菜，生了九个孩子（最小的一个是欧里加，我的外祖母），带孩子们去新教教堂作祷告。

费多连科家里讲德语也讲格鲁吉亚语。我外祖母很晚才学会说俄语，她一生讲俄语都带有很典型的高加索口音，而且夹杂一些格鲁吉亚词儿，当她说“耶稣-玛丽亚”时，马上要加一句“Mein Gott”<sup>①</sup>。她一辈子信仰宗教，后来和外祖父在一起的“革命生涯”只不过是清除了宗教信仰中的狭隘性和教条主义而已。她不承认新教、格里高里教（即亚美尼亚教）和东正教之间有什么区别，她认为这些差别都是胡说八道。如果我们这些孩子们笑话她，问她“上帝在什么地方？”或“人的灵魂在什么地方？”她就非常生气并且说：“等你们长大了，老了，你们就明白在什么地方了。现在别缠我，你们改造不了我。”她是对的：在我已经三十五岁的时候，我才明白外祖母比我们任何人都聪明。

外祖母是她的勤劳的德国母亲教养大的，她自己也非常能干；她和我外祖父一样，生有一双巧手，不过是女人的巧手罢了！她善于烹调，做针线。外祖父常常坐牢，从这一城市迁往另一城市，外祖母和这样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共同生活所带给她的是极其贫乏的生活条件，在这样的条件下，她确是一个出色的主妇。最后这些年月，当我们家由公家人像管理公家

---

① 德语：“我的上帝。”

事务那样进行管理时，你看她心都快碎了。看到如此浪费国家的金钱，她简直是深恶痛绝。人们不了解她（也许是十分了解她），所以为此不很喜欢她。她和文质彬彬，总是善于保持沉默的外祖父不同，她会突然地大喊大叫，骂那些“败家的当家人”，骂那些在我们家工作的公家的厨师，警卫长，服务员。他们说她是“任性的老太太”，难伺候的刚愎自用的人。母亲死后，我们这些和她一起住在祖巴洛沃的孩子们也听到过这样的话，当然那时我们还不懂得外祖母有一颗异常炽热的心，她眼看着公家管理家务制度的一塌糊涂现象而无法默不作声。

外祖母没有白生在格鲁吉亚，她热爱格鲁吉亚不是没有道理的。她具有真正的南方人的热情，她对生活的一切感受都是南方式的，热烈的，喜悦和悲伤都使她泪流满面，她有时候悲泣着述说过去，有时候滔滔不绝地倾述自己的爱情、幸福和失意。母亲像我外祖父那样善于克制，很严肃；她对于外祖母的感情外露，对于外祖母对孩子们的教育、对家中的秩序和对妈妈本人的经常的批评，不免感到厌倦，因此她不喜欢外祖母常到我们家来，不喜欢她管我们家的生活。这也许是因为外祖母的一切耽心和表示遗憾的事，都内在地有着深刻的道理和明智之处，因此妈妈很怕这些东西而想推开不闻不问吧？……

现在让我们回到原来的话题。无论如何，外祖母和外祖父是很好的一对夫妇。我外祖母只受过四年教育，大概和我外祖父所受的教育差不多。他们曾在梯夫里斯、巴统、巴库住

过，这一时期外祖母是一个最完美的、能忍耐一切的、忠实的妻子。她献身于她丈夫的事业，在十月革命前自己也入了党，可是她也常常抱怨说“谢尔盖毁了”她一辈子，说和他在一起“只是受罪”。他们的四个孩子：安娜、费多尔、巴维尔和娜佳都生在高加索，从他们的面貌、他们对童年的印象，以及按一个人早期不自觉地、潜在地形成的一切来看，他们都是南方人。

他们的孩子都长得非常漂亮，费多尔除外，但他最聪明，天赋最高，以致虽然他身世低微，出自“市民”家庭，彼得堡海军军官学校还是录取了他。他们家里的人都和蔼可亲，对人诚恳，为人善良，这是他们共同的特点。大概最坚定、顽强、性格刚毅的是我妈妈，她具有内在的坚韧和固执。其他哥哥姐姐比她和顺得多。巴维尔和安娜极其善良，因此妈妈老是抱怨说，他们和外祖父、外祖母一起“只能把孩子惯坏”。可是他们也责备她，说妈妈“严得过分”，说她迷信家庭教师，家庭教师只会“折磨”孩子，不让他们“自由地”成长。但这些都是出自爱护的争吵。总的说来，他们四个人都很友爱，而且亲密无间。

外祖父和外祖母都认为他们的孩子应该在可能的范围内受到良好的教育，因此当他们在彼得堡的生活稍为安排就绪之后，就把孩子都送进了中学。从保存下来的当年的照片看，外祖母那时的样子实在令人赞叹——她非常漂亮。她不仅有一双灰色的大眼睛，端正的面庞，秀丽的小嘴，而且仪态万千，挺秀，自尊，大方，“女皇般的神态”，特别意识到自己的尊严。因此她那大大的眼睛显得更大些，而她那小巧的身材也显得

高大些。外祖母个子不高，淡黄色的头发，身材匀称，衣着整洁，是一个标致而机灵的女子。听人家说，她有惹人爱慕的魅力，因此倾心于她的人简直难以应付……应该说，她自己也容易动感情，所以往往做出风流韵事来，今天跟上一个波兰人，一个匈牙利人，明天又跟上一个保加利亚人，甚至于土耳其人——她爱南方人，有时心里确信：“俄国男人都是粗野的东西！”她的孩子们此时都已进了中学，对这些事情都能耐心以处；一般都是事过境迁，家庭生活又恢复正常的轨道。

在较晚的那些年月里，外祖父和外祖母对母亲的死所经受的痛苦虽然各不相同，但都非常沉重。以后到底分居了，他们各自住在自己的单元房子里。夏天他们在我们祖巴洛沃餐桌上见面时，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顶来顶去。外祖母对各种家务琐事的挑剔，使外祖父非常恼火……他已经超脱于这一切之上；他在忙于写他的回忆录，那些烦死人的“噢呀”、“啊呀”的抱怨，高加索式的对家庭缺少秩序的唠叨不休，都使外祖父心绪不宁，忍受不了。因此，他们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单独地在孤独中迎来自己的晚年、疾病和死亡。每人都是原来的样子，保有自己的性格和兴趣。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尊心，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气质，他们不像那些无依无靠的老年人那样相依为命，他们爱自由——虽然他们都感受到孤独的痛苦，但他们两人都不愿意牺牲暮年的自由生活。外祖母喜欢大声疾呼：“自由！我爱自由！自由！”在这种时候，她心中的言外之意显然是说：正是外祖父夺去了她的这一自由并“毁了”她的一生。

我总是回头讲过去的事情，我以后也会这样写，因为不可能保持时间的统一，因为思绪常常会意想不到地突然涌现。

在十月革命前的那些年月里，外祖母除了操持家务，教育四个孩子，给他们做衣服，还进了助产学习班学习，以后成了一名优秀的助产士。她很喜欢孩子，热爱生命，她认为她的工作非常好，因此工作给了她极大的精神上的满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她开始到军医院去护理伤员，她一生都珍藏着那些治愈出院以及愈后回家的伤兵写给她的信，这些信给我看过。她满怀激情和热爱地保存着它们。在这些年里，她在家中给士兵做衬衣，做得又快又精致，像她做一切事情那样。

应该指出：虽然外祖父、外祖母都十分勤劳，并生有一双巧手，但他们在自己的个人生活中，却是非常不讲实际的人。最后这些年，他们有时住在我们祖巴洛沃，有时住在安娜家中，他们享有微不足道的，或者说是象征性的老布尔什维克的特殊待遇：得到一些可怜的“供应”，他们两人都极其蔑视人世间的荣华富贵。他们都仍旧穿着革命前的衣服，一件大衣一直穿了二十多年，他们的短大衣是外祖母用旧大衣改的，她会用三件旧衣服改成一件新的、挺体面的衣服。这决不是虚伪的禁欲主义，这不过是因为他们对生活没有过多要求，或者是完全不了解（也可以说是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我们社会中所处的新的“很高”的地位；那些“至高至圣的”显贵人物的亲属们处于这种地位时，会利用它为自己，为自己的一切远近亲戚建立起豪华的生活。他们两人甚至于连想都没有想到过。

妈妈自己在生活上的要求极其简朴，直到她生命的最后



几年都是如此。在柏林代办处工作的巴维尔舅舅给她捎来几件好衣服，穿起这些衣服她漂亮得使人倾倒……但是平时她穿的都是家里自己做的最朴素的衣服，她的“好”衣服很少是裁缝做的，虽然如此，她仍然极其标致。

外祖父、外祖母完全摆脱了小市民的贪婪的思想意识，竟遭到一些人的非议，他们说：瞧瞧这两个“穷老头子、穷老太婆”，他们的女婿难道就不能给他们穿戴得好些？……可是他们的女婿自己也是夏天只穿着一身斜纹麻布的军便服，冬天是同样的毛料制服，呢大衣已经穿了十五年，他有一件样子特别怪的皮短大衣，面子是翻毛鹿皮，里子是灰鼠皮，大概是十月革命后不久给自己“制办”的；还有一顶皮帽子是冬天戴的，他一直用到去世之前。

这一对“穷老头子、穷老太婆”，这一对“马克思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有着具有生命力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永恒的坚强精神。

父亲很早就认识阿利卢耶夫夫妇了，那是在九十年代末。他非常敬爱这对夫妇，而他们也同样敬爱他。他们与工人地下小组最初会见的情景，我外祖父在他的回忆录里已经写得很多，这里我就不再重复了。曾有过这样一个家庭传奇故事：1903年我父亲还是一个青年人的时候，救过我妈妈的命。这是在巴库的时候，我妈妈才两岁，她在海边玩耍，掉到海里去了，是父亲把她从水里拖出来的。以后她又遇到父亲时，已经是十六岁的中学生了，而父亲刚从西伯利亚回来，他是一个流放的三十八岁的革命者，是全家的老朋友，那么对于具有浪漫

主义情调而又富于感情的妈妈来说，他们之间的故事以这样的情节开端，自然是有着巨大的意义的。

我又能记得什么呢？我只记得外祖父和外祖母经常住在我们的祖巴洛沃别墅，虽然他们的房间各占房子相对的两头。他们和父亲坐在一张桌前吃饭，外祖父称呼父亲的名字，叫他“约瑟夫，你”，而外祖母称他为“约瑟夫，您”，父亲则尊称他们的名和父名<sup>①</sup>。是的，我记得母亲死后的一些情形。外祖父、外祖母对母亲的死所承受的痛苦是可怕的，但是他们了解得很清楚：父亲受到的痛苦是多么大，因此他们和父亲的关系一点也没有改变（过去我曾经觉得是这样，现在也觉得是这样）。他们都从来没有谈过他们这一共同的痛苦，这种痛苦是看不见的，但是存在于他们之间。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当我们的家已经七零八散了的时候，我父亲越来越躲着外祖父和外祖母，不见他们。战前父亲还看望他们，他偶尔到祖巴洛沃这个老窝来，一般是在夏天。这时大家都聚在林中的餐桌前，在新鲜空气里用午饭。然而，这些访问一定会引起父亲对往事十分痛苦的回忆，因此，他走的时候，总是情绪很坏，不高兴，有时还和孩子争吵几句。外祖父、外祖母倒常去看望他。

外祖父常到我们克里姆林宫的寓所来，来时就坐在我的房间里久久地等候我父亲回来吃午饭。我家通常是晚上七、八点钟才吃午饭，在父亲下班后从党中央或部长会议（那时称苏维埃人民委员会议）的办公室回家的时候。父亲从来不一个人

---

① 这样称呼是表示尊敬。

吃午饭，因此在最好的情形下，外祖父顶多能和他同桌吃饭，外祖父总是缄口无言……有时父亲也拿他的回忆录开几句小玩笑，但由于对这位老人的尊敬，他从来不允许自己开什么粗鲁的玩笑。有时，父亲带回一大帮人，外祖父就叹口气说：“好吧，我回去了。下次再来。”可是下次要再过半年或一年了，他不能来得更早，大概这对他是一种沉重的刑罚。由于他待人接物很有分寸以及异常奉公守法的性格，外祖父从来没有向父亲问过他女婿雷登斯的命运，虽然他女儿安娜的命运，他女儿以及他的几个儿子的被毁掉了的生活都使他忧心如焚。他沉着地、默默无言地忍受这一切，有时他小声地吹起口哨来——这是在他身上刚出现的一种新习惯。

他生有一身傲骨，从来不向人要什么，决不去恳求什么，乞求什么……那些没有自尊心的、缺乏人的尊严的人们是不能理解这一切的。怎么？生活在这样一个人的身边，而无所求？！是的，毫无所求……

外祖母在这个意义上讲简单得多，也自然、天真得多。平时她总是积下一堆纯粹生活上的诉苦的话和要求，及时地在方便的场合去找列宁，列宁认识而且尊敬他们一家人，后来她就找父亲。虽然战争破坏时期和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早已成为过去，但是由于外祖母不善于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往往在最必需的生活物品上发生困难。母亲不好意思多帮助自己的亲人，不好意思“什么都从家里拿出去”，也是由于她能够在自己面前建立起各种道义上的障碍，所以束手无策的外祖母就去找父亲。举个例子说吧，她请求我父亲说：“啊！约瑟夫，你

想想看吧，我什么地方也买不到醋！”这时父亲就哈哈大笑，而母亲就气得要死，但一切很快就完全加以处理了。

母亲死后，外祖母在我们家里觉得很拘束。她或者住在祖巴洛沃，或者住在克里姆林宫里面她那小小的、干干净净的一套房子里，她一个人住着，周围是她的旧照片和那些一生中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始终带来带去的她自己的旧东西：古老的、已经磨秃了的高加索地毯，一张一直用着的高加索沙发床，上面铺着床毯，靠床的墙上挂着壁毯，床上堆着枕头和圆形长枕<sup>①</sup>，那些小木衣箱总有百年之久了，还有彼得堡的便宜的小摆设——到处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井井有条。我很喜欢到外祖母家去，她那里很安静，舒适，温暖，但是那里有着无限的忧伤。她又有什么愉快的事可说呢？

外祖母的精力和对生活的热爱简直是用之不竭的。人已七十高龄，看起来还很精神。她个子小小的，头扬得高高的，挺拔而高傲，因此也显得比实际高一些。她从来衣着整洁，都是拿自己的旧东西亲手拼凑出来的，在腕上缠着一串琥珀串珠，头脚整整齐齐，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她一直漂亮：没有皱纹，也没有任何衰老的迹象。最后这几年她常常心绞痛，这是心灵的痛苦和忧伤的结果。她痛苦地想，又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她的女儿安娜进了监狱？她给父亲写过信，这些信也曾交给了我，后来她又要了回去……她懂得这样做是什么结果也不会有。对待我们家庭蒙受接踵而来的不幸，她抱着

---

① 高加索软榻上的长圆形的垫枕。

某种宿命论的态度，好象事物本来只能如此。

1951年初春，外祖母因心脏骤停而逝世。总的说来，她死得相当突然，终年七十六岁。

两个孤独的老人——外祖父和外祖母没有因为自己的疾病痛苦给别人增加什么麻烦。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有什么疾病，和周围人们的来往中，他们总是礼貌周到，和和气气，同时沉着矜持。西班牙有一句俗话说：“树木是站着死的”，这句话恐怕指的正是这样的老人。

现在当我自己有了一个成年的儿子，再过两三年我将有孙子，我很惋惜以前不了解外祖父和外祖母。可是，难道孙子能了解祖母吗？孩子能了解父母吗？我们曾认为外祖母是个好吵闹的、麻烦的老太婆，我们更爱外祖父。但是他们两个人，尽管方式不同，都是真理和纯洁的骑士。而我们，他们的孙辈能用什么更好的品质和他们这些情操相比呢？

## 5

是的，这些树木是站着死去的。他们的子女，每个人的命运都很悲惨，无一幸免，虽然各不相同。生活以其力之所及摧毁了他们每一个人。也许这就是本世纪的命运吧？或者，也许是他们每人都太脆弱，经不起那能够摧毁比他们结实得多的树干、能够连根拔掉百年大树的历史的冲击吧？但无论如何，他们没有一个人逃避过时代，他们自己的时代，恰恰相反，他们全都投身于事变的漩涡之中，他们永远献身于共同的大生活之中，而不是沉醉在个人的小天地里。

巴维尔是妈妈最爱的哥哥，也是她最好的朋友，外形内心都很像她，比起妈妈，只不过他比较温和，比较随和。说也奇怪，他竟成了一个职业军人。

他成了军人，并非出于他的选择，因为革命和内战开始了，他就去参军打仗。他到处作过战：在阿尔汉格爾，在土耳其斯坦，和英国人，和巴斯马契<sup>①</sup>匪帮，和白卫军，都打过仗。

---

① 巴斯马契匪徒是中亚细亚反革命武装，1918—1924 年和红军作战达六年之久。

内战结束了，命运给他提供了一次极其有趣的旅行：列宁指示他跟尼·乌尔万采夫的考察队去遥远的北方寻找矿石和煤炭。他在考察队的职务是辅助性的，他是军人，不是科学家，但总应该有人保护和关怀那些在荒无人烟的野外工作的科学家们。考察队在诺里尔卡河流域发现了巨大的煤矿和铁矿，正如尼·乌尔万采夫所设想的那样。现在这里屹立着我们的北方城市诺里尔斯克，高层的大楼、商店、电影院、游泳池，应有尽有。可是那个时候，考察队住的是兽皮帐篷，骑的是鹿，周围的一切就像杰克·伦敦在他的小说里描写的那样。至今巴维尔的子女还保存着当年的像片，那上面有鹿，有狗，人穿着带风帽的鹿皮大衣，四周是一片白茫茫的荒无人迹的原野……尼·乌尔万采夫现在住在列宁格勒，有关那些年月里他自己的丰功伟绩，我不知道他是否已经写了些什么或者将要写点什么。

在二十年代末，巴维尔舅舅作为苏维埃的军事代表派驻法西斯尚未执政的德国，公开身分是派往商务参赞处工作。他是带了家属走的，在德国住了很多年。

大概这是母亲最困难的年月，舅舅不在，她很想念他……他不时给妈妈捎来一些女人喜欢的东西：一件衣服，一瓶好香水等等。当时人们都过着禁欲主义的生活，也很少想到这些东西。可是父亲对待“外国的奢侈品”持清教徒的态度，他甚至于受不了香水的味道，他认为女人身上只应该发散着来自清洁与健康的芬芳……所以母亲“偷偷地”为这些馈赠而欣喜，虽然如此，香水还是用了起来，而且这种香气永远和她

的音容笑貌一起留在我的童年记忆之中。从她的身上、手上发散出一种奇妙的芳香……晚上当我已将入睡的时候，她有时来到我的房间爱抚地摸着我的头，她走后我久久地闻着我的枕头，渐渐沉入梦乡……这种说不出的芳香很久很久地留在我的房里……

有一次母亲到查礼温泉<sup>①</sup>（当时叫查礼巴德）去，顺便到在柏林工作的哥哥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她此行之后，我们家里出现了几件给我和我哥哥瓦西利的十分漂亮的小毛衣。自然，对那些年月来说，这些东西都是不得了的奢侈品。为了我们这些孩子们不受资产阶级欧洲的腐蚀性的影响，大家告诉我们，说这是妈妈“从列宁格勒”带来的，我们有相当长的时间都相信这是真的……可是我父亲一生中总是满脸不高兴地问我：“你这东西又是外国的吗？”可是当我回答说不是外国的，是我们国产的时候，他就笑逐颜开了。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我已长大了的时候……如果，啊，上帝保佑，我身上有花露水的香气时，他立即把眉头皱起来，然后厉声地说：“也学这种样子，擦起香水来了！”

其实根本不必要给母亲灌输清教徒的清规戒律，因为她的生活方式就是在那些年代来说也是极为朴素。已经十分洁身自好的了。这是指当年“上层”，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生活标准相比，她的哥哥不过是有时由于自己善良的心肠想要娇惯妹妹一点就是了。

---

<sup>①</sup> 捷克出名的温泉。



母亲死的那一天，可惜巴维尔舅舅远在德国。他当时所能做的事只是从自身寻找力量，使自己能够相信这一骇人听闻的消息……

后来，他住在莫斯科。我记得他总是穿着军装。他在国防部装甲兵局工作，是一位将军（按现在军衔算），他也是装甲兵局的创始人和组织者。

他个子高高的，人瘦，腿长，很像外祖父，他有着一双忧伤的，但又极其温柔而善良的棕色的眼睛。他十分宠爱我和我哥哥，特别在母亲去世后，他总是抱着我们坐在他的膝上，吻我们并缠绵地对我们说许多温柔的话。

最后的一段时间，即在1938年他去世前不久这段时间，他常到克里姆林宫我们家里来，也是久久地在我的房里或瓦西利房里坐着，等候我父亲回来，他和外祖父、阿廖沙·斯瓦尼泽舅舅一模一样地等候他……看样子，见到父亲是不容易的，这使巴维尔舅舅非常难过；他常常叹气，十分忧愁。我记得有一次，他带着全家，以及其他我们的近亲，到我们勃利日尼别墅来看我父亲，好像是过新年或是什么人过生日。父亲很爱巴维尔舅舅和他的孩子。饭桌上高高兴兴，像最亲近的普普通通的人一样。

1938年，当亚力山大·斯瓦尼泽舅舅和他的妻子，安娜姨妈的丈夫雷登斯都已被捕后，巴维尔舅舅不止一次找过父亲，坚持要保那些被卷进这一巨浪中的他的军队里的熟人……但都毫无结果。1938年秋天巴维尔舅舅去索契休假，这对他的心脏病是有害的。当 he 从索契休假归来，回到装甲兵局工作

时，已经找不到和他在一起共事的人了……司令部被捕的人是如此之多，就像被一把扫帚全扫了出去似的……巴维尔舅舅心脏病犯了，他因心脏骤停，死在办公室里。

以后，当贝利亚在莫斯科已坐稳他的交椅，关于巴维尔舅舅的死，他捏造了许多说法，而且不遗余力地说服父亲相信他的这些捏造，甚至于他的遗孀叶甫根尼娅舅妈被怀疑毒死自己的丈夫，以及其它只有上帝才知道的什么说法……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最简单不过的，这就是：不是每一个人的心脏都能经受得了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巴维尔舅舅和外祖父及母亲一样，都是沉默寡言，遇事从不表露形色而且文质彬彬有分寸的人。他把自己的痛苦深藏在心里，因此在某一时刻，痛苦就一定会从心里面把他杀害……

贝利亚到底不甘心就此罢手。1948年，在巴维尔舅舅去世十年以后，到底把他的孀妇送进了监狱，此时除了指控她进行各种“间谍活动”外，还控告她十年前毒死了自己的丈夫……以后她就和十年前已经枪毙了的雷登斯的孀妇安娜·谢尔盖耶芙娜一起，各判处十年单身牢房监禁，直到1954年她们两人才被释放。

安娜·谢尔盖耶芙娜是我妈妈的长姊，妈妈对她不像和她的哥哥那样亲近，但两人是很友爱的。她的性格、气质都和妈妈不同，但也决不是有着和妈妈对立的性格和气质。她是善良的化身，一种能原谅一切事物和一切人的、理想的、彻底的、基督教精神的体现。我不知道我还能指出谁，能像她那样

一贯地、顽强地、从少年起一直到今天的一生中，把自己完全献给别人——去帮助他们，关心他们的事情，永远是先想到别人，最后最后才想到自己。

父亲最恨她那基督教的原谅一切的精神，称她为“无原则的”“愚蠢的人”，说“她的善良比卑鄙下流行为都坏”。妈妈也抱怨说：“纽拉<sup>①</sup>把孩子都惯坏了，把她自己的和我的都惯坏了。”因为安娜姨妈爱我们，疼我们所有的孩子，对孩子们的胡闹和淘气都装着没看见。她的这些作法并不是自觉的，有“哲学”根据的行为，很简单，这是出自她的天性，否则她也生活不下去。

曾几何时她也非常漂亮，身材苗条，面庞的线条细腻得像雕出来的一般，比妈妈长得更端正，有一对棕色的眼睛，牙齿整齐漂亮，和她家的兄弟姐妹一样。她皮肤也黑黝黝的，手臂纤细，也生就一副东方的异国情调的面貌。她很早就结了婚，以后发胖了，也就再不注意自己的体形，也不管自己的外貌，像一些天生美丽的人们常持的态度那样。和整洁、严肃的妈妈不同，她总是邋里邋遢，衣服也穿得没有样子，头发用一个圆梳子卡到后面，不讲任何发型，举止也不拘小节。为人们，给人们做好事，做好事——这就是她的座右铭，这就是她的生活的全部意义，她完全不管她是否有可能去做这些好事。她简直一点也不去想自己的外形，不想收拾得像个样子。

妈妈非常厌恶她那过分直率的性格和不修边幅的作风，

---

· ① 纽拉是安娜的爱称。

厌恶她家里乱七八糟毫无秩序，以及那些和妈妈截然相反的东西。尽管如此，她还很爱姐姐，关系也很好，她们也有着共同的观点——深刻的人道主义和对人的信任。

安娜·谢尔盖耶芙娜的家务完全落在塔琪扬娜·伊万诺夫娜<sup>①</sup>的肩上，她是极好的老保姆（是我的保姆的好朋友），她把女主人完全从厨房和管理孩子等工作中解放出来。安娜的丈夫斯坦尼斯拉夫·雷登斯是一位波兰布尔什维克，捷尔任斯基的老战友，“安妮契卡”<sup>②</sup>非常崇拜她的丈夫，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好、最公正、最正派的人，以前这样认为，现在仍然这样认为。我只记得，他长得很漂亮，面容富有朝气，他那微笑使人人为之倾倒，他为人善良，和我们孩子在一起时，总是高高兴兴。他们有两个儿子，都一半像波兰人，一半像南方人，他们长大后，既善良又温顺，很像母亲，长得又十分标致，很像父亲。

有人说雷登斯性格粗暴，人很骄横，不能忍受相反的意见——但是，一切我不记得的、我不知道的事我都不敢妄自判断。

内战以后，他是乌克兰契卡的负责干部，他曾和全家一起住在哈尔科夫。后来他调到格鲁吉亚契卡工作。在这里他初次遇上了贝利亚，贝利亚是想领导格鲁吉亚的契卡的。他们两人谁也不喜欢谁。雷登斯是捷尔任斯基的学生，而贝利亚把格鲁吉亚看作自己未来的领地，并把它做为以后向上爬，取

---

① 塔琪扬娜的爱称为塔尼亚，文中常用两种称呼。

② 安娜的爱称，是家人和她丈夫对她的称呼。

得权力的战略基地……很快雷登斯就被挤出格鲁吉亚，以后贝利亚就登上了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宝座。

贝利亚这个人像魔鬼般地缠住了我们的家，他毁灭了我们家一半以上的成员。关于他这个人物，我以后还要谈到。我现在要告诉你：有一位高加索的老布尔什维克欧·格·沙图诺夫斯卡娅很了解贝利亚扮演的角色，早就把他认识清楚了，她给我讲了当年的许多事情。实际上，所有外高加索的老党员早就把他看得一清二楚了，如果不是贝利亚狡猾地骗取了父亲的莫名其妙的支持，那么无论是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以及那些十分了解外高加索的情况和该地内战进程的一切人，都不会允许提拔他。以后，时机一旦到来，他首先消灭了这些人。

三十年代初期，雷登斯在莫斯科契卡工作。他的地位很高(1936年他就是第一届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使安娜姨妈有条件不出去为生活而工作了。但是安娜姨妈是天生的社会活动家，她将毕生精力和时间都用于关心别人，给人安排某些事情，照管某些孩子。她并不去积攒家私，像其他的显要的“契卡夫人”那样浑身外国货，她没有时间做这些事。她从不注意流言蜚语，常说：“我这样我丈夫也爱我。”她常常听到一些闲言闲语，说她丈夫对她不忠——谁知道呢，也许有这样的事，他又不是圣者——但这些话都不能影响她，因为她身上没有妒嫉这种感情。听到这种话她会笑起来，而且一再说：“咳，别傻啦！我丈夫爱我，我也爱我丈夫，我管他有没有别的什么事呢！”这并不是故做姿态，因为她真心实意地信任他，相信他

对自己的感情的忠实，像她相信每一个人那样。

1938年贝利亚调到莫斯科内务部工作，这对雷登斯是不祥之兆，他很明白这一点。贝利亚来后，雷登斯马上被派到哈萨克斯坦内务部去工作，于是他带着全家到了阿拉木图。他在这里没有呆上多久，很快被召回莫斯科，他回来时心情沉重，此后，就再也没有人见到过他……

后期，他也和巴维尔舅舅一样，想办法见父亲，力保他的同志；据安娜·谢尔盖耶芙娜说，他曾和我父亲发生了争吵。我父亲不能忍受别人干涉他对某人的评价。

如果父亲已经把某一老相识从心中抛弃了，如果在他内心深处已经把这个人列入“敌人”的行列，那么对他谈这个人的问题，就完全不可能了。再“翻转过来”，把这个“敌人”，臆想的敌人放回朋友的行列，对他说来那是办不到的，因此任何类似的尝试，都会使他大发雷霆。所以无论是雷登斯，还是巴维尔舅舅和亚力山大·斯瓦尼泽都无能为力，他们取得的唯一成果，就是他自己完全丧失了和父亲接触的机会，也失去了父亲对他们的信任。父亲和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和他们每一个人分手时，已经潜在地再也不是他个人的朋友了，也就是说，已经是“敌人”了……

可是他们每一个都是很诚实的人，他们和父亲谈话都十分坦率爽直，他们谁也不善于去拨弄他那根构成他的弱点的心弦，因为他们是老相识，不想在他面前花言巧语，他们认为这不但不必要，而且是不可以的，因此他们全失败了……

雷登斯被捕后，安娜带着孩子回到莫斯科。和其他人不

同，给她留下了原来的房子，但不允许她到我们家，到祖巴洛沃来，我那时还是个小女孩，只有十一岁，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人们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家里没有人了？有些模模糊糊的说法，似乎斯坦尼斯拉夫姨父原来不是一个好人，这些我还不能完全意识到。我只越来越感受到周围的空虚，没有人，除了我的学校和我的仁慈的保姆外，我什么也没有了……

安娜·谢尔盖耶芙娜丝毫不相信她的丈夫会是敌人，会是一个不诚实的坏人。她也不相信他已被枪决，虽然我父亲早在战前就残酷地把这一消息通知了她。父亲想用这种方法迫使她相信，雷登斯是“敌人”，可是她根本无法想象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她非常需要相信的是：他还活着，他是忠诚的人，他会回来的！——她确是这样相信的。

外祖父和外祖母尽他们一切可能支持她。她仍然和以前一样，为别人的事情奔忙，帮人办事，照管别人的孩子。那些老一辈的党内知识分子，她丈夫也属于他们这一类人，全都和她站在一起，没有抛弃她，她的朋友这样做是光荣的。

她有着一個极其正直的人所具有的纯朴和天真，这样的人因为自己不能做任何坏事，所以也决不会怀疑别人能够做坏事。她常说：“我要去见伏罗希洛夫（或卡冈诺维奇，或莫洛托夫夫妇）。”因为他早在乌克兰时就和斯坦尼斯拉夫关系很亲密了。

她去了，虽然别人处在她这种地位，这样悲痛处境，决不敢去走这一步的。她去了，她是做得对的，他们接待了她，款待了她，设法安慰她，说了许多温暖的，恳切的话。大门魔

术般地在她面前敞开了，接待了这个长得小小的，衣冠不整的，可怜无告的人，她那昔日的美貌只剩下一双温柔的棕色的眼睛了。她温顺地低诉，她已经没有什么强大的力量可以依靠——相反，谁都知道，我父亲已经和她断绝了关系，她已经不再进出我们的家门了。

战争后期，她帮外祖父抄写回忆录。有人建议她写阿利卢耶夫一家的生活，写革命——一个年轻的中学生的印象。她缺少文学素养，自己写不了。但是她口述给一位名叫妮娜·巴姆的编辑，经过她加工写成了一本书。我觉得这本书写得没有什么意思，而外祖父自己写的那些回忆很有个性，人物逼真。妮娜·巴姆的书写得更像一部虚构的文学作品，而不像作者安娜姨妈本人，值得由一位善于刻画人物的作家为她写一本能够真正表现她的性格的书……

即或如此，1947年这本书出版时，仍然使父亲大为震怒。《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摧毁性的书评，该文作者是费多谢耶夫，其粗暴蛮横、骇人听闻的武断和不公正甚至于到了如此的地步，大家猜测，个别的极其尖刻的提法一定是出自我父亲之手。

除了安娜·谢尔盖耶芙娜以外，所有的人全都快吓死了。她无视这篇书评，因为她认为这篇书评既不公平也不真实。她知道书评中的那些话都是错的，她还要求什么呢？至于我父亲非常生气，她并不害怕；她非常了解我父亲，对他再清楚不过了，在她看来，他也是一个有弱点和错误的人，难道他就不会犯错误吗？她一笑置之，并且说：她还要继续写她的回忆录。



可是她未能如愿以偿。1948年开始了逮捕的新浪潮,当那些从1937年起已经服刑十年的人们又重新被投入监牢或送回流放地时,安娜没有能逃脱这一命运。和她一起被捕的有巴维尔舅舅的寡妻,科学院院士林娜·施特恩<sup>①</sup>,洛佐夫斯基<sup>②</sup>以及我妈妈的老朋友莫洛托夫的妻子波林娜·谢苗诺芙娜·日穆楚仁娜。

1954年春天安娜姨妈被释放回家,她过了几年单身牢房监禁的生活,但大部分时间是在监狱医院里度过的。来自外祖母的姐妹的可诅咒的遗传性——精神分裂症的征兆在她身上出现了。安娜·谢尔盖耶芙娜没有经受起命运对她的一切挑战。

当她被释放回到家中时,情况十分可怕。她出狱的第一天我就看到了她——她坐在房里,连两个成年的儿子都不认识,对一切事都很冷漠。她两眼模糊,盯着窗子,对一切新闻和消息都无动于衷:我们告诉她,我父亲已故去,外祖母也逝世了,我们的死敌贝利亚已不复存在于人间等等,她都毫无所动,只是一句话不说地摇摇头。

从那时起已经过了九年。安娜·谢尔盖耶芙娜好了一些。

---

① 林娜·索洛莫诺芙娜·施特恩(1878—?),著名生理学家,毕业于日内瓦大学,1925年从拉脱维亚来到苏联。1925—45年在第二医学院任教授,兼任生理学研究所所长。1953年在“医生阴谋”案件中受牵连。从1954年以来是苏联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非正式研究员。

② 洛佐夫斯基·阿(真名:索洛门·阿布拉莫维奇·德利德卓,1878—1952),1909年移居国外,1917年回国,曾任苏联工会领导人,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苏联情报局局长。1949年因与“反世界主义”运动有关联被清洗,1956年宣布恢复名誉。

她的呓语和狂想状态已经停止，只是有时候夜里还有自言自语的毛病……她的生活和以前一样，又积极从事各种活动。她重返作家协会，参加“文学工作者之家”的一切会议、讲座和座谈会。她有许多老相识，老朋友。她又重新去帮助她力所能及的一切人。当她每月领退休金的那一天，她认识的那些老太婆，就一个接一个地到她家去，她把钱分给她们，明知道她们是无力归还的……还有一些和她完全不相识的人也来求她帮助：有的要办莫斯科的户口，有的要求安排工作，一位年老的女教师家庭不和无处安身，等等。安娜·谢尔盖耶芙娜倾听他们的要求并努力为他们去办一些事……她跑莫斯科市苏维埃，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接待室，她给中央写信，当然不是为她自己，不是，而是为了某一个有困难的人，某一个没有退休金无法活下去的生病的老太婆等等……

到处有人认识她，大家都怜惜她，尊敬他，唯一例外是她的两个儿媳妇，一对长得漂亮的市侩。她家里的生活是可怕的，没人听她的话，什么事也不问她。要是他们需要去看电影，就把孩子丢给她管。每当举行家庭青年晚会时，她是不受欢迎的人，因为她这老太婆服饰不整，穿着一件大肥袍子，一头蓬乱的白发，爱随便说话……这时她就拿上她那很陈旧的手笼或一个什么袋子（当作提包用）出去散步。在大街上久久地和民警聊天，询问清洁工人身体好不好，或者买一张票去乘汽艇。如果是在革命前，人们会认为她是得了道的神人，会在大街上向她鞠躬致敬。

这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她中学毕业后，进了精神-神经

病理学校，她性情温和，非常有同情心，对人诚恳，本来可以成为一名理想的精神病科医师；可是命运把她推到了相反的方向，她自己成了一个精神病患者……

愿上帝保佑健康的人们，保佑思想健康的人们能学习到她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她的智慧。

多少年来，她一直为我们大楼\* 的住户建立幼儿园发动各种运动。我们大楼有五百套房子，不少孩子有保姆陪着散步，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种可能。因此安娜·谢尔盖耶芙娜向各级领导呼吁建立幼儿园。她有精力，有时间，虽然她有心脏病，有肺气肿病，年青时患过结核病，肺也不怎么好。现在还没有什么结果，领导认为没有建立幼儿园的必要，在我们这个很像一个石头口袋的阴暗的院子里，连个儿童游戏场也没有。

她是个行善的人，是个圣者，是个真正的基督徒，然而她又是一个新人，是属于未来的人……她是俄罗斯真正的女儿，是纯粹的俄罗斯才有的现象，古典的，典型的，陀斯妥也夫斯基小说里的人物。她从来不议论人，也不责备人。在谈论“个人崇拜”问题时，她往往不能自持，心神不宁，胡话连篇。她气愤地说：“总是言过其实，我们的什么事都言过其实！”她说：“现在全推到斯大林身上了。斯大林的事是很复杂的。我们知道他，他的一生是很复杂的，不是什么事都很简单……他本人流放过多少次，也不应该忘掉这些！也不应忘掉他的功

---

\* 指政府宿舍大楼，位于卡门尼桥附近。

劳!”

她总是相信雷登斯还活着。虽然已经把为他死后恢复名誉的正式通知寄给她。她仍然以为他现在还在北方的某个地方：如马加丹或科雷玛，有了新家（她说：“过了这么多年了，这是很自然的！”）——所以，很简单，他不愿意再回来了。有时不知她是作梦梦见了他，还是有过幻视，然后她坚持说她见到了丈夫，并和他说了话。

她生活在她自己的世界里：往昔的回忆，久远的岁月，幻觉和阴影同今天的生活混成一片。只是监狱的六年她从不重提。她的记忆中只留下美好的、有趣的事，她认识的许许多多优秀的人物\*。

长期以来，她总是劝我写下我能知道的、记得的一切事物。我固执地拒绝了。我觉得这是谁也不需要的，而且多有不便，有失分寸，甚至卑鄙……我的朋友，你看，是你改变了我的看法，说服了我，现在我已无法使我的笔停下来了……现在，一切我知道的事情对我来说，已上升为最有意义、最必需、最重要的了。

为了结束对我母亲的弟兄们的记述，我应该提一提费多尔舅舅。他也没有逃出他们全家的共同的命运，只是和别人比起来，命运使他的生活毁灭得更早一些罢了。

他年轻的时候长于数理化，在这方面有着非凡的才能。革

---

\* 安娜于1964年8月故于克里姆林宫郊区医院。自从坐牢以后，她特别怕锁着的门，可是，不管她多次反对，有一次，夜里仍把她锁在病房里，第二天早晨发现她已死去……

命前，完全是由于他的天赋的才智，被接纳进了贵族海军军官学校，成为海军少尉候补生，不久就爆发了革命和内战。

当然，他也参军打仗去了。打仗的时候，他想做侦察工作，卡莫<sup>①</sup>决定要他，这个传奇式的人物，大无畏的卡莫在梯夫里斯时就是外祖父、外祖母的好朋友。但是他这次吸收费多尔参加他的工作却是考虑不周。他本人和他的侦察员（有着钢铁般的神经的人物）能够经受得住一切，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而别人是做不到的。

卡莫喜欢对自己的战士进行“忠诚考验”。有一回他组织了一次突然袭击的演习：整个机关都被摧毁了，全体人员被俘，被捆了起来，一具血淋淋的军官的尸体横卧地上……就在这尸体旁边是他的心脏——一块鲜血淋漓的东西……现在要看那被俘的战士将怎么办？看看他们的表现如何？

费加<sup>②</sup>没有经受住“考验”。他一看这个场面，马上疯了……他病了很久，病了一生，这个善良，聪明，如饥似渴地阅读各门科学的书籍，无休无止地写文章，写书，写剧本等等的人，成了一个终身的半残废。他以后靠退休金生活，六十岁上故去，一生没有做出什么事情；但是他已经把自己的命运、青春、健康、才能、炽热的心，全部无遗地献给了革命，他做了他能做到的一切。他当然无从知道，大概他的头脑适合于在办

---

① 卡莫（赛米翁·阿尔沙科维奇·台尔—彼得罗斯扬，1882—1922），1903年成为布尔什维克，几次被捕又逃跑。在斯大林指导下1907年曾在梯夫里斯和库台希组织抢劫银行的行动。革命前曾四次被判处死刑。1917年后在“契卡”和红军中工作。在一次车祸中死亡。

② 费多尔的爱称。

公室里做工作，也许这才是命运指给他的道路，在这里，比在那群卡莫的只会杀人砍头的队伍里会对革命有益得多……

但是，人是不知道自己的道路的。他喜欢去的地方，那里剑光闪闪，炮声隆隆，红旗飞舞……

我不怎么了解费加舅舅，见面的次数不多。他很爱我妈妈，也爱我们——她的孩子。疾病使他变得很腼腆，孤癖，病魔夺去了他的一切，甚至于没有可能成个家。和其他兄弟姐妹不同，他长得不漂亮，但是他那双棕色的、温柔的眼睛却十分美丽，象典型的精神病患者那样，他衣冠不整，吃起来乱七八糟，不会取得外人的好感，但是亲人和朋友却了解他学识渊博，读书万卷，有一颗善良的心。我父亲很可怜他（虽然常取笑他的举止古怪），可是避免和他见面。

外祖父、外祖母的所有的子女都十分敏感，非常善良，具有同情心，因此在这样光怪陆离的生活中，他们不能不落得百孔千疮……他们都天赋甚高，才华出众……但没有一个能够终其天年，没有一个获得平静的从事创造性劳动的生存权利，他们也没有一个人去追求脑满肠肥的市俗的幸福。

我还没有谈到我母亲。我会讲的。请等一等，谈她我感到非常困难。请等一等，以后我会讲的。我已经老是谈到她了，难道你在我外祖父、外祖母、安娜姨妈、巴维尔和费加舅舅身边没有见到她吗？难道你没有看到他们都多么亲密又多么相似，难道你没有看见这都是多么相同的心灵吗？

我在想复活那些流逝的年华，往昔充满阳光的童年的岁月，因此我谈了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克里姆林宫和祖巴洛沃的

人员众多的共同生活的参加者。我还必需给你讲一下斯瓦尼泽夫妇——亚力山大·谢苗诺维契(我大哥雅沙的舅舅)和他的妻子玛丽亚·阿尼西莫芙娜,他们当年和我父亲、母亲的关系都很亲近。



## 6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在我们全家人的心上，格鲁吉亚是我们的故乡。对外祖父、外祖母，对我妈妈，对一切人来说，格鲁吉亚阳光灿烂，人民感情热烈，公侯和农夫都天生温文尔雅，这是一块很不平常的地方，受到俄罗斯诗人的歌颂赞美。但是它活在我们一家人的心中，完全不是因为格鲁吉亚是父亲的家乡，恰恰相反，也许他最不欣赏它，他爱俄罗斯，他爱上了西伯利亚，爱它那严峻的美和粗犷沉默的人民，他完全不能容忍格鲁吉亚人向他表示的“封建的敬意”。只是到他年老的时候，他才想起了格鲁吉亚。

也许，对格鲁吉亚的感情的一致也起了作用，我父亲已故的第一个妻子叶卡捷琳娜的亲戚和我妈妈以及妈妈的亲人都彼此来往密切，友好相处。很友好，也许母亲善于使人们感到在父亲家中和她在一起十分愉快；仿佛这就是她的家，她是这个家的主人，而父亲只是参加进来而已，因为他永远置身于政治激情、政治斗争、争论、分歧、会议的漩涡之中……



但今天我不能写那些过去的事。今天的生活，周围沸腾着的、光芒四射的生活，突然从四面八方向我袭来，不许我埋头于流逝的岁月，而把我带到另外的一个什么地方。

我的儿子去莫斯科上物理课去了，他准备参加医学院的招生考试。

非常奇怪，我父亲在八个孙儿孙女<sup>①</sup>中只见过三个——我的两个孩子和雅可夫的女儿。虽然他一向很不公正地对雅可夫十分冷淡，但是他的女儿古莉亚却在父亲心中唤起了真挚的怜爱。更奇怪的是：我的儿子，他是个半犹太人，是我和第一个丈夫生的孩子（父亲一直都不愿认识一下这孩子的父亲），也博得了他温柔的怜爱。我记得我父亲第一次见我的约西卡<sup>②</sup>时，我真害怕极了。孩子只有三岁，是个非常漂亮的孩子，长得像希腊人，又像格鲁吉亚人，有一双闪族人<sup>③</sup>的眼睛，睫毛很长。我当时想，孩子会勾起外祖父不愉快的感情，这是不可避免的事。但是我完全不懂感情方面的逻辑，当父亲见到孩子时，他喜欢得心都融化了。这是在战后他到祖巴洛沃的有数几次中的一次；这里已是人去楼空，从来不曾这样寂静，只住着孩子的保姆和我的病魔缠身的老保姆。学完大学最后一年，我就住在莫斯科，我这个男孩子就在“我的”传

---

① 俄语中孙子和外孙、孙女和外孙女是不分的，为简便计，都译为孙儿孙女。

② 约瑟夫的爱称。

③ 闪族人指西南亚洲及北非的阿拉伯人、叙利亚人、犹太人、埃塞俄比亚人，及古代巴比伦人、亚述人和腓尼基人。

统的松树①下长大。受到两位对人温柔体贴的老妇人的照料。父亲和孩子玩了半个小时，围着我们的房子转了一圈，也许是跑了一圈，因为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都步履轻快，行动敏捷。以后他就走了。我留下没有走，在“感受”和“消化”发生的事情，我宛如身飘九重天外。父亲的语言紧凑简洁，出自他口中的“你的儿子很好看！眼睛很漂亮！”就等于别人嘴里的长长的一曲颂歌了。我明白，我还很不懂那充满各种出人意事件的生活。以后父亲还见过约西卡两次。最后一次是父亲辞世前四个月，孩子七岁的时候，这时他已上学了。父亲说：“多么聪慧的眼睛！是一个聪明的孩子！”我又一次感到莫大的幸福。

说也奇怪，约西卡好像也记住了这最后一次会面，并在他的记忆中保存了他和外祖父之间产生的那种真挚融洽的感情。虽然像现代典型的青年人那样，约西卡的年青的思想是不问政治，但是他应该憎恨和“个人崇拜”有关的一切，憎恨那由一个人造成的种种现象以及这个人本身。

是的，他仇恨这种种现象，但是在他心中不把这一切和他外祖父的名字连在一起。他把外祖父的照片摆在桌上，这照片已经放在那里多年了。我从不干涉或者去指导他的感情。应该更多的信任孩子们。于是我又一次看到，我还不不懂那充满各种出人意事件的生活。

这样，我的儿子已经十八岁了，中学毕业了，在一切供他

---

① 松树在俄罗斯象征着故土。

可能选择的职业中，他选择了最人道的职业——做一个医生。我高兴，非常高兴他的决定。我真高兴极了。但我怕向他表露我的情绪，因为我怕他改变主意。

他是个漂亮、温顺、性情柔和的男孩子。我的女儿现在正和她的女友在树林中玩耍，她们两人生为女孩真是生错了，上帝应该将她们创造成一对孪生弟兄。她们爬墙，上树，骑自行车飞跑，在河里游泳，夜里就睡在房前的帐篷里，他们和狗和猫玩把戏，也打篮球。

我的孩子们不知道（也无须知道！）我在他们身旁享受着多么大的生活乐趣，他们在教育我，而不是我教育他们……他们在这森林中长大，我也曾在离这不远的地方长大成人，他们也呼吸着繁花似锦的草地和林间空地上的空气，也许他们 also 和我一样，以后将把这茹科夫卡村及其四野作为故土的形象永世珍藏在记忆之中，想到这一切使我觉得多么宽慰而陶醉。

现在说说我的女儿凯琪娅<sup>①</sup>，虽然我父亲喜欢她的父亲（像喜欢日丹诺夫全家一样），但凯琪娅没有能唤起他心中的特别疼爱的情感。他只看见过她一次，那时她只有两岁半，非常好玩。是个小脸蛋红红的，有一双樱桃般大小的黑眼睛的小东西。父亲见了她就大笑起来，整晚上都笑个不停，那天是1952年的11月8日，我母亲逝世二十周年。我们一句话也没有提起周年的事，我甚至于不知道父亲是否记得这个日子。然而我是不能忘记这个日子的。于是我带上孩子到别墅去看他，

---

① 凯琪琳娜的爱称。

虽然实现这样的事很不容易，因为在他的晚年非常难得安排一次我和他的见面。

这是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前的一次见面，是在他去世前的第四个月。我觉得他很满意和我们一起度过的这个晚上，高兴我们探望他。和往日一样，我们都坐在餐桌旁，桌上摆着各种好吃的东西——新鲜蔬菜、水果和坚果。有真正农家自酿的上好格鲁吉亚葡萄酒，这种酒在他晚年是专门给他运来的。父亲善于品尝名酒佳酿，他一小杯一小杯地慢慢喝下去。就是他滴酒不沾的时候，各种各样的酒也必须摆在桌上——通常都是有一排排的酒瓶放在那里。虽然他吃得很少，只是随便捡一点点东西吃吃。可是桌子上必须摆满各种食品，这是他这里的规矩。当然，孩子们把水果吃个够，他很高兴。他喜欢别人吃东西，而自己坐着看。

我为什么突然想起了这个晚上呢？因为，这是我和父亲同我的两个孩子在一起的唯一的一次。气氛非常和谐，他款待孩子们吃葡萄酒（这是高加索的习惯），他们都喝了，没有撒娇，没有闹，表现得不错，于是大家都很满意。

他是否愿意和我们在一起呢？和我们在一起他是否愉快呢？大概是的，但到最后他觉得疲倦了。他已习惯于自由自在的孤独的生活。我们和他分开生活已经二十年了，就是我们双方都有在一起生活的愿望，也绝不可能有一种作为家庭、作为一家人的共同生活把我们联结在一起。是的，我们双方并没有这种愿望……但这个晚上留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里，连孩子也是如此。

现在我们坐在我们的小花厅上，我的儿子在背诵他的物理，女儿在读她的科学幻想小说，猫儿米什卡在一旁咪咪地叫。天气很热。没有一点风，四周的树林中蜜蜂和马蜂在嗡嗡作响。菩提树的花已快谢了。正是平静的、使人晒倦的盛暑。四周的大自然静谧无声，秀丽而完美，它正在完成季节的推移，其余一概不管，不以物喜，不为人悲。

主啊！你的大地多么瑰丽，多么完美，每一棵草，每一朵花和每一片叶子都是这样完美无缺！在这可怕的、失去理智的浑浊的人世，你总是支持着人，给他以力量，只有大自然是永恒的、万能的，给人以力量和安慰、心灵的平静与和谐。

只有上帝遗弃和诅咒的人，才能去亵渎大地的美丽和庄严，想去毁灭那开着花的、那生长着的和使生活欢乐的一切。但是多么可怕，这样的疯子大有人在。这一事实本身是多么可怕，多么违背正义：疯子们提出某种“目的”，他们认为为达到这一目的可以去毁灭生命——不管是自己的，别人的，甚至最遥远的，不相识的人民，但是为了某一缘故而去毁灭生命本身就是贪婪残暴的行为……可是为了什么缘故呢？

任何国度的一个贫苦的，赤着脚，蓬头垢面，不认字的农妇都知道这是不应该的，是不允许发生的事。那些文明的人则认为是可以的。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的共产党人——则认为这不但是应该的，而且是必需的。

世界上有多少疯狂、邪恶、恶念，就有多少进步、智慧、知识、人道和友谊，全都置诸天平之上。我们一切人，我们的孩子，我们这一代人，我们的世纪就生活在这种凶险的平衡之

中。因此，我们必须相信善和善心的强大的威力。

我想，现在，在我们的时代，信仰上帝就是信仰善，就是相信善比恶威力强大得多，善迟早要压倒恶而取得胜利。在今天的世界上宗教的差别已经没有什么意义，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已经超越国度、洲际、语言和种族的界限，本能地学会了相互了解。

宗教之间教义的差别现在已失去意义。今天人们更趋向于区分为相信上帝存在的人们以及上帝的存在对他们是不需要的人们。当我年已三十五岁，多少阅历了人生之后，我这个从童年起社会和家庭就教育我做一个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的人，如今站到认为没有上帝生活就没有意义的人们方面来了。我的这一转变使我感到幸福。

## 7

现在我重新回顾过去、回顾我们那往昔人口众多的愉快的家。我想回忆那些与我永怀不忘的岁月有关的优秀的人物。回顾往事，寻找亲切的、美好的点点滴滴真是一件赏心乐事……

我已经开始讲起格鲁吉亚，后来停下了，丢在一边，因为我突然觉得我力不能支，心也承受不了这样的负担。我给你讲了许多优秀的人们，他们都死于非命，讲呀，讲呀，讲个没完……请等等，我还会讲得很多很多。我这才刚刚开始，我想不出另外的故事来，这又能怪谁呢？

我想谈谈我父亲第一个妻子的哥哥亚力山大·谢苗诺维奇·斯瓦尼泽。党内的同志称呼他“阿廖沙”，他是格鲁吉亚最老的布尔什维克之一，年龄和父亲差不多——比他小三岁，因此大家都叫他“阿廖沙”，我们孩子们，叫他“阿廖沙舅舅”。他和他的妻子玛丽亚·阿尼西莫芙娜，由于母亲的努力，成了我们家庭的很亲近的人，和我妈妈的娘家人关系也很亲密。他们俩都是非常出色的人。

阿廖沙舅舅是斯瓦涅特山区型的格鲁吉亚美男子，个子不高，身体结实，一头金发，蓝眼睛，生有清秀的鹰钩鼻。他总是穿得很好，甚至近于讲究。格鲁吉亚人都颇着重外表，在各个方面善于修饰打扮，但看起来又显得既随便，又优雅。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一点也不妨碍一个人去讲究这些。我的阿廖沙舅舅是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受过西方的教育。革命前党送他到德国耶纳大学读书，懂得多种西方和东方的语言，精通历史和经济学，尤其通晓财政金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在德国，因此立即做为敌国公民被拘留起来。革命后被释放，他回到格鲁吉亚，被任命为格鲁吉亚的第一任财政人民委员<sup>①</sup>，并被选为中央委员。不久以后，他在这里和玛丽娅·阿尼西莫芙娜结了婚。玛丽娅出身于富有的家庭，彼得堡高等女子学校和格鲁吉亚音乐学院毕业，是梯夫里斯歌剧院的歌剧演员。

玛丽娅舅妈长得十分漂亮。她的娘家科隆家族是有着西班牙血统的犹太富户，可是她的面孔长得倒更像斯拉夫的妇女，鸭蛋脸，短短的微翘的鼻子，皮肤细嫩，白里透红，大大的浅蓝色的眼睛。她身材修长，衣着讲究，性格开朗愉快，身上总是香喷喷的，擦着高级香水。两人真是绝妙的一对：都非常漂亮，为人爽朗，使人为之倾倒。

你总是不断听我说这个“美丽”，那个“漂亮”，你不觉得奇怪吗？……也许你会觉得是我捏造的吧？不是，这是真的！这是一个时代，那时，人们真的都很好看。请你看一看那些老革

---

<sup>①</sup> 即财政部长。



命者的容貌吧！他们的眼睛很有表情，额头高高的，双唇线条刚毅有力；他们的脸上，没有怀疑，没有犹豫，没有恶意……

阿廖沙舅舅没有能成为一个完全从事党的和政治工作的人（他是否有此愿望，我不知道），他将毕生精力献给财政金融工作。不久他被派遣出国，在法西斯执政前他和家人住在柏林。后住日内瓦和伦敦。最后几年（1937年以前）他在莫斯科工作，任外贸银行行长或经理。正是这一段时间，母亲在世时，我常见到阿廖沙舅舅和玛丽娅舅妈到我们家里来。

大概妈妈也很爱他们，不管怎么说，他们两人都是很爱妈妈的。他们比母亲大得多，对她，对我们——她的孩子都很温存。玛丽娅舅妈总是设法给我妈妈的朴素的生活增加点色彩，常常给她，也给我们从柏林带点什么东西来。

他们两人都很西方化，是在最好的意义上讲的西方化。当我看到现在格鲁吉亚的狭隘的、肤浅的、具有市侩气息的民族主义，不识体统地在不懂格鲁吉亚语言的人们面前讲他们的家乡话，总想把自己的一切吹得天花乱坠，对别人的东西统统骂倒，这时我就想：天呀！往日的人们距离这些东西是多么远呀！他们对这可咒的“民族问题”并未认为有什么重大意义。而友谊和信任把他们紧紧地连结在一起，难道那时候的人们会忙于给自己盖别墅，买汽车，购家具吗？……

玛丽娅舅妈在高等女子学校受过很好的经济科学的教育。当她和丈夫一起出国以及后来住在莫斯科的时候，她都是舅舅的出色的助手。当有问题需要决定时，舅舅总是和她商量，她对舅舅的工作和多种关系都了如指掌。

我记得他们两人常到祖巴洛沃我们家里来，他们全家住在祖巴洛沃二村的厢房<sup>①</sup>里时，常步行来我们这里。那时候二村住的人很多。阿·伊·米高扬的几个儿子，加马尔尼克<sup>②</sup>的女儿，伏罗希洛夫和沙波什尼科夫<sup>③</sup>的儿女们都还记得这座好客的，欢乐的二村。那里有电影，当时还是无声的，有声电影不常来放映；那里有网球场，老老少少都赶来打球，甚至还有一个俄罗斯式的浴池，喜欢洗俄罗斯浴的人们来此洗澡，我父亲也是其中之一。斯瓦尼泽的儿子就在这二村长大，他父母给他起了个奇怪的名字，叫“约翰-里德”，是为了纪念一位著名的美国记者<sup>④</sup>而起的。他小的时候我们叫他“约尼”或“约尼克”，现在人们称他为伊万·亚力山大罗维奇了。他回忆起在祖巴洛沃二村度过的童年，总是怀着如此温柔和欢乐的心情，正如我们回忆起自己在我们的祖巴洛沃度过的幸福的时日一样。

---

① 所谓“祖巴洛沃村”不是真正的村庄，只是一个别墅。供人居住的房屋并不太多，所以只有正房（主要房舍）和厢房（主要房舍两侧的房子）的区别。

② 让·鲍利索维奇·加马尔尼克（1894—1937），布尔什维克军事领导人，红军政治部主任，1927—1934年任中央委员。1937年5月自杀。1959年在苏共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恢复名誉。

③ 鲍利斯·米哈伊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1882—1945），原为旧军官，旧总参学院毕业，十月革命后起义，任红军作战部长，内战时为红军副总参谋长，领导莫斯科、列宁格勒、伏尔加河岸各军区，卫国战争时出任总参谋长，战后任最高军事学院院长，有过许多著作，1945年3月26日去世。

④ 约翰-里德（1887—1920），美国新闻记者。1917年去俄国，写了《震撼世界的十日》，对十月革命作了现场报道。死后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内。

斯瓦尼泽夫妇已经不是年轻的父母了，他们非常钟爱小约尼克，只要是能办到的，都教他去学，当时德语时兴，不像现在这样学英语，就教他学德语，还教他学绘画，音乐，泥塑；从五岁起，他就作诗，“写书”——即把他写的那些东西画在纪念册里，用大大的印刷体写上标题。是的，阿廖沙舅舅有他自己的教育方法，不同于家庭女教师兼作保姆的丽吉娅·特罗菲莫芙娜。有一次阿廖沙舅舅得知约尼克把个小猫塞进升着火的壁炉里耍着玩，把小猫烧了，他一面大骂，一面揪住小儿子的一只手拖到壁炉前，塞进火里，小孩子痛得大哭大叫，这时，阿廖沙舅舅对他喊道：“你以为小猫不疼吗！它也会疼的！”他就是这样以真正格鲁吉亚的热情坚持公正事物的。

他们非常疼爱自己的儿子，星期天总是带着他在祖巴洛沃二村周围的森林中散步（我现在也常到这些地方散步，离我们茹科夫卡不远）。一边散步，一边给他讲一些历史，阿廖沙舅舅喜爱而且精通历史，尤其是古代史：波斯、赫梯<sup>①</sup>、希腊的历史。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他曾在《古代史通报》杂志上发表了几篇有关古代格鲁吉亚部族起源的文章。他精通格鲁吉亚的诗歌，对诗人卢斯达维里<sup>②</sup>的著作的版本作过大量的研究。

玛丽娅·阿尼西莫芙娜对儿子非常娇惯，她完全把儿子托给了丽吉娅·特罗菲莫芙娜教管。在莫斯科的时候，玛丽娅

---

① 赫梯人是公元前 2000—1000 年处于小亚细亚东部赫梯国的人民。

② 萧泰·卢斯达维里为格鲁吉亚十二世纪著名诗人，生卒年月不详，遗有世界闻名的诗篇《虎皮武士》等作品。

舅妈已经不演歌剧了，但常常参加音乐会演唱。她喜爱社交活动，有社交才能，有很高的审美能力，好客，有一幢宽敞的大房子，陈设华贵而精美。他们两人我都记得，特别是玛丽娅舅妈，她很美丽，善良而愉快，对我特别体贴。我常常抱住阿廖沙舅舅的脖子，坐在他的膝上不肯下来。

我说的只是我知道的和亲眼见到的。我见到而且记得父亲很爱他们夫妇两人，特别对阿廖沙舅舅很好，他们常到我们家来，是我们的亲人。他们之间有没有政治性的分歧？父亲和阿廖沙舅舅，雷登斯姨父，巴维尔舅舅是否在政治问题上有过争论？可能是有的。在那些年代，允许人们有自己个人的意见，在一切问题上都发表自己的意见，从不逃避生活，对许多复杂的问题也不会蒙起头来不闻不问。这些我都不知道，我也没有证据。但是我知道，他们不仅是亲戚，而且关系亲密，因此，他们讲的话，他们的意见，他们提供的来自现实生活的情报，对父亲是有重大意义的，父亲在那些年代已经脱离现实生活了。因此，毫无疑问，那时父亲把他们作为自己的亲密的朋友相信他们，所以在他的头脑中也决不会疑心他们是暗藏的“人民的敌人”，是他个人的敌人，可惜，他以后敌友不分了……

母亲去世后，他们还继续来我们家看望我们，虽然这时我们的家已没有了女主人，也没有她那股勤款待的气氛了。按传统习惯，在孩子的节日，我或者瓦西利过生日的时候，他们总是到祖巴洛沃来。有一次，大人们为了使孩子们高兴，还给我们演了一场木偶戏《奥赛罗》。大家把靠墙的沙发搬开，玛丽娅舅妈和其他的人，在沙发背后，利用我的那些极不讲究的木

偶，上演了一场悲剧，演得十分好笑。以后玛丽娅舅妈唱了几支浪漫曲。我们孩子们对浪漫曲不感兴趣，所以没有好好听。

1937年雷登斯被捕，这是对我们家和我们全家人的第一个打击。接着阿廖沙舅舅和玛丽娅舅妈也被捕了。

这样的事怎么会发生呢？我父亲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呢？我只知道：这不可能是他自己的主意，但是如果有一个狡猾谄媚如贝利亚这样的人，阴险地、花言巧语地、没完没了地在他耳边进谗言，说“这些人是反对你的”，“有说明他们可疑的材料”，“他们有最可疑和危险的关系，他们出过国”，等等，那么父亲是会相信的。我以后还要单独地告诉你，母亲和基洛夫的死是如何在精神上毁灭了父亲，使他内心变得可怕的空虚。他已经不再相信人了，也许他从来就没有深信过人……他对人的看法是可以被说服的，可以不断向他灌输：某人不是好人，我们多年都认为某人是好人，错了，其实他是个坏人，只是我们曾经觉得这人不坏，而实际上却是敌人，仇人，他说了你许多坏话，这里有“材料”，这是事实，某甲和某乙已经“供出”了他……至于为什么这某甲和某乙在内务部的院墙内什么都可能“供出”来——这些事父亲就从不深究了。这已经是贝利亚、叶若夫和其他刽子手们的事了，这些人具有这方面的专业才干。

一旦父亲被“事实所说服”，那么就是他以前十分熟悉的人也变成了坏人，此刻已经产生了某种心理变态，也许在他内心深处对此也有怀疑，为此而痛苦和思考……但是一个教条主义的铁的逻辑主宰着他：一旦你说出了“一”，你就必须

跟着说“二”和“三”，以此类推。一旦你同意某甲是敌人这个前提，那么以后必须承认：某甲为敌人已是既成事实，不言而喻，再往下就是一切“事实”的搜集，这一工作本身只是为了证实某甲是一个“敌人”了……回过头来，又重新相信某甲不是敌人，而是一个正直的人，对他来说从心理上已是不可能做到的事。这时，往事对他已经消逝，这正是他残酷无情和心如铁石的天性所在。共同并肩经历过的往事——多年的友谊，为共同的事业进行过的共同的斗争——在他心里就莫名其妙地都一笔勾销了，好像一切都从来没存在过似的，于是这个人的命运也就注定无救了。好像在他灵魂深处他已经落到可怕的魔鬼手中，这时他暗暗地说：“好啊！你背叛了我。看我也再也不认识你了！”和他一起工作的老同志、老朋友、老战友想到他们往日的老关系跑来向他求情——已经一点用处也没有了！他像个聋子，听不见他们的话。他不肯转过身来向他的这些战友们身边靠近一步。他已经失去了一切记忆。他幸灾乐祸地感兴趣的是：这某甲现在表现如何？他是否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非常奇怪，我父亲在贝利亚的阴谋诡计面前是多么束手无策！只要拿来一个文件，一份记录，上面说某甲已经“供认了”自己的罪行，或者其他的人“坦白交代”了某甲的罪行，一切就都够了。如果说某甲“拒不交代”，那么情况就更为糟糕。

阿廖沙舅舅是个很坚强的人。他“拒不承认”自己有任何罪行。关于他的情况赫鲁晓夫在党的二十大的报告中已经提到了。他“拒不认罪”，也不“请求宽恕”，也就是说没有给父亲

写信恳求他的帮助，像其他人毫无结果地所做的那样。阿廖沙舅舅表现出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英勇和力量。这是非常符合他的性格，和他那英俊的外表是十分统一的。但他为了这种坚强，为了人类的尊严和不屈服于强暴的精神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942年2月他被枪决，终年六十岁。

这件事发生在战争时期。舅舅那时被送到马赫塔进行监禁，期限不明。案件结束后他和玛丽娅舅妈都被判处十年徒刑，不过舅妈是在哥萨克斯坦的多林斯基集中营服刑的。法院的这些判决有什么意义呢？……1942年又出现一个肃反的“浪潮”，集中营里的许多人被处决了，他们原来只判处苦刑、流放和长期监禁。这是受到了战争的进程的影响吗？当时还没有赢得斯大林格勒城下之战的转折，形势还十分严重。或许又是贝利亚决定处理掉那些深知他的肮脏底细的人们，而且轻而易举地取得了父亲的同意呢？……这些原因我不知道。

玛丽娅舅妈很快就得到丈夫判处死刑的通知……她听到这一判决，马上心脏破裂死去了。

一直到战争爆发后，他们才得到允许和他们的儿子通信，那时他们都关在集中营里，一个在北方，一个在南方，儿子住在莫斯科受到他的教师丽吉娅·特罗菲莫芙娜的监护。她救了这孩子的命，和他分吃她那很少的一点面包，这时丽吉娅在一个被服厂做工

从那时起，已经过了二十五年，当我又和伊万·亚力山大罗维奇·斯瓦尼泽（约尼克）相遇后，现在我才看到这些书信。我们从1937年起一直没有见过面。他把这些信给我看，

并把他所知道的父母的遭遇讲给我听。信里说的都是父母通常给孩子写信的那些问题：问他身体好不好？学习怎么样？生活安排得如何？他们两个都指望他们众多的亲戚会照顾这个孩子。他们双方各有许多亲戚。但亲戚都拒绝了。我的哥哥雅可夫想收养这孩子，但他的妻子求他不要这样做：说这孩子不好管，已经娇惯坏了，说孩子还有更近的亲戚——叔叔、伯伯、姑姑、舅舅。可是阿廖沙舅舅的姐姐玛丽科当时也被捕入狱，不久就死在狱中了。玛丽娅舅妈曾指望她的哥哥能管管孩子，可是，连他自己也坐了牢，不过他总算幸运，至今还活着。

只有丽吉娅·特罗菲莫芙娜，她是一个虔诚的信仰宗教的老姑娘，她狂热地崇拜阿廖沙舅舅，认为把孩子养大成人是她的义务，只要她还有能力……她确实做到了她力所能及的一切。

伊万·亚力山大罗维奇虽然天生就有些神经衰弱，加以生活的可怕的变化，把他从富贵之家一下子抛到社会最底层，他被投入监狱，和刑事犯关在一起，然后又流放到哥萨克斯坦，虽然如此，他到底成了一个无愧于他的杰出的父母的人。十一年的幸福的家庭生活，父母得以灌输给他许多好的东西，教了他许多知识。儿童时期的知识储备很长时期都对他很有用处。以后，1956年当他从哥萨克斯坦流放地归来，有机会进了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之后，他是各门全优的学生。他顺利地进了研究室，在科学院非洲研究所进行副博士学位答辩，也没有遇到多大困难。他继承了他父母的巨大的工作才能。唯



一没有经受住这场风霜的是他的健康。他的神经往往经不起许多事情袭击或者不能控制自己。和他亲近的人觉得难于和他相处，脾气不好。然而对那些较疏远的人，如大学同学，区苏维埃的选民，他是一个善良、诚恳、有同情心的人，他曾被选为区苏维埃的代表。他好心、无私，自己从不谋求什么。但是为了给一户住在地下室的不幸的家庭争得一间房子时，他可能用两手掐死想阻碍他去办成这件事的一切人。这时他那格鲁吉亚的热情和不可调和的精神就像火焰一般从内心燃烧起来。他是1929年出生在柏林的，他从未到过格鲁吉亚。让我们祝愿他能有机会去那里看看，格鲁吉亚的人民怀着敬爱的心情缅怀着他的父亲。伊万·亚力山大罗维奇，小约尼克（阿廖沙舅舅在他辞世的最后信中这样叫过他），愿上帝赐给他健康，保佑他工作顺利。

好，这就是我们家庭的全体成员，他们都是我童年时期的出场人物。

他们的命运都是多么悲惨啊！他们又都死得多么不同，他们的厄运是多么不可违抗！

阿廖沙舅舅和玛丽娅舅妈去世时已年过半百，他们活得不短，度过了有趣的一生，并做出有益的贡献。母亲、雷登斯姨夫、巴维尔舅舅都没有来得及有所建树，他们都很年轻就死去了。安娜姨妈和费多尔舅舅成了病残，实际上，他们的生命早已经被夺走。外祖父和外祖母长寿，活到八十岁，但是他们的生命在母亲死后，由于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也是在缓慢的死

亡中度过的。

他们圈子里的这些人曾几何时都是欢乐的，友好的，朝气蓬勃的。现在还剩下一些很随便的家常照片：有的是在我们祖巴洛沃的凉台上，花园里，有的在索契，夏天全家都在索契休假。他们都留下了子女：巴维尔舅舅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安娜姨妈的两个儿子，伊万·亚力山大罗维奇·斯瓦尼泽，还有我。我们这些孩子们还记得一些事，心里保存着一些记忆，手上藏着一些退了色的照片，上面是张张欢笑的、可爱的、善良的面孔……我们都记得我们那阳光普照的童年，记得我们祖巴洛沃二村和四村，我们曾在那里生活过，在林中散过步，采过草莓和蘑菇，在莫斯科河里游泳过。我们在一个正常的美好的有趣的家庭里过了七年时光，这个家给与我们孩子们许许多多的东西，它曾努力造就我们。我们这些孩子们——我们自己，我们的小朋友和同学，姑表兄弟姐妹都云集家中。家中的大人都热爱孩子，没有人对孩子打骂；相反，每人都设法使孩子高兴，教育他们，全家是围着孩子们转的。这就是母亲的规矩、秩序和法律。

## 8

你看，我亲爱的朋友，虽然我心里暗暗地想拖延这一时刻的到来，但是现在，我终于应该谈谈我的母亲了，大概你对她的风貌，已有了某些了解。围绕着她有许多传说，有捏造的，感伤的，愚蠢的，有的简直就是恶意中伤。人们编出这些传说，是因为他们不理解，不清楚或者是无法解释某些现象。而我母亲的一生洁白晶莹得像水晶一样。她的性格严谨，坚定，贯彻始终，表里如一，光明磊落。她一生短暂，只活了三十一岁（我现在比她死时还大些），但是却是不寻常的始终如一。须知，每一个人，每一种性格，都各有自己行为的逻辑。所以，某甲不能理解某乙，因为即使在同样的处境中，某甲永远不会像某乙那样行事……

现在有人把母亲说成圣人，有人说她是精神病患者，有人说她被无辜地杀害。这三类人都与她无关。她就是她自己。她那一贯的、坚强的性格是从童年时期开始形成的。

非常幸运，我这里保存了她的一些信件，这些信件能揭示出她的性格。不久前安娜姨妈把妈妈给阿·依·拉德琴科和

伊·伊·拉德琴科<sup>①</sup>的信件副本给了我，这两个人都是我外祖父、外祖母的老朋友。这些信件大部分写于1916—1918年间，只有最后一封注明的日期是1924年。这是一个中学生写的信，它们能使我们看到她的成长。下面你将读到这些信件。

妈妈生在巴库，她的童年是在高加索度过的。她的南方人的外貌，使那些不十分了解格鲁吉亚的人都认为她是格鲁吉亚人。实际上，保加利亚人、希腊人、乌克兰人都是这样的相貌：鸭蛋脸，黑眉毛，鼻子微微向上翘，肤色深深的，柔和的棕色的大眼睛，直直的黑睫毛。是的，此外妈妈的面貌还增添了一些吉普赛的色彩，有某种东方的多愁善感的仪态，忧伤的眼神，纤细而修长的手指。她喜欢围一条披肩，这对她很合适，如果她要是穿上一身印度的莎丽，看起来一定是很自然得体。

在家中她排行最小。两个哥哥一个姐姐都很爱她，娇惯她，而且她又长得十分漂亮。我手上保存着她那留有儿童笔迹的陈旧明信片，有给哥哥姐姐的贺年片，有的是要求给她寄书的。这是一个友爱、温暖的家庭。当时外祖父和外祖母住在彼得堡，跟我们今天的标准相比，他们是很富裕的人家，孩子们都能上中学读书。从妈妈给她父母的朋友们阿丽莎·伊万诺芙娜和伊万·伊万诺维奇·拉德琴科夫妇的最早的信中，我

---

<sup>①</sup> 伊万·伊万诺维奇·拉德琴科(1874—1942)，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彼得堡积极从事革命运动。革命后，1918年列宁委任他为燃料工业人民委员。直到1937年他始终在燃料工业部门工作。

们立刻看到一个十五岁的愉快、温柔、善良的女孩子。她性格爽直，神经健康，一点都不装腔作势。

1916年5月1日

亲爱的阿丽莎·伊万诺芙娜，请原谅我很久没有回信。我完全没有时间。我要在十天中准备考试，因为我去夏太懒了。现在我在赶新课，特别是代数和几何。今天早上我去考试了，现在还不知及不及格。可是我想，除了俄语、作文外，其它功课都能及格，作文题并不难，可是作文我最不行。

我不能上原来的中学了，因为我们搬了家，离学校太远，现在的中学就在尼古拉耶夫斯基火车站对面。

亲爱的阿·伊，非常感谢您寄给我的像片。我和纽拉<sup>①</sup>也照了像。纽拉的像片已经洗好了，我的还没有洗好。纽拉已经进了精神-神经病理学院，还没有开始上课。我们住的公寓大楼里有一所预备学校，一个老师病了，纽拉给她代课。

下面的一封信写于1916年9月10日，是寄给阿丽莎和她的小儿子阿廖沙的，家里又叫他尼亚卡。

我已经在新中学了。看起来还可以，不过我还没有交上朋友，现在正在观察她们；女同学都很朴实，和新来的同学不接近。因为我是新来的，对我有点不大欢迎，可是我想，过段时间就会好起来的。

纽拉已经进了神经病理学院。亲爱的阿·伊，我们很想知道伊万·伊万诺维奇现在在什么地方？他身体好吗？何时

---

① 纽拉是安娜·谢尔盖耶芙娜的爱称。

来彼得堡？我们很想看见他。没有什么东西吸引着谁到我们这里来，路很远，很辛苦。早睡早起，现在才八点钟，我已经晒了，我们和母鸡同时睡下，和雄鸡一同起床。尼亚卡生活怎么样？他身体好吗？是否还和丽达在一块儿淘气？我想知道菜园怎么样？你们大家都好吗？纽拉和费加给两个学生补课：帮一个女孩上四年级，帮一个男孩上二年级……我们的巴维尔要到普斯科夫或者阿尔汉格尔去出差。刚才他来我们这儿取东西，说已经决定派他们出差，还说有点不大舒服，因为他一向身体不好。好，好像再没有什么可写的了。祝你们一切安好。热烈地吻你们。替我们向大家问好。

下面两封信是冬天写的，时间是1916年12月。说的还是因为巴维尔将参军，费加也可能应征入伍而引起的全家的不安。

很快我们就要放假了，大概我们要在彼得堡过圣诞节。到外地去太费时间，很贵也很困难。我喜欢中学的生活，但我还没有完全熟悉这种生活。

尼亚卡一定会有一棵圣诞树，请转告他，叫他从新的一年起别再生病，祝他节日快乐。问候阿·伊和尼亚卡。我们全家向您问好。

十天以后的信写道：

已经放圣诞节假了。我们将有三个礼拜的休息时间，可以好好把觉睡足，虽然留的作业很多，特别是俄语和历史。第二学季的分数已经发给我们了，还都可以，虽然三分很多，但二分倒没有。我最感困难的是德语课，因为我们只讲读，并不

翻译，我又完全没有掌握德语；法语也是如此。圣经课总算得了个五分。这真是件不寻常的事，不过整个季度我一直在死背圣经，真把我烦死了。我非常高兴进了这个中学，这儿的女同学非常可爱，非常好，和她们在一起学习真是最大的愉快。虽然只过了一个星期日，我已经想我们班了。

……我的大哥现在诺夫哥罗德，您已经知道了。爸爸跟妈妈和从前一样有些顶顶撞撞。我已经写了一个多月的日记了，我对写日记很有兴趣；当我有话无人可谈时，我就把我的感情表达在日记里。开始写日记我很满意，虽然也许很快我会觉得厌烦。愿您和尼亚卡康复，从新的一年起，开始新的健康的生活……

### 1917年1月妈妈写给阿丽莎·伊万诺芙娜的信：

天气太冷，明天不上学。刚刚上完音乐课回来，快冻僵了。一月三日的考试得了五分。我很满意我花费的劳动没有白费。音乐课我虽然感到有些难，但是我还不想丢掉它。你们那里现在一定很好玩，尼亚卡一定在山上滑雪或者滑冰，可是我们现在坐在教堂里听没有意思的圣经课。天气很好，多么应该另做安排啊！纽拉在上她的神经病理学院，正在准备拉丁语，她请您原谅她没有给您写信。

我盼着夏天到来。亲爱的阿·伊，我现在告诉您，我有一个想法：我、纽拉和妈妈有一次商量到哪里去避暑，我有一个愿望，妈妈已经同意了。现在需要征求您的同意，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到您那儿的电站去做点什么工作。我想我已经能工作了，因为我已经快16岁了。如果可以，我就住

在您家里……请写信告诉我，您是否同意我的想法。纽拉到黑海省的熟人那里去。妈妈请了三个星期的假休息，因为她很累，也瘦了。此外，巴维尔走后，她的情绪不好。过一个月巴夫鲁沙<sup>①</sup>就要上前方阵地去了，已经给他同时注射了三种疫苗。

下面是1917年2月27日在革命前夜写的一封信。

我总算找到时间给您写信了，我一直都忙得要命。现在我们停课四天，因为彼得格勒局势不稳，所以我现在有时间。现在彼得格勒非常非常紧张，我很想知道莫斯科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全家人几乎都不在家：纽拉在舅舅家，费加<sup>②</sup>也到什么地方去了，爸爸在城里。现在只有妈妈和我在家等候爸爸归来，不知为什么他出去了很长时间还没有回家。

……圣诞节后我们上课很少，不是天气冷，就是我生病，现在连街上也出不去。我本想详细地写一写现在发生的事情，但是我又想信中不便多说这些。这些天我将读契诃夫的小说，不然太闷了。一切使我厌烦，希望美好的炎热的夏天来临。整个冬天都太冷，大概尼亚卡不大出去散步吧？致以良好的祝愿，热烈地吻您。

同一天，2月27日还寄出一张明信片：

闷得要命，彼得格勒已经四天一切都停顿了。但是在这烦闷的几天以后，一个巨大的节日来临了，就是——2月24日！家中只有我和爸爸，其他的人都徒步进城去了，纽拉因为

---

① 巴维尔的爱称。

② 费多尔的爱称。



身体不好，已经在舅舅家躺了五天，还没有回家；费加常回来。爸爸的情绪极为高涨，他每天都在电话机前等电话。今天阿维尔·叶努基泽出乎意料地来了，他从尼古拉耶夫斯基车站一出来就赶上了这盛大的节日。敬祝一切安好。吻你！娜佳。

一个节日——二月革命来临了。外祖父从外面回来，给全家详细讲了发生的一切。全家都还没有懂是怎么回事，阿维尔·叶努基泽来了，他是从西伯利亚流放地来此地的。我应该告诉你，阿维尔老伯是妈妈的教父，我们全家都爱他，全家给他往西伯利亚寄包裹。那时我父亲也流放在西伯利亚，他常给我的外祖母写信。所以，阿利卢耶夫全家也给他们的老朋友、共同战斗中的同志——我父亲寄包裹。

从3月30日的来信中可以看出，这位小姑娘已经对周围的事变逐渐发生了某些兴趣，虽然她生活中主要的事一直都是中学的功课。

……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出现了许多新闻。您听说契赫泽<sup>①</sup>的儿子出乎意外地死去了吗？我去参加了葬礼并且看见了他的父亲——此情此景悲惨极了……尽管他的处境困难，他还在继续从事他的事业。我非常为他难过。

3月13日我们大家都参加了死难者的葬礼。秩序井然，虽然我们要在一个地方站七个小时，但由于我们不断地唱歌，

---

① 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契赫泽(1864—1926)，第三、第四两届国家杜马中的孟什维克领袖。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后赴高加索，任格鲁吉亚立宪会议主席。1921年布尔什维克在格鲁吉亚获胜后，他侨居巴黎，1926年自杀。

所以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当晚十时我们来到战神广场<sup>①</sup>时，场面的悲壮使我惊叹不已：到处都是火把，奏着乐曲，十分壮观。回到家里时，我们疲劳极了，衣服也湿透了，但我们情绪高昂，精神旺盛。我爸爸是中队长，他身上斜披着肩带，手执一面白旗。

谢谢您的邀请。功课进度很慢，因为大家都忙于其它事情。复活节后，我们就要考植物学和动物学，所以又得用功了。听说课上到5月2日，我们中级班5月15日就上完课。我们很不高兴，六、七、八三个年级都选了代表，可是说我们太小，不懂事，不能当代表。不过我们也组织了一个自修小组，我们都积极参加小组工作。我们开始筹建一个图书室，有困难的课程彼此互助。总之，我们的目的是将我们班级结成友爱、团结的整体。不幸的是，我们班上有许多找我们麻烦的孩子。不久以前我们开过一次会，开了三个半小时。一切我都感兴趣，我几乎每次会都参加。我管总务，我还没有经验，工作完成得还不好，但是大家都满意我。

向你们所有的人致以节日的祝贺。

1917年夏季七、八两月妈妈是在阿·伊和伊·伊·拉德琴科的别墅度过的。外祖父忙于他的党的工作。夏天——七月份，列宁有几天就躲在外祖父的家里，给他腾出我妈妈的小房间。这套房子现在已成了纪念馆，墙上挂着当年的照片，我妈妈的小房间里当年的旧物都保存在那里：一张很窄的小铁床，

---

① 战神广场是列宁格勒的一个广场，1917年二月革命时牺牲的工人群众埋葬在这里。

一件方格毛毯，一个书架和一张小圆桌。

1955年我第一次到列宁格勒时，曾去看过外祖父的这所旧居。当我走在从前妈妈跑着上学去经过的楼梯时，我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恐怖的感觉；当我步入这幢我母亲和我父亲初次见面的房子时，我的感受更是非常奇怪的。

幸喜这天参观的人不多。我久久地在这些空房间里徘徊，我站在厨房里，努力去想象这幢房里的人们当年是如何生活的……我很惊异，我觉得最奇怪不过的是我心中完全没有悲伤。那四面的墙壁，唉！现在已经成了公家的“陈列品”，虽然如此，从这四壁我感到了那牢固的家庭的温暖、安适和爱情，这些东西仍然沁我心脾。总之，灵魂尚在，妈妈的灵魂还留在这里，就隐藏在这小小的可爱的房间的某处，他的灵魂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这里，没有在克里姆林宫生活过，那里她忍受不了……克里姆林宫对她来说，从来就是陌生的地方。那些公家的寓所，她离此以后的全部生活——都不是她的，而是别人的。她曾住在这里，她仍留在这里，她是一个漂亮的中学生，她学习了历史的最初几页，这几页不是从书本上学到的，而是从她周围的生活中学到的。这里是她全家人的家，她父母的家。这里是她的城市。要是他们不离开这里，那时，也许全家人的命运就会大不一样，也许会幸福得多……

夏天休假以后，1917年秋天，妈妈和全家又回到彼得格勒。10月19日妈妈给拉德琴科写了下面的信：

……我们现在忙着赶功课，外加音乐课每天要占去我两个小时的时间。现在已经十一点钟了，我在给您写信，法语我

还没有记好呢。每天如此，总得一点以后才能睡下。大家都已经睡了，我还在背书……

我们不准备离开彼得堡。暂时供应还好，鸡蛋、牛奶、肉、面包还可以搞到，就是贵得很……总之，还可以活下去，虽然情绪很坏，有时简直想哭，非常寂寞，哪里也不能去。前两天我和音乐老师去音乐剧剧院<sup>①</sup>看了《索罗琴斯卡雅市集》<sup>②</sup>，很满意。在彼得堡传闻10月20日布尔什维克将有所行动，这大概是胡说八道。好，再见。等我有时间再给尼亚卡写信，先报告他，感谢他给我写的信。热烈地吻你，向全家问候。

然而，布尔什维克的确有所行动了！

十月革命以后，1917年12月11日妈妈写的信：

亲爱的阿·伊！请原谅我很久没有给您写信。暂时生活得还好，虽然有些寂寞，可是我们从来就是这样生活着。我们的课上得很坏。每周有两天停电<sup>③</sup>，也就是说我们每周只上四天课。请告诉我：伊万·伊万诺维奇收到报纸没有？我给他订了三种报纸……我本想给伊万·伊万诺维奇买香烟，可是队太长，太要命！要半夜起来去站队，而且卖得也很少……亲爱的阿·伊！我在中学里现在要到处战斗。最近我们这里为公职官员募捐生活费，大家都捐，有的给两个卢布，有的给三个。当问我时，我说：“我不捐。”他们问我：“你一定

---

① 音乐剧是一种大型的音乐戏剧，以它的大型和悲剧性、戏剧性区别于一般歌剧，这种剧始于瓦格纳。

② 果戈里的作品。

③ 因停电不能烧暖气，所以不能上课。

没有带钱吧？”我说：“我就是不想捐。”于是一场风波平地而起。现在他们叫我布尔什维克。但是并无恶意，是好意的。我很想知道 阿廖沙是属于那个党的？他大概是布尔什维克吧？……

我已经学了两个月音乐了，成绩马马虎虎，将来会怎么样，现在还不知道。好，再见。我还得学习倒霉的圣经课。

1918 年来临。

她给阿丽莎·伊万诺芙娜写了两封信，一月份一封，二月份一封，写的都是有关家务和家里的事，也充满了许多新的有趣的事情：

亲爱的阿·伊，你好！请原谅我很久没写信了。过节以来我懒得要命。人总是这样的：时间越多，人就越懒。给您拜年。新年完全改变了我们的家庭生活。事情是这样的：母亲不在家里住，因为我们都已经长大，愿意按我们想做的去做，去想，不必跟着父母的指挥棒转了；总之，我们已经是很有可以的无政府主义者了，这叫妈妈很不高兴。当然这是次要的理由，主要的是：她还年轻，精力旺盛，在我们家中她没有自己的个人生活。现在一切家务都落在我的肩上。这一年我长大了许多，已经完全是大人了，这使我高兴。

学校的课上得懒懒散散。这一星期我都在参加全俄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相当有意思，尤其是托洛茨基和列宁的发言，其他的发言不怎么样，没有什么内容。明天是 1 月 17 日，是大会最后一天，我们当然都一定去。

你们都好吗？我特别想知道小淘气阿廖什卡好吗？您知

道克拉辛一家的什么消息吗？他们好像架子大了，都不回我们的信了。我现在的缺点是变得很凶而且粗暴，我想这些都会过去的。

费加已经离开军校，进了一个学院的数学系。我现在扮演妈妈的角色，为他到处奔走，终于安排好了。他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我真难为情，我们全家都在工作，只有我一个人游手好闲而且用钱也比别人多。虽然如此，他们都爱我。

这是 1918 年 2 月母亲在彼得格勒写的最后的一封信：

你们好，亲爱的！我很高兴，你们终于收到了我寄给你们的香烟。可能凑巧现在比以前更需要它吧！可是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收到了各种报纸没有？我有点不敢订二月份的报纸，我怕你们收不到。

忙于家务使我厌倦。现在，妈妈可能不久就来换我的班，身旁没有我们这帮吵吵闹闹的孩子，她很寂寞。我们当然高兴她回来，高兴极了。父亲病了三个星期没有起床，先是扁桃体发炎，刚刚好，出门上电车时腿又碰伤了。他现在能走动一点了。在他生病期间，我既是家庭主妇，又是护士，还得上学，我一共只耽误了三、四天课。

彼得堡是一片可怕的饥馑，每天配售八分之一磅面包，还有一天不供应。我甚至于骂起布尔什维克来了。现在答应从二月十八日起增加一些定量。等着瞧吧！

我体重减轻了二十磅，所有的裙子和衬衣都改过了——不然都会掉下来。甚至于有人怀疑我爱上了什么人，因为我消瘦得很。

巴维尔回来住了十天，又走了。他又参加了新的社会主义军队，虽然听说他很厌倦前线。妈妈骂他不该参军，可是我们高兴得把他抬了起来，大喊“乌拉”！爸爸也说要去参军，自然，他是开玩笑。阿廖什卡好吗？请叫他给我写几行字来。现在，他大概很会写字了吧！热烈地吻你。你的娜佳。

不久，妈妈就结了婚，和她的丈夫一同去莫斯科了。在莫斯科她先是在列宁的秘书处，在弗琪耶娃·留·阿的领导下工作。以后就和我父亲一起到南方前线去了。她的无忧无虑的幸福的童年结束了。开始了另一种生活——这不止对她来说，而且对辽阔的俄罗斯来说，都是另一种生活。

妈妈后来也常和拉德琴科一家见面。这是六年后她给伊·伊·拉德琴科写的最后的一封信：

亲爱的伊万·伊万诺维奇！

我有一件要紧的事求您，如果您不反对我转正的话，请您给我写一份关于我转成正式党员的介绍信。我原想今天去看您，可是我必须在九点钟准时到人民委员会，如果去您那里，九点以前我就回不来了。介绍信请写在一张纸上。普通的纸就行。过两天我一定来，但是现在无论如何脱不开身。请原谅，给您带来许多麻烦，特向您致谢。问候阿丽莎·伊万诺芙娜和小阿廖什卡。娜佳·阿利卢耶娃。1924年8月9日

这些信闪耀着天真和纯洁的光辉。她实际上还是个孩子，可是突然一个什么样的命运落到她的肩上了啊！革命、内战以及随之而来的破坏已是够重的负担了……不，在这孩子的肩头又加上了一副爱情的重担，她爱的这个人比她大二十二

岁，刚刚流放归来。他有着一个革命者的苦难的经历，和这个人相处，就是他的同志也很感困难。可是她和这个人并肩前进了，宛如一支小船系在一艘远洋巨轮上。现在，迎着狂风骇浪在海洋上并肩破浪航行的这一对，仿佛就在我的眼前……

当她爱上父亲的时候，还是个中学生，她全力以赴地想要在这远航中赶上这艘巨轮。她如此尽心竭力，以至于她自己也没有觉察她是如何在不断成长，她变得严肃，有智慧，成熟了。以后，也可能是她本人比他对事物理解得更多了……

她的前途和成长与父亲不同：革命完成时，她才刚刚开始成长；而父亲已是成熟的近四十岁的人了，他已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不轻信任何事物，偏重理性的思考，遇事冷静地权衡利害，总之，已经具备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十分重要的那些特点。

现在，当我已经三十七岁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我清楚地看到了组成这个家庭的这两个人的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她的那种浪漫主义的，欢欣鼓舞、展翅欲飞的感情，革命的青年的激情，一定在某个时刻被成熟的冷静的头脑所代替。此时，她就会用完全另一种眼光去看周围的一切。我们现在不必过早谈这些。

现在我就从我的童年讲起，因为这时期我认识了妈妈，也记得她的事。但是，我的朋友，当你读到以后发生的一切的时候，我请求你一分钟也不要忘记她那些少年时期的信件：因为她的心灵，直到后来也一如当年。如果你将这个善良的诚恳的心灵和她二十年中所生活的艰难的世界相比较，你就会



了解这是多么不适宜于她，她又是多么艰难啊……

但是，她在这段时期还是建立了生活，虽然为时短暂。那些当年和我们家相识的人，那些常到我们家来的人，都以感激的心情怀念这一段生活。迄至今日，对我来说，那充满阳光的童年在我的记忆之中仍然闪耀着灿烂的光芒。



母亲对我们孩子们很严，她是说一不二，高不可攀的。这并不是她冷若冰霜，而是由于出自内心的严以律己和严以教育子女的原故。我记得母亲非常美丽，大约不是我一个人这样认为的。她的面貌我已记不太清了，但在我的总的印象中，她美丽、典雅，步履轻盈，总是发散着香水的芬芳。这是我童年里不自觉地留下的印象，这是我所感受到的她的性格以及她的生活的气氛。她很少爱抚我，可是父亲总是把我抱起，喜欢声音很响地亲我，把我脸吻得挺湿，用各式各样温存的字眼儿叫我，叫我“小麻雀”，“小东西”。有一次我拿剪刀剪破了新台布。天啊！妈妈打我手板，打得真痛啊！我大哭大叫，惊动了父亲，他走过来，把我抱起，安慰我，吻我，总算哄得我不哭了……他多次救我，使我免于拔罐子，贴芥菜药膏；他忍受不了孩子的哭叫。妈妈是说一不二的人，常常为他“娇惯”孩子而生气。

这是我保存下来的妈妈给我的唯一的一封信，是1930年或1931年写的：

你好！小斯维特兰娜！

瓦夏<sup>①</sup>来信告诉我，说我的小姑娘十分淘气。收到说我的小姑娘这样话的信我感到烦恼。我想：我留在家里的是一个懂事的大姑娘，可是她竟是个小姑娘，还不会像大人那样行事。小斯维特兰娜，我请你和娜·康<sup>②</sup>谈一谈，处理好你的一切事情，使我不再收到类似的信。你一定要谈，然后和瓦夏或娜·康一起写信给我，告诉你们是怎样商量妥当的。当妈妈走的时候，我的小姑娘答应了许多许多，可是结果做得很少。

这样，你一定要回答我：你决定如何生活下去，是严肃地生活下去或者不是。

你要认真想一想，我的姑娘已经很大了，她已经会想问题了。你读了什么俄文书吗？等候我的小姑娘的复信。

你的妈妈

这就是全信的内容，没有一句温存的话。这个当时只有五岁半或六岁的“大姑娘”的过错大约不会有什么了不起；我是一个安静听话的孩子。不过是由于对我要求非常严格。

父亲写给我的信完全不同。

我手上保存着两封信，大约就是那个时候（1930—1932年间）写的，因为父亲的这两封信是用整整齐齐的印刷体写的，字很大。信结尾时一定是“吻你”，我小时他喜欢吻我。大约十六岁以前他总叫我：“谢坦卡”——我小时候曾这样称呼

---

① 瓦夏是瓦西利的爱称。

② 娜塔丽娅·康斯坦丁诺芙娜是我们的保育员兼老师。

我自己。他还叫我“女主人”，因为他希望我和妈妈一样，成为在家中起积极作用的女主人。如果我有什么请求的时候，他总是喜欢说：“你请求什么！你下命令吧！我们马上就完成任务。”从此我们家有一种“下达命令”的游戏，这种游戏在我们家继续了很长时间。家人还想出了一个给我做榜样的“理想的小姑娘”列莉卡，她所做的一切事总是大人需要的样子，为此我十分恨她。在做了如上的说明后，我现在可以把他当年写的信引用如下：

谢坦卡——我的小女主人！

你，大概已经忘记好爸爸了，所以你不给他写信。身体好吗？没有生病吧？日子是怎么过的？你见到列莉卡吗？你的娃娃都好吗？我原想你会下达命令来的，可是一直没有接到命令。这不好。你叫好爸爸不高兴了。好，吻你。等你来信。

好爸爸

信的每一个字都精心地描成大大的印刷体。下面的另一封信也是这几年写的：

你好，谢坦卡！

谢谢你送的礼物。谢谢你下达的命令。看来没有忘记爸爸。如果瓦夏和老师来莫斯科，你在索契等我，好吗？吻你。

你的爸爸

这都是我和父亲、母亲往来于祖巴洛沃和索契之间的书信。当他们夏天去索契，我们留在别墅，或者相反，我们在索契、他们住在祖巴洛沃时写的信。我同时引用他们两个人的信，因为这些信很典型地表现了他们两人对孩子的态度。父

亲从不对我们过于严厉（是的，他对瓦西利很严格，要求很高），他娇惯我们，喜欢和我一起玩——我是他的消遣和休息。妈妈更疼爱瓦西利，对我则很严格，用以抵消和补偿父亲的感情。尽管如此，我还是更爱妈妈……

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问我保姆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外祖父和外祖母两个人我更爱外祖父，爸爸妈妈两个人我更爱妈妈呢？”我的保姆两手一摊，就批评起我来了：“那么外祖母呢？好爸爸呢？应该都爱！难道可以说出这样的话吗？！”她吓得不得了，久久地骂我。“应该都爱”——这是她一生的座右铭，也是一个训练有素、尽心尽力的仆人的习惯：在主人之中，不作任何区别，而且教训孩子这样做。她从来未向我透露过她个人更喜欢哪一个，她对一切人都是同等对待的。

妈妈很少和我们在一起。永远忙于学习，工作，党的委托，社会工作，她总不在家。我们忙于我们的功课，和娜塔丽娅·康斯坦丁诺芙娜<sup>①</sup>或者和老师出去散步，采集植物标本，养兔子等等，只要我们有事做就行！妈妈早在中学生时期在信中写过一条规律：即“时间越多人就越懒”，妈妈现在坚定不移地把它运用在我们孩子们身上。除了德语、俄语和数学等共同课程，除了娜塔丽娅的绘画和泥塑课程，妈妈还规定要我上学龄前儿童班的音乐课。我到斯帕索-比斯科夫斯基胡同老师家里去上课有二年多，都是我的保姆送我去。这些课好极了，孩子们合唱或独唱，还作各种旨在发展我们的听力

---

① 斯维特兰娜的生活老师。

和音乐节奏感的游戏；以后给我们上识谱课，老师弹琴我们听写五线谱——我的成绩都好。我妈妈非常满意，因为这些课没有白上。可惜，教给我们许多音乐基本知识的可爱的女教师的名字我已经记不得了。我的保姆已经过世，现在已经无处打听她的姓名，也无处打听她的房东洛莫夫一家都叫什么名字，他们都是什么人。他们家有许多好的儿童图书。我从他们那里得到了《麦克斯和莫里茨》这本书，和保姆一起朗读这本书，我的保姆非常善于背诵各种诗，以后她常常引用这本书里的诗篇……

虽然时间很少，妈妈自己还继续学音乐，她的老师是当时克里姆林宫谁都认识的亚力山得拉·瓦西里耶芙娜·普赫利娅科娃。后来我和她见过面。妈妈还学法语，她的老师是谁，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她学得怎么样。总之，为了不落后于她周围的那些优秀的有学识的人们，她自己非常想学习和不断地提高自己。

她还非常年轻，生活还远在前面。1931年她刚满三十岁，在工学院化学纤维系学习。当年这是一门新的工业化学，一个新的领域。母亲会成为一个专家的。她留下的笔记本记得整齐干净，大约是很模范的吧！她制图制得很好，在她的房间里放着一块制图版。她的两个女友也在工学院学习，一个是朵拉·莫依谢耶芙娜·哈赞（安德列耶夫<sup>①</sup>的妻子），一个

---

① 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生于1895年10月30日，是苏联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历任联共（布）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政府集体农庄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要职，两次荣膺列宁勋章。

个是玛丽娅·玛尔科芙娜·卡冈诺维奇。他们的党支部书记就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当时他是个青年人，从顿巴斯来的。从学院毕业后，他做工会工作和党的工作。我妈妈的两位朋友到纺织工业系统去工作了。妈妈渴望自己独立工作，“王国第一夫人”的地位使她觉得压抑。

有一次，妈妈和我们一起在祖巴洛沃呆了一整天，这是很少有的事。可能是需要换老师。她收拾整理，缝这缝那，和保姆商量一些什么事情，检查我们的作业本等等。她从来不愿意和孩子们娇声娇气地说一些柔情蜜意的话。可是当祖巴洛沃修建儿童游戏场时，她却亲自想主意，使之修得更有趣些。设在树上的“鲁宾逊小屋”，大约是有她的参与才盖起来的吧！她喜欢照像，而且照得很好。我们在祖巴洛沃和索契的家庭照片全部出自她之手。她照我们孩子们、周围的风景和我们的家。因此，我们在祖巴洛沃的家，妈妈带我去过的索契别墅，以及建筑师梅尔让诺夫为我父亲在索契修的第一幢房子等照片才得以保存。后来热衷于翻修房屋的父亲把这些房子都改建得面目全非了。感谢上帝，还可以从妈妈亲手照的照片中认出这些地方——不但认出而且永怀不忘……

除了孩子外，妈妈是家中年纪最轻的人。老师、保姆都比她大，她们都已经四十以上了。我们的管家卡罗琳娜·瓦西利耶芙娜，厨娘叶丽莎维塔·列昂尼多芙娜都是年过半百的上年纪的人了。可是所有的人都很爱这位年轻、美貌、言谈举止很有分寸的主妇，她享有公认的权威。我的大哥雅沙<sup>①</sup>比

<sup>①</sup> 雅沙是雅可夫的爱称。

我妈妈只小七岁。她对哥哥很体贴，他第一次结婚很不幸福，生了一个女孩又夭折了，妈妈一直安慰他。妈妈设法使雅沙难过的日子能改善一些，当然这是不易办到的，因为父亲不满意他迁来莫斯科（是阿廖沙舅舅坚持要他来的），不满意他的第一次婚姻，也不满意他的学习和他的性格。总之，父亲不满意他的一切，为此妈妈十分烦恼。

雅沙曾企图自杀，一定给妈妈留下十分沉重的印象。因为和父亲的关系闹到绝望的地步，父亲一点也不帮助他。雅沙便在我们克里姆林宫宿舍的厨房里自杀了。幸好只受了伤，子弹穿了过去。可是父亲却找到了嘲笑他的理由，说：“哈哈，没打准啊！”他是喜欢讽刺人的。而妈妈则受了极大的震动。这一枪一定是打进妈妈的心里，而且久存于心，以后引起了后果。

雅沙十分敬爱妈妈，爱我和我妈妈的父母。外祖父、外祖母尽一切可能保护他，以后他就去列宁格勒，住在外祖父谢尔盖·雅可夫列维奇的家里。

许多家庭照片保存下来了。看见这些照片，我能够回忆起其它许多事情。这些相片在我眼前放大了，黑白的变成彩色的，人物开始动了起来，我听到了他们彼此在交谈……对我来说，这些都是一部电影的定格镜头。我看着这些照片，整部电影就在我眼前放映，因为这是我曾几何时所目睹的啊……

照片上照着全家在林中野餐，这是全家的赏心乐事，父亲、母亲都非常高兴，哈哈大笑着。周围有许多副欢乐的幸福的健康的脸。父亲看起来比他那半百的年纪年轻得多，1929



年他整五十岁。妈妈满面笑容，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年轻，容光焕发，姿态万千。所有的女同志都衣着朴素，他们都很漂亮，健康，十分迷人！

有一张是妈妈在祖巴洛沃家的阳台上，坐在桌边的是安娜·盖尔盖耶芙娜，另一张是季娜·奥尔忠尼启则。

有一张是妈妈在索契的小花园里，奥拉赫拉什维利\*的全家坐在矮榻上，阿维尔老伯正在玩弄一个竹制手杖。

有一张是妈妈在克里米亚的穆霍拉特卡；我父母在那里休假。在海滨，我哥哥瓦西利和他的朋友阿尔乔姆·谢尔盖耶夫与任尼亚·库尔斯基头上戴着白色的小草帽，小脸钻出水面上来。

有一张是妈妈在穆霍拉特卡的凉台上，旁边是白色大理石狮子，她穿着当年流行的直筒连衣裙，方领口，短袖，晒得黑黑的，头发向后梳得光光的，脑后挽着一个髻。

有一张是妈妈在祖巴洛沃的林中小路上，她正走向篱笆门。从土耳其来了“贵宾”，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李特维诺夫他们正在散步，看样子，父亲已“接见”了他们所有的人。我也在这里，是为他们消遣的。妈妈披着披肩，她的脸上表情紧张，正在照看我，以便使我“表现良好”。

有一张照片是妈妈身披披肩，在祖巴洛沃坐在一张小桌前。这张家庭照片在母亲死后按照父亲的愿望放大了。这些放大的照片挂在我们克里姆林宫新居的各房间的墙上。她

---

\* 米·奥拉赫拉什维利，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主席，1937 年被捕。

看上去是那样幸福,那样光彩照人,当你看着这些照片时,你就不能想象她会有以后那样的命运。这就是很多人不明白也不相信的原故。

可是越往后,照片上就越是愁容满面了。尼·阿·斯维晓夫-帕欧拉在莫斯科给她照得极好的那些照片已有淡淡愁容。有一张那面容是孤癖的,高傲的,悲伤的。你会怕走近她,因为很难说她会不会理你,那眼神是如此悲哀,以至于至今我都不敢把这张照片挂在我的房间里,更不敢去看它。你一望这双眼睛,这悲愁是如此深切,每个人都会明白:这个人的悲惨的命运已定,他正在走向死亡,应该想办法帮助她。可是现在我想:为什么没有人跑去助她一臂之力?为什么没有人明白这将会导致什么结局?

妈妈是个非常内向的,自尊心很强的人。她情绪不好时,也从来不承认心里有什么事。她不喜欢谈她个人的事情。为此,外祖母和她的姐姐安娜姨妈常和她生气,因为她们都是非常外向的人,心直口快,想什么就说什么。

现在我已是一个成年人了,我就更加了解她。每当别人讲到有关母亲的一鳞半爪的故事时,这些都对我说明许多问题。

不久以前,妈妈的姐姐安娜·谢尔盖耶芙娜告诉我:妈妈去世前的一段时间,越来越经常想要离开我的父亲。安娜·谢尔盖耶芙娜常说:妈妈是个“伟大的殉难者”,对她来说,父亲是个十分生硬,粗暴,极不善于体贴人的人,妈妈又非常非常爱他,为此使妈妈十分苦恼。有一次,早在1926年,我当时才

半岁，爸爸妈妈吵了架，妈妈带上我、哥哥和保姆去列宁格勒外祖父家里，想再也不回去了。她打算在这里工作，并逐渐建立自己独立的生活。争吵是由于父亲的粗暴，原因本来是微不足道的，可是看来妈妈的气愤是日积月累，已为时甚久了。虽然如此，妈妈后来气消了。保姆告诉我：父亲从莫斯科打来了电话，说他想来列宁格勒“求和”并接我们回家。妈妈在电话里对他不无挖苦地幽默地说：“你来干什么？你来对国家来说代价太高了，我自己回去。”于是，我们又回家了。……

安娜·谢尔盖耶芙娜说：妈妈从工学院毕业的前几个星期，有一个计划，想到哈尔科夫她那里去。这时雷登斯正在乌克兰契卡工作，妈妈想按她的专业安排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安娜·谢尔盖耶芙娜常常说，妈妈一直有这个坚决的想法，她想摆脱她的“显贵的地位”，因为这地位使她感到压抑。安娜的话是近乎实情的。因为妈妈不属于那类讲究实际的女人，她的“地位”所给予她的一切，对她来说没有任何意义。那些头脑冷静而有心计的女人对此是无法理解的，正如我的前婆母季·阿·日丹诺娃那样，她说我母亲是“精神病患者”，因为她“没有任何原因”烦恼和痛苦！她们中的任何人都会和任何事物妥协，只要永不失去命运赐予她的“显贵地位”就行。

可是母亲从来不好意思让小汽车开到工学院门口，从来不好意思说她是谁，很多人很久都不知道娜佳·阿利卢耶娃是谁的妻子。在那些年月里，生活简单得多，父亲那时也和普通人一样，步行在街上走。是的，他是更喜欢坐车的。即使是这样，在其他人中她也觉得自己太突出了。她诚恳地相信党

的道德标准和规定,要求党员的生活作风艰苦朴素,并努力恪守这一道德标准,因为这些东西更接近她,接近她的家庭,她的父母和她所受到的教育。

在这个意义上有一个例子是很说明问题的。在列宁逝世后(也许是列宁逝世以前),中央通过一项决议:规定中央委员为党写的文章和书籍出版时,个人一律不收稿费,这项收入交给党从事公益事业。妈妈曾对这项决定很不满意,因为她认为:真正劳动所得最好领取报酬,这比起那无尽无休、毫无限制地伸手到公家的口袋里去拿钱而用于家庭、别墅、汽车、雇佣仆人等等开支要好得多。当时政府官员的家庭用度由公家开支的制度还刚刚开始。谢天谢地,妈妈没有活到这一天,没有看到为党写文章不取稿酬的显贵党员们和他们的孩子、家里的佣人、乃至一切远亲都骑在国家的脖子上过他们的好日子。

问题在于母亲一直坚持她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她从不妥协。她自己属于革命的年轻一代,他们是最初的五年计划的热情劳动者,他们是具有坚强信念的新生活的建设者,他们自己就是新的人,他们虔诚地相信被革命从市侩习气和旧社会的罪恶中解放出来的人的新的理想。她用革命理想主义的全部力量相信这一切,而她周围的人们用自己的行动也证实了她的信念。在这些人们中间,我父亲曾是她心目中新人的最高典范。一个年轻的中学生就是这样看他的;他是一个刚从西伯利亚归来的“百折不挠的革命者”,是她父母的朋友。对她来说,在很长时间内父亲在她心中就是这样的人;但并非永

远如此……

我想正是因为妈妈是个很聪明的女人，心地极其真诚，因此她的心最终明白了：父亲并不是一个新人，如她青少年时代所想象的那样，因此她觉得非常失望。这种失望无比可怕，使一切都变得空虚了。

我的保姆告诉我，说在我母亲死前不久，她十分忧郁，脾气也不好。这时有一位她中学时期的女友去看她，她们就坐在我的儿童室里谈话（母亲从来都在这里会客），我保姆曾听到她说：“一切都烦恼极了”，“一切都讨厌死了”，“没有一件高兴的事”。她的女友问她：“那么孩子呢？孩子呢？”“一切，连孩子在内”，母亲一再重复着说。因此，我的保姆懂了：既然如此，她对生命也真正厌倦了……可是，我保姆以及其他一切人都一点也没有想到她可能几天之后就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不幸的是，1932年的秋天，一个亲人都不在莫斯科。巴维尔舅舅和斯瓦尼泽全家远在柏林；安娜·谢尔盖耶芙娜和她的丈夫在哈尔科夫，外祖父在索契。这时妈妈从工学院刚刚毕业，身体也过于疲倦。

她的神经本来就不那么好，完全不能喝酒；酒对她身体很有害，因此不爱喝酒，而且当大家喝酒时她就非常害怕。父亲曾对我讲过：说有一次妈妈从工学院参加晚会回来，她喝了一点酒就完全病倒，两臂都痉挛了。父亲扶她睡下，安慰了她，于是妈妈说：“你还是有点爱我！……”这是他在战前亲自对我说的。在他死前的最后几年，他越来越常回忆起妈妈，并且一

直在寻找致妈妈于死命的“罪魁祸首”是谁，是什么？

我和妈妈最后一次见面大概就是她逝世的前夜，不然就是她死前的一两天。她把我叫到她的房间里，叫我坐在她心爱的软榻上（一切在高加索住过的人，就再也离不开这传统的软榻），久久地教导我应该作一个什么样的人，并且如何作人。她说，“不要喝酒！”“永远不要喝酒！”这是她和父亲争吵的回声，按照高加索的习惯，总是让孩子喝点上等葡萄酒。在她的眼里，这就是学坏的开端，不会有好结果。大概她是对的，后来我哥哥瓦西利就死于酒精中毒。这一天，我在她的软榻上坐了很久，由于我总是很难得见到妈妈，所以这最后一次记得十分清楚。

“你还是有点爱我！”妈妈是这样对父亲说的，不管会怎样，她还是继续爱着父亲……她是用一种爱情专一的纯真本性的全部力量在爱着父亲，虽然理智也反抗她这样做，但是她一旦被一个人征服，就永远把自己交给了他。此外，母亲是一位贤妻良母，丈夫、家庭、孩子以及她对这个家庭的义务感，对妈妈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我想，因此她不能离开父亲，虽然她心上不止一次出现过这种想法。不大可能……她绝不是浮光掠影的浅薄的女人，相反她对自己的要求十分严格。

有人说她太“严格”、“严肃”，和她的年龄不相称，看上去好像比实际年龄大，这是因为她非常善于克制自己，事业心强，从不喜欢“放任”自己。听保姆说：外祖母和安娜·谢尔盖耶芙娜常来作客往往使妈妈不高兴，正是因为这两位善良、直爽的女人要求妈妈坦率地谈她的心理话。对她们两人来说，

哭一场、诉两句苦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妈妈受不了这些。

这种自我克制，可怕的内在的自我纪律，精神的紧张，不满和愤怒都积压在心上，像弹簧一样，内部压力越来越大，总有一天不可避免地要爆发；这弹簧弹起来时所具有的力量是可怕的。

事情正是这样发生的。导因本身是微不足道的，因此谁也没有特别去注意，似乎是“也没有什么原因”，只不过是在纪念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的节日宴会上发生了很小的口角。“只不过”是父亲对她说：“欸，来，你喝一杯！”而她“只不过”突然喊道：“我不是你的什么‘欸’！”<sup>①</sup>——于是她站起来，当着大家的面，离开了宴会桌。

我的保姆在去世前不久，已经预感到自己不久于人世，所以有一次给我讲了所发生的一切。她不愿意带走这些事情，想要清洗自己的灵魂，这是她的忏悔。我们两个人坐在一个小树林里，她讲给我听。

我们的管家卡洛琳娜·瓦西利耶芙娜·蒂尔通常每天早上叫妈妈起床，她单独睡在自己的房里。父亲睡在他的书房或是靠近饭厅的装有电话的小房间里。那天夜里他就睡在这个房间里，他很晚才从那个宴会上归来，而妈妈比他回来得早。

这些房间都离服务人员住的地方很远，从这里到那些房间去要穿过小过厅，走过几间儿童卧室。父亲睡的房子在饭

---

① 娜佳因为丈夫对自己不礼貌而生气。在这种正式场合，他应该叫妻子的名和父名，或者她的名字的爱称。

厅的左边，从饭厅到妈妈的房间要经过小过厅，这房间在饭厅的右边。她的房间的窗户开向亚力山大罗夫花园，正对着“三位一体圣门”。如果你现在站在会议大厦剧院售票处的旁边，向大厦左面一点看，穿过亚力山大罗夫花园，就会看到“欢乐宫”。这是一座古俄罗斯式的建筑，它有尖的屋顶，窗子朝着花园，这就是妈妈房间的窗子。我不喜欢向这个方向看……

卡洛琳娜·瓦西利耶芙娜和平时一样，很早就起来了，她到厨房准备了早餐就去叫妈妈起床。她吓得浑身发抖跑进我们儿童室来把保姆叫走了，她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她们一起走了出去。妈妈躺在床前的血泊中，手里握着一支“松牌”的小手枪。这手枪是当年巴维尔舅舅从柏林带给她的。枪声极小，所有房里都听不到。这时她已全身都冷了。两个女人吓得魂不附体，怕父亲马上要到这里来，忙把遗体抬到床上，把死者收拾了一下。以后她们惊慌万状不知应该做什么好，于是跑出去给那些比较会办事的人打电话，打给警卫队长、阿维尔·叶努基泽和妈妈的好朋友波琳娜·莫洛托娃……

很快全都来了。父亲还睡在饭厅左边的小房间里。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也来了。大家都极为震惊，没人能相信这是真事。

最后，父亲也来到饭厅里。他们告诉他说：“约瑟夫，娜佳离开我们了。”

我的保姆是这样讲给我听的。我比别人更相信她的话。首先，因为她是绝对纯朴的人；其次，因为她讲给我听正是她在我面前的忏悔，一个纯朴的女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忏



悔时是绝不会说谎的。

波琳娜·谢苗诺芙娜·莫洛托娃(日穆楚任娜)对我讲的也和保姆讲的差不多。她讲的时间也和我保姆讲的时间差不多,都是在1955年。波琳娜·谢苗诺芙娜在此不久前才从哥萨克斯坦流放中归来,她被流放了四年(1949—1953)。

波琳娜·谢苗诺芙娜和妈妈以及其他的人都参加了那天的十月革命节的宴会。大家都看见了这次口角。看见妈妈离去,但是谁都没有想到这会有什么严重的问题。波琳娜·谢苗诺芙娜和妈妈一同出去的,她想陪陪妈妈,免得她自己一个人走。她们一同走出去,围着克里姆林宫的宫殿走了几圈,散着步,直到妈妈的心情平静下来。

“她平静下来以后,就和我谈起学院的事情,她对自己能即将工作很高兴,对工作的前途想得也很多。你父亲很粗暴,和他在一起生活很困难——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可是他们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有了孩子,有了家。大家都热爱娜佳……出了这样的事谁能想到呀!当然,这不是理想的婚姻,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难道真有理想的婚姻吗?”

“当她完全平静下来以后,我们就分手各自回家睡觉。我当时满以为什么事都没有了,一切都过去了。可是第二天早晨来了电话,通知我们这可怕的消息……”这些话是波琳娜·谢苗诺芙娜说的。

我现在还记得，早晨还没到该上学的时间，就突然带我们孩子们出去散步。我至今还记得，吃早餐时，娜塔丽娅·康斯坦丁诺芙娜用一条小手帕擦眼泪。我们不知道散步的时间为什么那么长。以后就突然把我们送到索科洛夫卡别墅去——这是一座光线很暗的阴森森的房子，这个秋天我们没有去我们心爱的祖巴洛沃，都到这里来了。

索科洛夫卡一向都非常阴森而使人觉得忧郁。楼下的大厅光线暗极了，好像到处都是屋角旮旯，到处都很昏暗，房间里很冷，不舒适，十分不习惯。后来，傍晚的时候，伏罗希洛夫来了，他带我们出去散步，设法和我们玩，可是他自己却哭起来了。他们如何把母亲死去的噩耗告诉我的，我又有何反应，现在已记不清了——大概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死的概念

.....

我懂得了什么事情是当我被带到一座大楼的时候。这楼就是现在的国营百货公司，当时还是一个机关办公大楼，大厅里停放着承殓遗体的棺木，正在进行向遗体告别仪式。这

时季娜·奥尔忠尼启则把我抱了起来，使我凑到妈妈的脸上，叫我“吻别”，这时我真怕得要死。此时此刻我大概感受到了死亡，因为我觉得可怕极了，于是我大叫了起来，想躲开妈妈的脸，接着很快有人把我抱到另外的一间房里去了。阿维尔·叶努基泽老伯把我放在他的膝上，哄我玩，又塞了一些什么水果在我手里，我于是又忘记了死亡的事。以后就没有带我去参加葬礼，瓦西利一个人去了。

后来当我长大以后，有人告诉我：我父亲受到极大的震动。他如此为之震动是因为他不明白：这是为了什么？为什么在他背上给他以这样可怕的打击？他那么聪明当然不会不明白：自杀的行为总是想“惩罚”某人——有这样的意思：“那么好吧”，“好，给你点颜色看看！”“会叫你明白的！”这一点他懂了，但他不能理解——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这样惩罚他？

于是他问他周围的人：难道他不善于体贴她吗？难道他没有把她作为妻子去爱她？难道他没有作为人去尊敬她？难道他少陪她去几次戏院就那么重要吗？莫非这真是十分重要？

最初的几天他极为震动。他说他自己也不想再活下去了。这是巴维尔舅舅的寡妻说的。当时，在妈妈死后的几天内她曾和安娜姨妈一起日夜守在我们家里。父亲当时精神很不好，不能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有时他异常愤怒，大发脾气。这是因为妈妈给他留下了一封遗书。

看样子，妈妈是夜里写的这封信。自然我从来没有见到这封信。大约这信马上就被销毁了。但是确有此信，是看过

这封信的人告诉我的。那是一封很可怕的信，充满控诉和谴责。这不简单是一封私人的书信，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封政治信件。父亲在读完这封信后，他会想：妈妈只是表面上和他在一起，而实际上却站在当年的反对派的行列里。

他因此十分震动而又万分气愤。在举行公民追悼时，他走近棺木站了一分钟，突然用双手推开棺木，转身走了。他没有参加葬礼。

朋友和亲人安葬了妈妈，跟在棺木后面的是她的教父阿维尔·叶努基泽老伯。很长很长时间我父亲不能保持自己的平衡。他没到新处女墓地去看过一次妈妈的坟。他不能。他认为母亲已经成为他个人的敌人而离开了他。

直到父亲去世前的最后几年，他突然常常和我谈起这件事，几乎使我快发疯了……我看到他在寻找，在痛苦地寻找“原因”，但是他没有找到。他一会儿骂那本“邪书”，妈妈死前不久曾读过一本当时十分流行的书《绿帽》<sup>①</sup>。他认为妈妈受了这本书的极大影响……一会儿他又骂波琳娜·谢苗诺芙娜，安娜·谢尔盖耶芙娜，骂送给妈妈玩具般的小手枪的巴维尔舅舅……他四处寻找“是谁之罪”，谁给她“灌输了这种思想”，也许他想，如果找出这个人，他就会发现一个他的非常重要的敌人。

如果说当时父亲都不了解妈妈，那么在事隔二十年之后，

---

① 迈克尔·阿伦著。

他已经完全不能理解她，而且也忘记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幸好他现在谈起妈妈的时候，态度缓和了些，甚至有些怜悯她，提起自杀的事也不责怪她了……

那个时候，常有人们开枪自杀的事。托洛茨基主义已经埋葬，开始了集体化，反对派的派系斗争分裂了党。许多著名的党的活动家，一个接着一个地自杀了。不久前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了，这件事人们记忆犹新而且还没有来得及去理解呢！

……

我想这一切都不能不对妈妈的思想有影响，因为她这个人十分敏感，容易冲动。阿利卢耶夫全家的人，为人行事都很有分寸，有些神经质，生性谨慎。这是一种演员的性格，而不是政治家的性格。普希金说过：“不能把一匹战马和一只战战兢兢的鹿套在一架车上”。

问题在于妈妈在她的一生中是按着感情的规律生活和行动的。她性格的逻辑是诗的逻辑。

马雅可夫斯基在他死前不久难道没有论证过吗？他说：“我绝不跳下梯井<sup>①</sup>，也绝不服毒，我不能对着自己的太阳穴扳动枪机……”可是，说完这些话以后，他正是这样做了。

这样的事物任何人也无法事先就计划好的。

母亲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父亲很尊敬她，很信任她，直到她死，父亲一直认为妈妈是他最亲近而忠实的朋友，妈妈虽然非常理智，组织性很强，善于克制自己，然而她是一个感情

---

① 梯井是旧式楼房楼梯间的空地，从上向下望可以看到底层，很像一个井，当时常有人这样跳楼自杀，现在的建筑已经改变了这种旧结构。

炽热的人。

那些岁月的人们都是非常重感情而且十分真挚，如果他们认为不可能生活下去了，那么他们就会自杀……可是现在谁会这样做呢？现在有谁会如此热烈地对待生活、争论、自己和敌人的信念呢？谁会如此认真地考虑某一件事是可能的或不可能的呢？

冷冰冰的怀疑主义征服了一切；怀疑，淡漠，对一切最宝贵的和一切最重要的事物都漫不经心，无所谓。马马虎虎，凑合着活下去就行了……

那个时候，人们不是这样生活的。妈妈不过是她自己的时代的孩子。大概，如果她不那么年轻，也许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三十一岁的年纪对她来说，冷静思考的时期还没有到来。

我常常想：如果她没有死，那么她以后的命运会是如何呢？不会有什么好事等着她。早晚她会成为父亲的敌人。当她看到她的最好的老朋友，如布哈林、叶努基泽、雷登斯、斯瓦尼泽夫妇都一一死去，她是决不会沉默的，她绝对熬不过去的。

也许命运赐予她死亡使她免于遭到等待她的更大的不幸吧？！但是她——一只“战战兢兢的鹿”无力事先预防这些不幸，或事后阻止这些不幸……

我的朋友，前天我写给你的一切，对我说来是最困难的……每次想起这件事都觉得可怕，痛苦，何况动笔去写呢。我在这大地上生活的时间越长，年龄越增长，想起来就越难过。

很幸运，我的好朋友扎伊莫夫斯基一家拖我到伊斯特拉水库去玩，那里的农村中住着我们的熟人，冬天我们曾经一起在茹科夫卡附近滑过雪。他们不知道我是多么感激他们！

从伊斯特拉河后面，我们转到布热罗夫斯科耶公路上去。于是一大片平静的、永恒的、对一切人都一视同仁的大自然，像天空一样，从四面八方向我围拢过来。这是多么美妙的地方！多么轻盈、恬静、温柔，真是无与伦比的美啊！

海，自然是壮丽的。南国也的确绚丽而富饶，山峦起伏给人尤为深刻的印象，确是如此。然而这些土灰色的农舍（多少年来依然故我地立在这里），那田野和草地，那地平线上的小树林，上方那并不碧蓝，却灰蒙蒙的天空，在所有这一切之中，诱人的魔力又是什么呢？顺着公路生长的零陵香，它那开着黄白色小花的灌木丛，把这些小花在手心一揉，有一种蜂蜜的香

气，难道这甜蜜的芬芳是南国的玫瑰能够与之相比的吗？还有那伊斯特拉河啊！深绿色的河水静静地流着，它那弯弯曲曲的堤岸，长着高大的白柳，河里不好游泳，只能望着它，望着它，于是这全部恬静的美似乎压住了喉咙，好像心里甜蜜得要哭出来，宛如重逢久别的好友，他向你走来，你把头偎在他的胸前，高兴得流出了眼泪……

伊斯特拉水库此刻也成为雄浑壮丽的自然景色。如镜的水面泛着微波涟漪，阳光下金光闪烁。极目望去，到处是帐篷，小汽车，年轻的面孔，晒得黝黑的身体，五光十色的游泳衣——处处都是青年人，有骑自行车来的，有背着旅行囊步行来的，有坐汽车来的，车顶上还捆着小船。人们多么想愉快而随随便便地生活啊！像大地上的一切人所希求的一样，过一种美好、健康的生活。

我们然后驱车到阿廖赫诺沃村，一直驶到村子尽头的那所房前，房后就是一片白菜地。村里的房子都很整洁。大田收拾得那么精细，阡陌井然，比莫斯科郊区的克拉斯诺哥尔斯克区可好得多，基础坚实得多，有条理得多。原来，阿廖赫诺沃村的集体农庄主席是一位农学家，叫施密特，他是在专家下乡的运动中从莫斯科派到这里来的，已经在这里工作多年了。那时候什么和农业不相干的乱七八糟的人都下了乡，但也有真正的人材。这位施密特，人们认为他是犹太人，他实际是俄罗斯化了的德国人，这一点我们常常分不清楚。他把集体农庄经营得井井有条。四周是果园、麦田和菜地，人们生活得不错。实际上也用不着费多大劲儿，只要动动脑筋，机灵一



点，有些组织能力和农业知识，有首倡精神也就够了。

傍晚前我们回到村里，过了许久夜幕尚未降临。村子就座落在田野之中，水库离这儿不远。在这平平整整的田野上面，是辽阔的天空，光线久久地从苍穹洒下来，一会儿是落日红霞一片，一会儿变成紫色，一会儿又是日近黄昏蓝色满天。是这样的恬静，四面八方飘来青草的芳香，那浓厚的、沁人心脾的香甜……以后，一轮银白的满月从树林后面冉冉升起，芳香越来越浓郁，脚下的草渐渐变得潮湿，于是空气越来越变成了深紫色。接着头上的星星也出来了，一个接着一个，从四面八方向你围拢，多得使你什么都不能想，只能看着这满天星辰。我在院子里搭了行军床，就睡在这开阔的天幕之下，繁星对着我闪闪发光，我真高兴得想哭，我高兴我还活在人间，呼吸着这芳草的香甜，望着星辰……

白天我们在水库里游泳，在岸边散步。这水库很像一片大海，我们从悬崖上欣赏水库的风光，我们身后的麦地一片金黄，水面的上方，松软的团团白云悠然升起。

稍后，一团乌云不知来自何方，我眼看着它膨胀起来；变成了黑色，突然间铺天盖地满天乌云，只有田野呈现黄色，还是亮亮的。接着一声霹雳，大雨倾盆，越下越紧，后来又骤然转为冰雹——这期间雷雨已移向水面上空的远方，半边天际又湛蓝湛蓝的了。

后来从一块已经浮去的乌云的边缘，射出一缕缕的长长金色光束，穿过残云，并迅速把乌云驱散。太阳又出来了，光辉灿烂，遍地的水珠都干了，这清新的被冲洗过的大地多么美

好啊，真使人欣喜欲狂……这一整天我都浸在泪水中。

一切都已过去，好像就根本没有过云雨。一小时过后，天气又热起来，四周都晒干了，旅行者又在沙滩上晒着太阳，小船在水上向四面八方划去。

晚上我们回到家中，这一天一夜真是疲劳顿消、愉快轻松。但是我一直怀着悲愁和喜悦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心情观看着周围的一切，于是我想：我对俄罗斯的如此深厚的爱，是从哪里来的呢？

可是我们，我们真是天下难寻的野蛮人。在格鲁吉亚，在乌兹别克斯坦，在乌克兰，每一块涂着釉彩的古老的陶片，每一堵古墙，都当做传家之宝、贵重的财富和珍品而加以保护。可是“我们懒惰又无好奇心”<sup>①</sup>。离阿廖赫诺沃村不远的小山上，有一处教堂，教堂旁边有一座小钟楼，这两个建筑物在最后这次战争的炮火横飞之下奇迹般地保存下来，教堂四周都是古老的菩提树，像卫士一样守护着它，小教堂呈立方形，中央有一个圆形屋顶，这座正在坍塌的教堂顶上长着一棵多年生的接骨木，现在这教堂是放土豆和干草的仓库。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纯粹由于懒惰而浪费自己的财富，自己的美好的古老的宝藏。没有哪一个地方的革命像我们俄罗斯这样毁坏了这么多对自己有益的东西；即使是现在，虽然一天到晚侈谈俄罗斯国家的传统，实际上不过是一句又一句的空话而已。

---

① 普希金的诗句，

妈妈虽然混有不同民族的血统，但是，无论从她所受的教育，从她的性格和气质来说，都是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父亲一生热爱俄罗斯，他深深地爱它。我没有见过另一个格鲁吉亚人像他这样忘掉自己的民族特点，这样强烈地爱俄罗斯的一切。早在西伯利亚时，他就真正地爱上了俄罗斯，爱它的人民、语言和大自然。他常常回忆他那流放的岁月，好像这些年他仅仅是在那里钓鱼、打猎、在苔原森林中散步。他对俄罗斯的爱，始终不渝。

那么我——关于自己，有什么可谈的呢！我是那样了解那些侨居法国又重返故国的人，他们在那里的生活也不是过不去……我也了解那些没有到国外去投亲靠友而是从集中营和监狱归来的人，他们不愿意，不管怎么说他们不愿意远离俄罗斯故土！

这些没有什么可说的！不管我们的国家多么残酷，不管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多么艰难，不管我们怎样跌倒，摔得头破血流，忍受伤痛和不白之冤，可是我们每个和俄罗斯心心相连的人任何时候都不会叛离它，抛弃它，也不会离开它而去寻求安逸和享受，没有灵魂的安逸和享受。看那俄罗斯的苍白的天空中柔和而悲伤的光，那智慧和宁静的美照耀着我们一切人，它能战胜一切，永世长存，其它又算得了什么呢？

在我的亲人残酷地被夺走之后，在我经历了这么多苦痛的失望之后，在我虚度了三十七年无所事事的、愚蠢的、双重的、无益的，唉！没有任何出路的生活之后，你照耀着我，唉！我亲爱的、真挚的、美好的、没有条理的、智慧的、残酷的俄罗

斯，你照耀着我，安慰着我。在我的眼里任何人也别想在你脸上抹黑……如果不是你的永恒的真和善的光辉照耀着我，我早狠下心肠悬梁自尽了。可是你照耀着我、温暖着我，不管怎样总是应许我在这美好的、我深爱着的、郁郁葱葱、碧波千顷的地方，在今生还赐予某些希望。\*

---

\* 四年前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我的确不能设想我会离开俄罗斯。那时大家抱着一种希望，希望国家有可能进行根本的改造，转向真正的民主。

妈妈死后的十年里（妈妈死时我仅六岁），我的父亲尽他的一切可能努力做一个好父亲，他做到了这点，虽然在他那种生活方式下，他是很困难的。在这些年月，虽然原来的家庭生活已经破坏了，但是对我来说，父亲的权威在各方面都是绝对的。后来，我从中学毕业了，又加上 1942—1943 年发生的一些其它事件，一切情况都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我们的关系疏远起来，以后就越来越不好。

母亲死后，我们那无忧无虑、充满着嬉戏、有益的消遣、学习和欢乐的童年生活很快就解体了。

第二年，1933 年夏天，我们去祖巴洛沃的时候，我发现树林中的儿童游戏场不见了，秋千、吊环、“鲁宾逊小屋”都不见了，像被一把扫帚扫走了一样。只有那块场地和沙堆的遗迹还久久留在林中。以后也都给荒草埋没了……

我们的老师纳塔莉娅·康斯坦丁诺芙娜在我母亲死后马上离开了我们。她的德语课、讲读课、绘画课我都永生难忘。

她是自己辞职的，还是被赶走的？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学习的节奏被破坏了。我哥哥的老师亚力山大·伊万诺维奇又留了两年，由于他常常催促瓦西利做功课，使瓦西利讨厌他，不久也走了。

父亲迁入新居，他不能在我母亲死去的地方住下去。他在孔策沃给自己修了一座单独的别墅，迁了进去。这以后的二十年他一直住在那里。我们孩子和亲戚们在星期天、节假日以及夏季还是继续到祖巴洛沃去。父亲很少在克里姆林宫的新房子里住，他只是到这里来吃午饭。这所新居是很不适合于生活起居的。新寓所位于“议会”大厦的二楼，这大楼还是当年哥萨克夫建筑师修建的。当时二楼是个有正式用途的长长的大过厅，大厅的一面是一排房间，都很单调，毫无特色，墙壁有一米半厚，天花板是穹形的。

把一个旧式的办公大楼给我父亲改成寓所，只是因为他的部长会议主席和党中央第一书记的正式办公室设在这个大楼的三层上，他只要下一层楼就可以“回家”吃午饭了。他的午饭一般都是下午六、七点钟开始，一直继续到夜里十一、十二点钟。饭后他就坐上汽车去勃利日尼别墅。次日午后两、三点钟再到中央的办公室来。他的这一生活日程一直保持到战争开始。

吃午饭这段时间是他在家里和孩子们见面的时候。在饭桌上他询问学习情况，检查我的记分册，有时还要看看我们的作业本。战争开始以前，他像其他的父母应该做的那样，在我的学校记分册上签字。哥哥的也是这样，直到他1939年进航

空专业学校。那时我们还能常常见到他，几乎天天可以见面。

这时还继续去索契度夏，也带我们去。外祖父、外祖母、巴维尔舅舅和舅妈、雷登斯和斯瓦尼泽两家也还都来看望父亲。每逢有谁过生日和新年，大家还是一起去父亲的勃利日尼别墅，大家还是一起同去索契休假。

但是一切都从内部发生了灾难性的变化。在父亲心上有什么东西已经被摧残了。于是这个家也就变了。

这变化不是一下子来的，是逐渐发生的。到1938年，我母亲请来的那些人，除了我的保姆，一个也没有了。他们都尊敬妈妈，热爱她，一直没有忘记她，而且设法尽可能保持妈妈建立起来的家中的秩序。但他们都一年一年地逐渐不见了。有一年，我们九月赶回家上学，发现我们的老厨娘叶丽莎维塔·列昂尼多芙娜走了。她是个丰满、严肃、端庄得像女皇般的妇人，梳着老式的发髻，简直就是叶卡捷琳娜一世。她被辞退了。后来塔尼亚也给弄走了，她个子高大，非常难看，像个炮兵，总是端着沉重的装着食品的托盘，但她为人很好，老是高高兴兴的。

最后，我们的女管家卡洛琳娜·瓦西利耶芙娜也走了。这是1937年的事，听说这与她的母亲或外祖母是德国人有关，虽然她在我们家中已经工作了十年，而且几乎就是我们的家庭成员，也给赶出门外。祖巴洛沃的全体服务人员都撤换了，父亲的新别墅里清一色都是新的、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人。

而主要的是我们家的管理制度完全改变了。以前是母亲自己随意从什么地方挑选人，她喜欢什么样的人就挑选什么

样的人。现在家中的服务人员都是公家派来的领国家工资的人。于是工作人员或服务人员（现在如此称呼，以区别于“资产阶级”的仆人）的编制猛增起来。每个别墅里都出现了警卫长、警卫队（警卫队又有自己专门的首长），两名厨师，每天轮流值班，两班清扫人员和餐厅服务人员，也是分班轮换。这些人都是由专门的干部处选派来的。当然是按这个干部处的条件挑的，于是一旦人选为这种“服务人员”，他们就成为国家保安部“工作人员”，当时克格勃称为格波乌（即国家政治保卫局）。

对我的保姆，那些首长们感到很难办，在这些公家人当中，她很像一只白乌鸦<sup>①</sup>。因此也想把她弄走。

1939年，像割草一样左左右右的人全都整掉了的时候，有个没有事干的做干部工作的人挖出来一个材料，说我保姆的丈夫在革命前曾在警察局当过文书。我的保姆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和他分开了。我的天！于是向我父亲汇报，说她是“不可靠的”人，又说她的儿子和天知道什么人有来往。我父亲对这些事没有时间详细追究，他认为原原本本查清这些事是专门工作人员的事情，给他看的应该是“结论性的材料”。

当我听说他们要把我保姆赶走时，大哭起来。父亲最受不了眼泪，也许是产生了向那些荒谬行为抗议的某种想法，他突然十分生气，命令这帮人不许找我保姆的麻烦。

---

① “像白乌鸦”是俄语中的成语，有在一群人中突出，鹤立鸡群的意思。这里指老保姆不是属于保安部的工作人员，是个异类。



从1926到1956年这三十年中，一直到去世她都是我们的家庭成员。她活了七十一岁。我以后会单独讲到她，因为她的生平是值得专门讲讲的。

国家的“服务人员的编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膨胀起来，决非我们一家如此，其他政府成员，起码是政治局委员家中都是一样。不过没有哪一家像我们家中这样受着官方的和半军事的统治，也没有哪一家像我们家这样完全置于格波乌-内务部-国家保安部的管辖之下，因为我们家没有主妇，而那些有主妇的人家多少减少和限制了这种官气。但是，从实质上说，这一制度到处都是一样：完全依靠公家开支用度，由国家工作人员来管理，而住在这个家里的人都生活在日夜不断的警惕的眼睛的监视之下。

这个制度是三十年代初期在某处出现的，后来从规模和权限上都日益巩固和发展。直到贝利亚被除掉后，中央才终于承认必须使国家保安部不超过它应有的权限，这时大家才过上了另一种生活，能自由地喘口气，政府成员和普通老百姓都是如此。

两个好姑娘已从祖巴洛沃给赶走了，一个是大大个子，身体结实的克拉芙吉娅，一个是长得苗条的季娜，她俩都是招呼开饭的服务员。出现了新的人，其中有一个年轻的、鼻子向上翘的瓦列奇卡。她的嘴整天都闭不上，老是高兴得大声嘻笑。她在祖巴洛沃工作了三年，就被调到父亲的孔策沃别墅，一直工作到父亲去世，她后来升为管家（或者如现在的称呼：管家大姐）。

谢尔盖·亚力山大罗维奇·叶菲莫夫在我们家待的时间长一些，妈妈活着时他就是祖巴洛沃的警卫长，以后被调到孔策沃的勃利日尼别墅。他是这些“首长”当中比较通情达理的人，个人生活要求也较为朴素。他对我们孩子们和那些幸存的亲戚也体贴些，总之，他对我们和我们的家庭还有起码的人的感情，这种感情是警卫部队其他高级干部所没有的，其他高级干部的名字现在连想都不愿意去想一下……他们只有一种追求，就是寄生在这样一个有油水的地方，给自己多捞一把。他们都给自己修起了别墅，用公家钱为自己买了汽车，他们的生活不比部长们差，甚至于也不低于政治局委员，而现在他们也只是为失去了的物质享受而伤心落泪。

谢尔盖·亚力山大罗维奇不是这样的人；虽然以他的高级干部的地位，也享受得很多，但是，是“有度”的。他还没有到部长的水平，但是一位科学院通讯院士会羡慕他的住宅和别墅……这对他来说已经是很朴素了。晋升为将军职衔后（国家保安部的将军），谢尔盖·亚力山大罗维奇在最后那几年失去了父亲的宠信，他被调离，以后就被他的那个“集体”，也就是说被克格勃其它的将军和上校们吃掉了。他们在我父亲周围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宫廷。

另一个将军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伏拉西克也应该提一下。他从1919年起就一直在父亲身边，为时最久。最早他是担任警卫的一名红军战士，以后成了幕后的权威人物。他领导担任父亲警卫工作的全体人员，自认为是父亲的亲信。由于他极无文化，粗暴、愚蠢到难以想象的程度，又身为显贵，

以至于最后那些年他居然向一些艺术活动家们讲授“斯大林同志的审美观”，他自以为对此十分了解。于是这些艺术活动家们都听从他的劝告。大戏院的节日晚会，乔治大厅的宴会演出，无不经过伏拉西克的审查批准……他的厚颜无耻真是无以复加；他非常乐意向艺术家们转达忠告，说某一电影，某一歌剧，或当时正在建筑中的高层建筑的侧影是否受到“主人”①的“赞许”。

实在不值得为他浪费笔墨，这个人毁坏了许多人的生活，但是他是一个如此五光十色的人物，所以也就非提他一笔不可。在我们家中，在这些“服务人员”的眼里，伏拉西克的地位和父亲是同等的，因为父亲毕竟是高高在上，离他们很远，而伏拉西克却拥有为所欲为的权力……

母亲在世时，他不过是个没有什么地位的最普通的警卫员，自然，也从来不敢进我们家门一步，我们家里连他的影子也没有。后来他常住父亲的孔策沃别墅，从这里向父亲的其它官邸发号施令，官邸年复一年越建越多了……

仅在莫斯科近郊，除了祖巴洛沃（我们的亲戚曾在这里有过安静的一席之地）和孔策沃之外，还有两处别墅。一处是李甫基，这是位于季米特洛夫公路上的一座古老的庄园，有个大水池，宅院幽美，花园极大，长着百年的菩提树。另一处在谢苗诺夫斯科耶，这是战前新建的，附近是一个老庄园，有大水池，还是从前农奴挖的，四周一大片树林。如今是“政府别

---

① “主人”当时指斯大林，许多人在下面都这样称呼他。

墅”，每逢夏季，政府领导人就在这里会见一些著名的艺术家们。

李甫基和谢苗诺夫斯科耶都安排得和我父亲在孔策沃的别墅一模一样，房间的陈设和家具的式样都一点不差，房前种的是同样的花草树木。伏拉西克权威地解释道：“主人”喜欢这样，“主人”不喜欢那样。父亲很少来住，一年也来不了一次，可是全班人马日夜等候他的来临，完全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如果车队已经“离开”了勃利日尼出发去李甫基，李甫基就慌成一团——从守门的警卫战士到厨师，从餐厅端饭的服务员到警卫长，个个魂不附体。大家像等待上帝的最后审判来临一样。大概伏拉西克这个喜欢大喊大叫，申斥一切人的粗暴至极的大兵，对人们来讲是最可怕的了。

那个时代的另一个独一无二的畸形标本也会引起我们不少的兴趣，这就是派到我们克里姆林宫宿舍的管家（或称管家大姐）亚力山得拉·尼古拉耶芙娜·纳卡什泽。她是国家保安部的上尉，后晋升为少校，是1937年或1938年贝利亚一手调来的。她是贝利亚妻子的堂妹，是他的亲戚。是的，她不是一个走运的亲戚，贝利亚的妻子妮娜很看不起这个“愚蠢的萨莎”<sup>①</sup>。决定这件事时，贝利亚的妻子不知道，或者说她们姐妹两人都不清楚。就这样，在一个好日子，幸运和光荣落到了这位年轻的，长得相当不错的萨莎的头上……当我和往常一样，九月从索契回来时，在门前过厅里迎接我的是一位年轻

---

① 萨莎是亚力山大和亚力山得拉的爱称。

的，有些窘促的格鲁吉亚女人，而不是卡洛琳娜·瓦西里耶芙娜，她就是我们新的“管家大姐”。

她并不是一个很坏的人，她做的坏事多出于愚蠢，出于她的职责，并非出自她的心愿；此外她初来我家，这里是十分寂寞的。我们交了朋友，一直关系良好，直到1942—1943年她和伏拉西克一起向我提供了“熊式服务”<sup>①</sup>为止。那时我只有十一、二岁，我还不能理解和意识到贝利亚在我们家中直接进行的秘密侦察等全部畸形现象。

我的姨妈安娜和任尼亚舅妈（巴维尔舅舅的寡妻）当时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是她们只问她：是否会管理家务？是否会做格鲁吉亚饭菜？亚力山得拉·尼古拉耶芙娜老实地说：“不会。我在家里什么事也不做，我母亲做家务事，我连自己的茶杯都没有洗过一次……”我的姨妈和舅妈惊异不已，说：“那您在这里就很困难了。”可是后来她们也不问了，她们明白：对一个“总监”来说要求的是另一种技能，而不是做菜做饭……

还应该提一下，不久我们在克里姆林宫的宿舍就不允许她们两人进门了。雷登斯已经被捕。打从巴维尔舅舅突然死去，就怀疑是任尼亚舅妈毒死的。被允许到我们家里来的只有外祖父、外祖母和雅可夫。大概是亚力山得拉·尼古拉耶芙娜向她的那位万能的亲戚“告发”了姨妈和舅妈，于是贝利亚认为这些人在斯大林身边闹腾够了，现在应该使他们彼此断绝来往了。于是他们说服父亲，说这些人都是被镇压了的

---

① “熊式服务”是俄语中的成语，应译为“越帮越忙”，这里指故意不周到的日常服务，监视，欺负等等，所以直译。

人的家属，很可疑，很危险。玩这样的花招，对于像贝利亚这样老奸巨猾的人来说，当然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亚力山得拉·尼古拉耶芙娜在我们家的这把交椅一直坐到1943年，至于我父亲为什么和如何亲自把她赶了出去，我以后再讲。她的职责是和我、和瓦西利保持密切接触。她刚刚三十岁，喜欢逗笑，担任“总监”工作又不久，尚未来得及成为一个大首长。格鲁吉亚女人天生是不会扮演这种角色的。总的来说，她人还善良，因此，在我们家中想和我们交朋友是很自然的；何况我们这个家，对她来说是陌生的，她觉得恐怖，感到威胁，加上她的职务和责任又使她非常害怕……她不过是落到这架恶魔般的机器里面的一个可怜的小卒，已不可能按着自己的意志做出任何一个动作，由于她的低下的工作能力和贫乏的智慧，她也只能是让她怎么办，她就怎么办……

她陪我上剧院，我的学习有别人来管，但是她“总管”我的教育，所以也检查我的功课，有时也翻看我的作业本。她的俄语说得不好，写得更糟，她当然无力检查我的作业，这一点她自己明白。然而她能监督和我来往的同学以及我的熟人。可是当时与我来往的圈子是如此有限，如此狭小，我几乎是生活在显微镜的世界里，因此这一工作对她也没有多大的困难。

我相信，她后来会祝福她离开我们家的那一天，她在我家过得并不怎么好受。为了调剂一下她那孤独的毫无乐趣的生活，她把她的爸爸、妈妈、一个妹妹、两个兄弟都接到莫斯科来，他们都领到了房子，年轻人都成了家。她的“工作”给她提

供了这一切可能。后来，我在她的妹妹和弟弟的家里忽然看见了我们家里的老东西，这些东西都是被她当做“没用的破烂”扔出我们家门的。

在我们家里，当然父亲房里的任何东西，任何人都不能碰一下，可是她管“收拾”我和哥哥的房子。她以一个真正的市侩的不可克制的欲望，把我妈妈当年购置的旧家具统统扔了出去，说是老掉牙了，要摆设得“现代化”一些。有一年秋天，我从南方回来，我完全认不出我的房间了。我心爱的古老的雕花酒柜哪里去了？当年这是妈妈很珍爱的东西，她亲手搬到我们儿童室来的。酒柜很大，能盛许多东西，柜子抽屉里保存着妈妈和玛利亚舅妈从柏林带回来的礼物以及安娜姨妈送给我的无数的赠品。这个漂亮的能装百货的大柜子的上格，摆着当年纳塔丽娅·康士坦丁诺芙娜教我们做的彩色的小泥人，下格放着一本本旧的绘画纪念册，图画作业本，俄语和德语作文本……我的保姆认为这些东西都应该保存。亚力山得拉·尼古拉耶芙娜自认为是很有文化的人（她被派做克格勃的工作之前，曾在梯比里斯念过两年工学院），看见我的这些东西说都是废物，就连柜子一起扔了出去；她根本想不到，她扔掉的是我最珍贵的童年的回忆……还有，我妈妈给我摆下的小圆桌和几把椅子也弄走了。亚力山得拉·尼古拉耶芙娜确实换上了比较现代化的家具，但是，却是陌生的，冷冰冰的，没有特色的，对我对别人都毫无意义的。

她对哥哥的房间也是这样处理的，一切能勾起对我们那舒适而方便的旧居的回忆的东西都被扔了出去。我们那个家

的每个角落都是妈妈精心安排得适合我们儿童的需要。

我的保姆默然忍受了这一切。她很明白：反对是不可能的，也是无用的，最好是忍受着，等待着，这期间把可怜的孩子带好，多疼爱他们。于是她压下满腔愤怒，顺从地看着把我的旧物扔了出去，那些有用些的东西，就寄给她农村的小孙女喀琪亚，她比我只小一点点。

妈妈的遗物也逐渐不见了。这些小玩意儿一直摆在我的梳妆台上，有一个美丽的珐琅小盒子，上面有龙纹，还有她的几个茶杯和一个玻璃杯；本来妈妈就没有多少摆设。这些东西全不知去向了。后来我们才弄清楚：现在按“新”的制度规定，家中一切东西均属公家财产，每年清点一次，一切破旧物品“注销”后，就不知运到哪里去了。

真是天高皇帝远，虽然父亲有时也给我们的监护人伏拉西克下达一些关于如何教育我们的指示，但这些指示都是非常一般的：要我们学习得好，公费支付的饮食、衣着、鞋袜不许奢侈，不许供给奇装异服和山珍美味，但要结实、实惠，吃饱；不许娇生惯养，要我们常常呼吸新鲜空气（常到祖巴洛沃去），夏天带我们去南方（去索契或去穆霍拉特卡和克里米亚）。这些都准确无误地执行了，但是也只能是非常一般地执行了，至于执行后应该有什么结果，那就完全取决于上帝和我们自己了。

由于有关我们的教育有上述那些一般性决定，所以当我开始上学的时候，在我身旁又突然出现一位家庭女教师，她叫丽吉娅·乔治耶芙娜。首先她外表引起我的不愉快和惊



异：她个子不高，头发染成土红色，还是驼背。从第一天起就和我保姆发生冲突，后来就一直没有断过。当时我不知道她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只见到我的保姆十分气愤，从房里走出来，丽吉娅·乔治耶芙娜在身后向她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贝契科娃同志！识相一些！您没有权利这样和我讲话！”我盯了她一眼，冷静地说：“可是您，是个蠢货！不许欺负我的保姆！”

这一来她的歇斯底里大为发作，一会儿泣不成声，一会儿大笑不止，骂我是“没有教养的姑娘”，我的保姆是“没有文化的保姆”！——这样的场面我从来没有见过。

风波平息下来，可是她和我从此结了解之仇。她教我德语并“帮助”我做作业。和纳塔丽娅·康士坦丁诺芙娜的生动活泼、十分有趣的教学相比，她的课是如此贫乏，枯燥，而且只有死记硬背。在她的这样的辅导下，我对德语讨厌极了，对音乐，如钢琴、音乐小品、练习曲、音阶、甚至于五线谱符号本身，因为是她硬灌给我的，我也恨死了……

她“教育”我五年，天天来，对待我那生性温顺的保姆总是仇人一般。她用她的歇斯底里、拙笨的讲授、枯燥的教学法折磨着我。我早已习惯于妈妈给我们找的那种优秀的教师了。

过了五年之后，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恳求父亲把她赶出家门。父亲也对这个驼背女人没有好感，因为她愚蠢地见了男人就卖弄风情。这一点就能够使父亲十分讨厌，于是我得以摆脱了她。

以后就再没有给我请家庭教师。父亲决定应该丢掉这一切功课，只学英文，于是我们家常常出现英文教师了。我的英文女教师塔琪扬娜·季米特里耶芙娜·瓦西利契科娃是一位可亲的、乐观的人，长得胖胖的，粗粗的发辫盘在头上。我们交了朋友，一同去索契休假。我们的课也上得很有意思，很愉快，也富有成果。

亚力山大·伊万诺维奇走后，瓦西利的学习一天比一天坏。学校的校长和老师不断写信麻烦父亲，汇报他儿子的品行不端，学习成绩不好。父亲气得要命，大发脾气，训斥了瓦西利，还骂了伏拉西克、姨妈和舅妈，全家都骂了，但是事情并没有什么好转。结果是哥哥进了炮兵学校，以后又转到克里米亚的卡契航空学校学习。他是1939年走的，家中只剩下我和保姆。

那些年月里我生活中另一些很独特的人物，也应该说几句，这就是我的“叔叔们”。

从1937年起，不知是父亲，还是伏拉西克或是国家保安部又决定实行了一项新制度，就是无论我到哪里去：上学、放学、出门走路、去别墅、剧院，后面（不和我一块走，而是离我稍远些）总跟着一个大人——契卡人员。他的任务是“保护”我。可是防的是谁呢？防的是什么呢？

开始时，担任这个任务的是胆汁型的、瘦骨嶙峋的伊万·伊万诺维奇·克里文科。有一次我把我的日记本带往学校给我的同学看，我发现他翻我的书包，看我的日记，从此我就十分恨他。不久一个肥胖而傲慢的亚力山大·谢尔盖耶维

奇·伏尔科夫代替了他的工作。此人逐渐地使我读书的学校\*充满了恐怖。他在学校规定了他的制度：我不能在公用的衣帽间穿大衣，而要在办公室里专门隔出的小房间挂大衣，每次去挂大衣时我都又羞又气，涨得满脸通红。课间大休息时，不能在公共食堂吃早餐，他带我到一个隔出来的角上，把从家里带来的早点香肠面包送到那里给我吃。我忍受了一段时间，后来就造反了。

以后来了一个不大说话的善良的人，名叫米哈依尔·尼基奇契·克里莫夫。虽然他的职务叫人作呕，但是，我们甚至还交上了朋友。从1940年到1944年他一直在我后面跟着，直到这一制度取消为止。这时我已经在大学一年级读书，我恳求父亲取消这个制度，我告诉他：每天上学跟着一个“尾巴”，我很难为情。显然，父亲也明白了这种安排多么荒唐，不过他仅仅说：“那么，见鬼去吧！让他们打死你，我可不负责任。”这时他开过1943年12月的德黑兰会议刚刚回来，情绪很好。就这样，直到我十七岁半的时候，才获得了自己一个人上学、上剧院、看电影、在街上走路的权利……

虽然如此，我和米哈依尔·尼基奇契分手时，彼此还是友好的。我们常去剧院使他高兴。他爱话剧，歌剧差一些，音乐厅使他厌倦，可是当时我非常热衷于听音乐。他总是问我：“今天我们上哪儿去？小斯维特兰娜！”当他知道是去听音乐时，就两手抓着头说：“又去听劈木柴吗？哟，那可有什么意

---

\* 我读书的学校是所谓“第二十五模范中学”，位于高尔基大街斯塔罗比敏诺夫斯基巷，1933—1943年我在这里读书。

思？”由于职务的关系，他还是陪我去，如果音乐不那么高昂，小提琴“锯”得不太利害，他就安静地睡他的觉。他也和谢尔盖·亚力山得罗维奇·叶菲莫夫以及瓦列契卡一样，现在还常打电话给我，问候我和孩子们的起居，也向我“报告”他们家中的新闻。此人心地并不险恶，也不做坏事，他也按他的方式怜悯我，因为他看见了我的全部生活是多么怪诞。他和亚力山得拉·尼古拉耶芙娜一样，执行他们的任务时，不过是个小小的执行者，并非出自“本心”自觉加害于人。害人的是这妖魔鬼怪般的制度，是可怕的整个机构。此外，大概是年纪轻救了我。我直到今天才理解这都是怎么一回事，但是这些在当时只有大人，只有那些练达的，饱经风霜、富有经验的人才清楚。聪明的人那时就深知是怎么一回事，并非二十大以后才“成熟”起来，像今天有些人判断的那样。

我的家（如果现在还能这样称呼的话），直到战争开始之前就是在这样环境中存在的。外祖父和外祖母还住在祖巴洛沃，夏天我们大家都到那里去。我们大家也还一块儿去父亲的别墅，到索契去看那里刚刚修好的新别墅。建筑师米·伊·梅尔让诺夫给父亲修过三座精巧美丽的别墅：一座在索契，离玛采斯塔不远，地点还是父亲和母亲一起选择的；另一座在加格拉附近，靠近霍洛德河；第三座在阿德列尔附近，密谢尔河畔。

斯瓦尼泽夫妇，巴维尔舅舅，雷登斯一家也还都到克里姆林宫寓所来看我们。可是母亲不在了，和以前大不一样了。这个家，亲人之间的关系，相互的关心和友谊——一切都衰败了。

阿廖沙·斯瓦尼泽舅舅最后一次到我们家来时的情景，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他当时心情压抑，面带愁容。大概他已经觉察到发生了什么事；这时格鲁吉亚已经开始抓人，贝利亚就是从这里开刀的……斯瓦尼泽舅舅等候父亲回来，在我的房间里坐了很久，他跟我玩，吻我，把我放在膝上摇我。以后父亲回来了。他难得一个人回家，通常都是把白天在他办公室的那些人都带回家来，以便在吃饭的时候继续谈工作。当着别人的面阿廖沙舅舅也许不便和他谈什么。

父亲好像是故意要和一切家庭的事情，和这个家以及至亲好友断绝关系。

妈妈的死对他来说是可怕的打击，使他的心灵变得如此空虚，他失去了对人、对朋友的信任。他一向认为妈妈是他最亲密最忠实的朋友，把她的死看做对他的背叛，在背后给他一击，于是他也变得冷酷无情。大概每次和亲人的交往都勾起他对母亲的沉重的回忆。所以他开始躲避这种来往。

正是在心灵空虚和冷酷无情这一机缘上，贝利亚得以狡猾地接近了父亲；以前只有当父亲到索契休假时，他才有时在我家出现。这时他取得父亲的信任，在父亲的支持下，他很快就钻了进来，当上了格鲁吉亚第一书记。一位高加索老布尔什维克欧·格·沙图诺芙斯卡雅对我说过，这一任命使格鲁吉亚全体党员大为震惊，奥尔忠尼启则坚决反对，父亲则坚持己见，谁的话也不听。

从格鲁吉亚第一书记到莫斯科的道路就不远了。1938年贝利亚在莫斯科“面南登极”，此后就天天见到我父亲，于是他

对父亲的影响一直继续到父亲逝世。我说父亲受他的影响，而不是相反，不是随便说的。我认为贝利亚的为人更狡猾、更背信弃义、更奸诈、更无耻、更死不回头、更顽固，也就是说胜父亲一筹。父亲有他的软弱之处，他遇事比较多疑，比较轻信人，比较粗暴生硬，但他却比较简单，因此容易上贝利亚这种诡计多端的人的当。这家伙了解父亲的这些缺点。他知道父亲有病态的自尊心，精神空虚，心灵孤独，于是他火上浇油，尽其所能煽风点火，他以纯粹东方式的厚颜无耻进行阿谀谄媚。他的逢迎和吹捧使父亲的老朋友们觉得十分难堪，直皱眉头，因为他们习惯于把父亲看作平等的同志。

在我们全家的生活中，贝利亚起了极其可怕的作用。我妈妈是多么怕他，又多么恨他！妈妈的朋友斯瓦尼泽夫妇、斯瓦尼泽舅舅的妹妹玛丽科（她是阿维尔·叶努基泽的秘书）、叶努基泽老伯本人，都第一批惨遭贝利亚的毒手。只要贝利亚能说服父亲，说他们这些人都是他个人的敌人，居心叵测，就一切都完了。

我已经说过，在许多事情上父亲和贝利亚共同负有罪责。我不想把一个人的罪加于另一个人。不幸的是，他们在精神上是不可分的。但是这个可怕的恶魔对父亲的影响是如此巨大，力量惊人，屡见功效。

沙图诺美斯卡雅告诉我：内战时期贝利亚在高加索起了两面派的作用……他是个天生的阴谋家，作为一个侦探，他时而给达什纳克党<sup>①</sup>服务，时而为红军效劳，看政权落在那一方

<sup>①</sup> 达什纳克党为亚美尼亚反革命政党。

面，而决定取舍。沙图诺茨斯卡雅证明说：有一次贝利亚被我们部队逮捕，他因叛变罪落网，坐了牢等候判决，基洛夫有电报指示，要求处决这一叛徒，基洛夫当时指挥外高加索前线。后来因为紧接着又有军事行动，没有顾得上这个小人物，没来得及执行判决。外高加索的老布尔什维克当时都知道有过这封电报，贝利亚本人也知道有过这件事……过了几年基洛夫被谋杀，原因是否就在于此呢？基洛夫被害不久，1934年贝利亚被提升，以后就日益青云直上……一个死，一个升，这两件事——这种巧合多么奇怪。大概基洛夫决不会允许这个人被选为中央委员。

谢尔盖·米隆诺维奇·基洛夫很早以来，大约是从在高加索的时候起，就是我们家的最好的朋友。他和外祖父一家也素有深交，并十分喜爱我的母亲。我手上还有一张基洛夫和叶努基泽在我母亲灵前照的照片，他们两人都是坚强而不易动感情的人，但是表现在他们那严肃面容上的悲愁竟如此深切……

妈妈死后，基洛夫和父亲夏天去索契休假，把我也带去。至今还留下了许多那时照的家庭生活照片。这些照片是伏拉西克照的，照得不坏，但毫无艺术水平。他总是陪送父亲休假的。现在这些照片就在我手上：有一张照的传统的林中野餐，有一张是在沿海岸行驶的汽艇上，有一张基洛夫家常打扮，穿着衬衫和高加索软底皮便鞋，父亲穿着亚麻布夏制服。我至今还记得这些旅行。大约还有些人来过，也许贝利亚也常来，

不过我记不清了。基洛夫住在我们家里，他是我们自己人，朋友和老同志。父亲很爱他，对他情意深长。

1934年的夏天也和往常一样，基洛夫和我们一起在索契度假。……十二月尼古拉也夫就向他打了一枪……如果说这一枪是与贝利亚的名字联在一起，而不是现在人们说的那样与我父亲的名字有关，那不是更合乎逻辑，更应该吗？

说父亲与这一暗杀有牵连，我永远不会相信。父亲和基洛夫的关系比斯瓦尼泽，比所有的亲戚，比雷登斯，比在一起工作的许多同志都要亲密得多，基洛夫是他的亲信，他需要基洛夫。

我还记得基洛夫被害的消息在我们家中受到了多大的震动……我们全家都熟悉和热爱他。

1936年我们家还失去了另一位老朋友，我想这又与贝利亚的阴谋和卑鄙有关。我指的是奥尔忠尼启则（谢尔戈）。他是我们全家的最好的朋友，曾在我们祖巴洛沃住过很久。季娜·奥尔忠尼启则是我妈妈的好友。“谢尔戈”是个喜欢说笑、嗓门高、十分热情的、真正的格鲁吉亚人。他一进门，他那大嗓门儿和爽朗笑声都会使墙壁晃动。

在外高加索时他就非常了解贝利亚，而且完全不能对他容忍。他是贝利亚窃取权力的极大的障碍，特别是在格鲁吉亚。贝利亚提到上面来以后，显然谢尔戈的处境就很困难了，有人对他造谣中伤，想离间他和父亲的关系。他忍受不了这一切，于1936年2月开枪自杀了；也许在生活最后的一分钟



他想起我的母亲吧？

他的死在很长时间内被解释为“医生的暗害”。不久高尔基也死了，给他们两人治病的两个医生——波列特涅夫和列文被关进了监狱……奥尔忠尼启则曾患肾脏病。

1935年春天，奥尔忠尼启则去克里米亚，到穆霍拉特卡休养，把我带了去。我记得他总是和我玩，愿意我在他身边。可是我那驼子丽吉娅却老拖我去什么公园。奥尔忠尼启则见不得这女人，他总是吃惊：从什么地方给我找来这么个家伙？

当时在“大人”桌上就餐的有：奥尔忠尼启则，艾伊赫，叶若夫，奥尔忠尼启则的专门医生伊兹拉艾里特，还有随行的波列特涅夫教授。这些人都惨遭可怕的厄运：艾伊赫进了监狱，医生们坐了牢，他们都死了。叶若夫先是关别人进监狱，以后被别人关进了监狱。谢尔戈自杀了……在那些年月，几乎没有一个月是能平静地度过的，一切都遭到震撼，闹得天翻地覆，人们像影子般地消失了。有关这些，爱伦堡写得很好，我就不重复了，我那时还没有理解这一切……

对于我——一个中学生，女孩子——来说，我的感受完全来自另外的角度。我感到这些年里，我母亲创造的一切不断地被根除，被消灭，她的精神被顽固地荡涤干净，以便她建立起来的秩序不再遵守，一切都重新安排，使一切都与她的精神相反……我看见了这一切，也理解了这一切，这本来都是显而易见的。我只能写这些东西，至于从政治上进行分析，那就请别人去做吧！

母亲的好友如布哈林、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以及她的其他至亲的死亡，在我的认识上，都是与妈妈有关的事物的毁灭。

我母亲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她以自己的死使父亲得以无所顾忌、为所欲为了吗？或者也许是，从精神上毁灭了他，使他失去对自己的老朋友的信任吗？如果她还活着的话，她可以阻止这一可怕过程的发生吗？

我不这么想，我觉得都不是。然而无论如何她不会背叛自己的老朋友：没有人能使她相信她的教父阿维尔·叶努基泽是“人民公敌”。那么她的道路也会和他们一样吗？那么她难道是我们的不共戴天的敌人贝利亚的对手吗？

猜想这些做什么？！命运救了她，使之免于沉重的考验，这些是她的心灵忍受不了的。也许，上帝会保护她免于遭此浩劫。即或她能找到力量离开她曾热爱的父亲，那么她的命运将会更加可怕，那时她将得到的还要加上父亲的报复。

## 13

从1933年到战争开始这些年月，我的生活就是学习。这是我的小小的世界：学校、作业、上课、少先队的工作、书籍、我的房间——这就是我的小小世界；这里我的保姆像舒适的俄罗斯炕炉<sup>①</sup>一样温暖着我。我的学校很好，它给我的知识和技能都是终身有用的；我交的朋友，友情始终不渝；我的老师，如古尔维查、雅斯诺波尔斯卡娅、兹伏雷金娜、诺维珂娃，我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我读了很多书，我父亲的书房里有许多藏书，是母亲生前开始收集的，这些书除了我之外，谁也没有用过。我的保姆生性愉快、善良、温柔、幽默，她用她那真挚的爱使我仿佛置身于“气垫”之中，保护我免受外界的干扰，不叫我懂得周围发生的一切事变。直到上大学之前我都生活在温室中，似乎是置身于古堡的高墙之内，在我和保姆两间房里我生活在她所创造的特殊的氛围之中，我在我的桌上

---

① 俄罗斯民间用的一种炉，用砖砌成，前面的炉火可以做饭，烤面包，后面是一个高高的炕，上面可以睡人，十分温暖。但是，这种炕和中国北方的炕不同，很高，面积较小。

学习，她在她的台前缝补和读书。这里很安静，我们两人都不知道我们周围的一切是如何已被打得粉碎。

我的保姆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里保存了母亲生前安排的学习、上课、户外保健休息等环境。她保护了我的童年，现在我是多么感激她！多么思念她啊！

在欧洲战争开始以前，父亲几乎每天都在家里，和他的同志们一起吃午饭；夏天我们就一起去索契。那时我们常常见面，可以说，正是这些年，他留在我记忆中的是他对我的爱，他想成为慈父 把我教养成人……随着战争的爆发，这一切都成了泡影。当我年纪大了一些，我们之间发生了摩擦和分歧。然而那些年月，父亲深情地爱我，我也同样爱他。像父亲深信的那样，我很像他的母亲，这触动了他的心。

我的保姆教育我要绝对听父亲的话，一心一意地爱父亲——这是她的基督教的不可动摇的金科玉律，不管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

父亲回家吃饭的时候，从过厅经过我的房间 总是还没有脱大衣就大声叫道：“小主人！”我马上丢下功课跑进餐厅到他身旁去。餐厅是一个大房间，四面靠墙都是书橱，还摆着一个古老的大酒柜，上面放着妈妈购置的茶杯。在放新报纸、杂志的小桌上，挂着妈妈的大照片，是一张放大的家里自己照的照片。餐桌一般都摆着八份餐具，我就在父亲右侧的我的餐具前就坐。这大约总在晚上七点钟左右的时候。通常我都坐两小时，听着大人们说话。以后父亲就问我得了多少分。因为那时我的分数是全优，父亲为此感到骄傲，大家也都齐声

夸奖我，以后就送我去睡觉。

他是在孔策沃别墅过夜的。当他深夜离开时，穿上大衣以后，有时还要到我房里来一次，吻吻已经睡着了的女儿，和我告别。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时，他喜欢吻我，我永不会忘记他对我的温存。这是纯属格鲁吉亚式的对孩子的热爱和温存。

这年月父亲也常带我去看戏和看电影。我们常去艺术剧院、小剧院、大剧院、瓦赫唐戈夫剧院<sup>①</sup>。那个时期，我看过：《火热的心》、《叶戈尔·布雷乔夫》、《柳波芙·雅罗娃娅》、《普拉东·克列乔特》；听过歌剧《鲍里斯·戈东诺夫》、《萨得科》、《苏萨宁》等等。战争开始前，父亲常去戏院，一去就是许多人，我总是坐在包厢前排的软椅上，父亲老是坐在远远的一个角里。

可是最好看的是电影。这时在克里姆林宫里面原冬季花园的地方修建了一座新电影厅；从这里有个过厅通往旧宫。午饭后，也就是晚上九点我们去看电影。当然这对我是太晚了，于是我就死活恳求要去，以至于父亲无法拒绝我，总是把我拉到面前大笑着说：“好吧，领我们走吧，领我们走吧！小主人，没有人带路我们会走错的！”于是我就走在这大队人马的前面，朝着那一个人也没有的克里姆林宫的另一端走去。我们后面，一队装甲的专用汽车慢慢地爬行，再后面是无数的警卫人员……

---

① 位于红场，专门上演奥斯特罗夫斯基剧目的戏院。

通常要看两部或更多的片子，看完电影是夜里两点钟，被送回家去睡觉，因为我早晨七点钟就得起床，然后上学去。

我的家庭女教师丽吉娅非常生气，要求我拒绝在那么晚的时候去看电影；难道我可能拒绝吗？有多少好片子在克里姆林宫的小银幕上首次放映呀！《夏伯阳》、《马克辛三部曲》、《彼得大帝》、《马戏团》和《伏尔加啊！伏尔加！》等苏联最优秀影片的第一个镜头都是在克里姆林宫的电影厅出现的。

开始时兹·舒缅茨基给政府“送”片子，不久以后是杜克尔斯基，以后很长时间都是依·格·波尔沙科夫做这项工作。

在战前时期还没有批评电影和强迫改拍的作法。一般的情况是大家看看，也就批准，于是影片就可以上映了。如果不完全合乎口味，不怎么喜欢，也不影响片和编剧的命运。几乎每部新片子都要受到“斥责”只是在战后才成了司空见惯的事。

我看完电影总是很晚，在旷无一人的静悄悄的克里姆林宫里飞快地跑回家。第二天跑去上学时，满脑子都是电影里的人物。我父亲认为看电影比坐在家里有益处。更确切些说，他并没有想什么对我有益处，不过和我在一起去看电影他觉得愉快，因为我可以给他解闷，使他头脑得到休息，给他安慰。

夏天，当我们学校结业后，他常把我带到孔策沃住两三天。他喜欢我在他身边。但是，这是很枯燥无趣的，因为适应他的生活习惯十分困难：他午后二时吃早餐，晚八时吃午饭，一直吃到夜深。这对我来说很不习惯，也陪不起。非常愉快的事是我们一起在林中或花园里散步；他问我林中花草的名字，

这些知识是保姆教我的；他还问我林中叫着的是什么鸟等等。……然后他就坐在一块阴凉处看他的文件和报纸，这时我已经不被他需要了。因此我总是烦闷，觉得寂寞，想回祖巴洛沃，那里有许多我习惯的消遣，可以请同学来玩。父亲觉察到我在他身边感到寂寞，很不高兴。有一次为此事闹了很长时间的别扭。我问他：“我现在可以回去了吗？”他非常生硬地说：“走好啦！”从此不和我说话，也不给我打电话。后来多亏我那英明的保姆教我去“请求原谅”，这才和我和解了。他生气地吵着说：“走啦！把我这老头子丢下了！她寂寞了！啊！？”但是他吻了我，原谅了我，因为没有我他会更觉得寂寞。

有时他突然来到祖巴洛沃看我们，这里虽然已经门可罗雀，面目全非了，但对我们大家则是无比亲切的。这时我们大家一起到林中去玩，外祖父和外祖母也都慢吞吞地从他们的房里出来，有时还打电话到祖巴洛沃二村，赶快把巴维尔舅舅和孩子以及阿·伊·米高扬叫来。在林子里升起火堆烤羊肉串，就地摆好桌子，大家一边喝着上等的烈度不大的格鲁吉亚美酒。父亲总是让我跑到饲养场去捡野鸡蛋和珍珠鸡蛋；这是在树丛下的小坑里很容易找到的，大家就在篝火的热灰里烧蛋吃。孩子们在野餐时总是高兴得不得了，但我不知道大人们是否也高兴……有一次野餐时外祖母大哭起来，父亲很生气，气呼呼地走了。大人们有太多的理由相互不满和气愤。

外祖父遇事设法使大家和解，平息风波；外祖母则相反，总要把事情说得一清二楚，水落石出。——那天父亲走后，他

们两人相互埋怨了老半天。

祖巴洛沃眼看着变了样子……房子油漆一新，两大株老丁香树被挖出来运走了，原来这两株丁香树就在花厅旁鲜花怒放，宛如两个芳香四溢的大草垛。以后，不知为什么，又把老稠李<sup>①</sup>树也砍了，似乎因为这些树生虫子，祸害旁边的菜园。接着，我们那些美好的压得平平整整的砂石小路都浇上了讨厌的灰色的沥青。

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大总管们干的（我们叫他们警卫长）。他们个个都特别卖劲，全力以赴地模仿孔策沃父亲别墅做的每件事。忽然父亲那里栽云杉了，祖巴洛沃就乱作一团，到处都插上了小云杉……可是这里的土地是干燥的砂土，所以云杉很快就都干死了。我们高兴得了不得！

公家的“服务人员”完全不把我们看在眼里，就像我们根本就不存在。一般情况，这些人都是轮换的，所以我们也来不及熟悉他们，他们同样没有机会熟悉我们。他们觉得既然“主人”不和家人住在一起，而且看来也不怎么疼爱他的家眷，那么“服务人员”也只有如法炮制。

外祖母有时为此闹一点小脾气，因此他们最不喜欢她。后来外祖父常常骂她，给她解释，说她“不懂得形势”。于是外祖母大喊起来，说：“是的！我什么时候也学不会懂得这个形势！”于是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嘟嘟囔囔地骂那些玩忽职守的“二流子”。

---

① 一种野生树木，生有小黑果，味涩而香甜，可制药酒、蜜酒，果子晒干可做点心馅，苏联和我国东北盛产。



有一次外祖母和外祖父拌嘴，她突然对着我大喊起来说：“你妈妈就是个傻瓜！是个傻瓜！我对她说过多少次：她是傻瓜，不听我的话！好吧，得了报应了吧！”我听了大哭起来，也对她喊道：“你自己才是傻瓜！”说完跑到保姆那里要她保护我。我记得我的妈妈，珍惜她留给我的回忆，我十六岁以前，大人告诉我她是患阑尾炎死的，我一点忍受不了有人说她任何坏话。

妈妈死后，祖巴洛沃发生了她生前从来没有过的事——亲戚之间常有争吵……费加舅舅有时也住在这里。我哥哥雅沙和他的妻子也搬到祖巴洛沃来住；费加舅舅和雅沙两人变得仇人一般。雅沙又常和瓦西利吵架。同胞兄弟竟是如此不同，以至于在任何问题上都找不到共同的语言。……雅沙的妻子又和外祖父、外祖母成了冤家；本来外祖父、外祖母之间早已闹个不休了。以后巴维尔舅舅的寡妻（她从1939年开始孀居）也来了，她那尖刻的嘴也很厉害，更是火上浇油……我们孩子们就在他们中间转来转去，一下子站在这一边，一下子站在那一边，究竟为了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的保姆是个和事佬，她善于和所有的人都保持十分良好的关系，所以调整关系的外交使命就落在她身上了。

敌对的双方都想得到父亲的支持。这时总是打发我去：“去告诉爸爸去！……”我就去找爸爸，结果总是受到申斥说：“你为什么重复别人告诉你的话，像个传声筒一样！”他很生气，要求我不要为别人的事找他……他要求我不要给别人转信，不许当“邮箱”，我们学校里有时有人托我给他带信。

不，这已经不是原来的祖巴洛沃了……往日的精神和环境已经完全变了。

夏天父亲去索契，打发我和保姆或去克里米亚，或去穆霍拉特卡，或者也带我们同去索契。我手上还保存着父亲从索契寄出，或寄往索契和克里米亚的许多信。下面就是当年一些信件的片断：

你好！我的小麻雀！

我没有立即回信，请不要生我的气。我非常忙。近况甚佳，感觉良好。热烈地吻我的小麻雀。

亲爱的谢坦卡！

你九月二十五日信收到。谢谢你没有忘记你的好爸爸。我过得不坏，身体健康，你不在，我很想念你。你收到石榴和桃子了吗？如果再给我一个命令，我就再带给你一些。告诉瓦夏叫他给我写信。好，再见。热烈地吻你。你的好爸爸。

谢谢你的信，我的小谢坦卡！

带给你的桃子，50个给你，50个给瓦夏。如果还需要桃子和其它水果，请来信，我带给你。亲你。

(1934年9月8日)

小女主人！收到你的信和明信片。你没有忘记好爸爸这很好。带给你一点石榴苹果。过几天给你带桔子。吃吧！高高兴兴地吃吧！……什么东西也不给瓦夏带，因为他学习得不好。这里天气很好。因为小主人不和我在一起，有点寂寞。好！再见，我的小主人。热烈地吻你……

(1935年10月8日)

谢坦卡和瓦夏！

带给你们一些甜食，是我妈妈，也就是你们的祖母从梯比里斯捎来的。你们两人一人一半，别打架。你们愿意招待谁就招待谁……

(1935 年 4 月 18 日)

你好，小主人！

捎给你一些石榴、桔子和蜜饯水果。吃吧，高高兴兴地吃吧，我的小主人！不给瓦夏带什么，因为他学习得一直很坏，而且只对我空口许愿。你讲给瓦夏听，说我不信他的空口许愿，等他用实际行动证明，那怕是学习分数得“良”，我才能信任他。小主人同志，向你汇报：我到梯比里斯去了一天，住在我妈妈家，并替你和瓦夏向她问好。她还算健康，她热烈地亲你和瓦夏。好，就写到这里。亲你。很快会见面了。

(1935 年 10 月 13 日)

你好，我的小主人！

来信收到，谢谢！我很健康，生活得很好。瓦夏扁桃体发过炎，现在已经好了。你问我去不去南方？我本想去，可是没有你的命令我不敢动地方。我常去里甫基。这里很热。你在克里米亚好吗？亲我的小麻雀……

你好，我的小麻雀！

信收到，谢谢你送我的鱼。只是，我的小主人，以后不要给我送鱼来。如果你那么喜欢克里米亚，整个夏天你就住在穆霍拉特卡吧！重重地吻你。你的好爸爸。

(1938 年 7 月 7 日)

向我的小主人致敬，谢坦卡！

你的信全收到了，谢谢你的来信！没有给你回信，是因为太忙。你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你的英文学得好吗？身体好吗？我和往常一样，健康而愉快。你不在，很想你，可是没有办法，只有忍受着。亲我的小主人。

(1939年7月22日)

你好，我的小主人！

两封信都收到了。你没有忘记好爸爸，这很好。我没能马上回信，因为太忙。

听说你去过利察，而且不是一个人去的，是和你的骑士一起去的。这很不错啊。利察是个好地方，如果有骑士相陪就更好，我的小麻雀……

你什么时候想回莫斯科？是否该回来了？我想到时候了。请你八月二十五日以前，或八月二十日以前回莫斯科。你怎么想呢？写信告我。我今年不去南方了。我太忙，离不开。你问我的健康吗？我很健康，很愉快。你不在我有一点点寂寞，不过你很快就要回来了。

亲你，我的小麻雀，重重地亲你。

(1939年8月8日)

父亲在给我的信上的签署都是一样的：“小主人谢坦卡的好秘书可怜的约·斯大林。”应该说明一下，这是父亲想出来的一种游戏。他叫我“女主人”，把他自己和几乎每天都来我家的同志称为“秘书”或“好秘书”。我不知道这个游戏对其他人是否是一种消遣，但是父亲直到战争开始前，一直觉得好

玩。模仿他的幽默的调子，我常给他下达类似下面的命令（形式也是父亲想出来的）：

1934年10月21日

致约·斯大林同志

第一号秘书

#### 第四号命令

命令你带我去。

签字：女主人谢坦卡

印章

第一号秘书签字：服从命令。

约·斯大林

看起来这是因为不带我去看电影或看戏，我请求带我去。有时还有这样的话：“命令你允许我明天去祖巴洛沃。”——1934年5月10日。或者：“命令你带我到剧院去。”——1934年4月5日。或者：“命令你允许我去看电影，叫他们演《夏伯阳》和一部美国喜剧片。”——1934年10月28日。

父亲就在“命令”下面签上：“服从”，“遵命”，“同意”，“执行命令”等字样。

因为父亲总是要求我写新的“命令”，我有点厌烦了，有一次我是这样写的：“命令你允许我每六天写一次命令。”——1937年2月26日。

以后稍长大了些，我的要求也就多种多样了：

“爸爸！因为今天很冷，命令你穿上皮大衣。女主人谢坦卡。”——1938年12月5日。

以后，当我久等也等不到晚归的父亲时，我就在他文具旁留下一封信：

我的亲爱的好爸爸！

我又用久经考验的老办法，给你写信，因为我等不着你回来。

你可以吃午饭，可以喝一点点酒，可以谈话。

你回来得太晚，秘书同志，使我不能不给你警告处分。

最后，我重重地亲我的好爸爸，并希望他早点回来。

女主人谢坦卡

在1940年10月11日写的这封信上，父亲写了几个字：“致我的小麻雀。已十分满意地读过你的信。好爸爸。”

最后一封这样开玩笑的信是1941年5月战争前夕写的：

我的亲爱的好秘书，我忙于通知你：你的女主人写的作文得了“优”。可以说第一场考试已通过，明天将通过第二场考试。请为你的健康尽兴吃吧！喝吧！亲我的好爸爸一千次。  
问候其他秘书。

女主人

于是信的上端有个“决议”：“祝贺我们的女主人！代表你的好秘书们——好爸爸约·斯大林。”

不久就爆发了战争，游戏，开玩笑，什么也顾不上了。我的这个“女主人谢坦卡”的外号还一直保存了很久，等我已长大成人，那些曾经参加过这个游戏的人还常常叫我“女主人”，并回忆起那些童年的“命令”。

战争开始时，我已经十五岁了。1941年秋天我被送到古比雪夫，我应该在那里读完九年级。1942—1943这两年发生的一些事情，使我和父亲永远分开了——我们彼此的关系疏远起来。但是他对我的爱抚、疼爱和我童年的温柔，我永远也

不会忘记。他很少对什么人像对我这样温存体贴。当然，在一个时期里他也很爱妈妈。此外，他还非常爱他的母亲，尊敬她。

他说祖母是一个很聪明的女人。他指的是她的精神品德，不是指的她所受的教育，因为祖母只能马马虎虎写她自己的名字。父亲有时讲给我听，他小的时候，祖母是怎样打过他，他那爱喝酒的父亲<sup>①</sup>又如何常揍他。大概她的性格坚强而严厉，这使父亲十分钦佩。她年轻守寡，变得更加严肃。她有过许多孩子，但都已早丧，只活下来父亲一个人。

她虔诚地信仰上帝，很想让儿子做一个牧师。她一直到死都信奉宗教，在她去世前不久父亲去看她的时候，还对父亲说：“多可惜，你没能成为一个牧师”……父亲赞叹地重复她的这句话；欣赏祖母对他所取得人间盛誉及对尘凡利禄所持的轻蔑态度。

父亲和母亲一直请她来，可是她不愿意离开格鲁吉亚到莫斯科来。首都生活方式是她所不需要的，她继续过着她那安静的、简朴的、一个普通的信神的老太婆的生活。1936年，她在八十岁上去世。父亲十分悲伤，以后他常常谈起祖母。

但是，他是一个不善于体贴的坏儿子，就像他是这样的父亲和丈夫一样……他的全部心身、存在都已献给其它的一切——政治、斗争，因此外人比起亲人来更重要，更有意义。

一般来说，父亲不常教训我，也不令人烦厌地挑剔这，看不上那。他的家教是最一般的：要学习好，多到户外去呼吸

---

① 他的父亲在一次酒后斗殴中被人用刀子刺死。

新鲜空气，不准奢侈，不许娇生惯养。有时他对待我也有些很任性，很怪的地方。有一次在索契，我十岁的时候，父亲看了我一眼（我是个长得“很大的孩子”），突然对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光着身子到处跑？”我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瞧，瞧！”父亲是说我的连衣裙太短，我穿了一件膝盖以上的短裙，这是正合我年龄的尺寸。“鬼知道这是什么！”父亲已经生气了——“这又是什么？”我的儿童短裤也惹他不高兴了，他更生气地说：“不像话！是女运动员啊！”他非常不高兴地说：“都光着身子啦。”然后，他去自己的房里拿出两件他自己的细纱内衣，对我说：“我们走！”于是他又对我的保姆说：“把这拿去，请您自己给她缝两条灯笼裤，把膝盖遮上，连衣裙要过膝！”我的保姆的脸上没有一点惊异，她一生从来不和主人争论，于是坚决地回答道：“是的，是！”可是我恳求起父亲来，我说：“爸爸！现在谁也不穿这样的衣服！”

他这样做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然而却给我做了一条其丑无比的灯笼裤和一件过膝的连衣裙，我见父亲时就穿上。以后我慢慢地把衣服改短，他也没有发现，因为他已经完全顾不上这些事了。于是我不久又恢复了旧装。

然而他不止一次挑我衣着的毛病，使我也哭了不止一次：一会儿，忽然骂我为什么夏天穿短袜，不穿长袜，说：“又光着腿跑来跑去！”一会儿又不许我穿紧腰的衣服，非得穿宽大的筒式连衣裙不可；一会儿又一把从我头上抓下我的法国小帽，说：“这是张什么面饼？你就不能买一顶好点的帽子戴上？”不管我向他解释多少遍，说所有的女孩子都戴法国小帽，他就



是不听，一直要等到这件事在他心上已成为过去，或者忘记为止。

后来，亚力山得拉·尼古拉耶芙娜·纳卡什泽告诉我：在格鲁吉亚，年老的人都见不得短衣服、短袖和短袜。

直至我已长大之后，每次去见父亲，我都总要想想，衣服的颜色是否太鲜艳，否则一定会给我提意见。有时他不管有没有外人在场，都会说：“这像什么样子？！”也许使他生气的是我从外形上不像妈妈，我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都是“运动员型”的难看的未成年人的样子。在我的外貌，在我的身上，有什么他觉得不够的地方，缺少些什么。然而以后不久，连我的内心世界也开始使他烦恼了。

战争开始以后，就连这样的很少的会面也都终止了，我们之间完全疏远起来。战后我们也没能够重新接近。我长大成人了，曾是他的消遣的我的童年的嬉戏和欢乐，都已成为遥远的往事了。

## 14

1941年战争爆发后，我大哥雅沙六月二十三日就和他们学院\*的应届毕业生一起随着一个炮兵中队开赴前线。他们刚刚毕业就赶上战争开始。

他没有企图利用那管是最微小的可能性去逃避危险，那管是不去那战争最激烈的地方（白俄罗斯），或者去后方的什么地方，或者留在司令部的某个单位。他的整个性格，他的诚实、正派和严肃的生活方式，排除了任何类似的行为，再加上他无端地受到父亲的冷遇（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由于这一切，高级军事首长中没有人给他提供什么荫庇，他们知道这样做只会招来父亲的盛怒。

我不知道雅沙为什么要做职业军人。他是个性格非常平和的人，为人温顺，有些慢吞吞的，十分安静，但是内心刚毅，有坚强的信念。他的一双杏仁般的、高加索式的、眼角稍长的眼睛长得像父亲，其它就什么都不像了……他更像他的母亲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雅沙两岁时母亲去世的。看照片觉得

---

\*莫斯科伏龙芝炮兵学院。

母子特别相像。看来他的性格也是从母亲那里来的：他没有野心，不爱权势，不生硬粗暴，善于克制。他的气质中没有相互矛盾的东西，没有相互抵触的企求，他并非才华横溢的人，但很谦虚、朴素，勤勤恳恳，工作能力很强，他的沉静性格具有一种魅力。

我只见到过两三次他大发脾气；他有时也会发脾气，因为他心中有火一般的热情。他生气都是为了瓦西利，是因为他当着我的面，当着女人的面，或者有别人在场时说下流话。雅沙最听不得这些，于是像一头狮子似的扑向瓦西利，他们就交起手来。

雅沙在梯比里斯度过很长的岁月。他是他的姨妈（他妈妈的姐姐）亚力山得拉·谢苗诺芙娜教养大的。当他已经是个少年的时候，由于阿廖沙·斯瓦尼泽舅舅的坚持，来到莫斯科上学。父亲很不欢迎他，可是妈妈设法照顾他。总的来说，和我们一起住在克里姆林宫的家里，上课用俄语，开始他说和写俄语都困难，这环境对他完全不适合。如果他留在格鲁吉亚，大约会像他的表兄弟一样，能够生活得好得多，安静得多。

雅沙在父亲身旁总感到自己好像是一个继子，相反，在母亲面前并无这种感觉，他很爱我的母亲。他的第一次结婚给他带来一场悲剧。父亲对他的这一婚姻连听都不要听，也不想帮助他。父亲简直是独断专行不近情理。有一天夜里雅沙在他住的那个小房间隔壁的厨房里开枪自杀，子弹打穿了自己，因此病了很久。为此父亲对他更坏了，这些我已经写过。这都是后来我保姆告诉我的。

伤愈后，他去列宁格勒，住在我外祖父谢尔盖·阿利卢耶夫房子里。后来，他们有了一个小女孩，雅可夫很爱她，不过她不久就死了。他们的婚姻不久也破裂了。这时雅可夫在列宁格勒热力电力中心工作，他是个电气工程师。他本应该从事这种和平的职业。

1935年雅可夫来莫斯科进了炮兵军事学院。大约过了一年，他就和一位被丈夫遗弃的长得很好看的女人结了婚。他的妻子尤莉娅是个犹太人，这又引起了父亲的不满。说实在的，在这些年月父亲对犹太人的仇恨，还不是那么明显；明显的仇视犹太人是后来的事。但在他的心里，对犹太人从来没有过什么好感。

可是雅沙态度十分坚决。他很清楚尤莉娅的缺点，然而当人们批评她这些缺点时，他对妻子的态度真像骑士一般。……他热爱尤莉娅，也喜欢他的小女儿加洛契卡（她是1938年出世的）。雅可夫是个好丈夫和好父亲，因此没有理睬我父亲对他婚姻的不满。

他有时也来克里姆林宫的家看我们，他总是和我玩，看我做功课，并且紧张地等待父亲回来吃午饭。吃饭时，他总是一声不响。雅沙从来尊敬父亲，尊重父亲的意见。他按照父亲的愿望做了军人。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从思想上说让他们两人接近是不可能的。有一次雅沙对我说过：“父亲说的都是各种命题和纲领。”<sup>①</sup>雅沙的沉静和温和使父亲生气，

---

① 指斯大林在家中不说家常话，遇事也不耐心解释和说服，只从政治上简单地谈上一句两句，孩子们得不到他的体贴和温暖。

因为他自己性子急，行动果断，甚至直到老年都是如此。

战前，雅沙和他的家人每年夏天都和我们一同住在祖巴洛沃，春天我们一块儿各自准备自己的考试。我们有个浴室，那里有个宽敞的阁楼，是挂浴用干桦树小扫帚<sup>①</sup>的地方。这里干爽，发散着干草的香气，我们就把地毯拖来铺好，在这里一块儿做作业和学习。

战争开始那年雅沙三十三岁，我十五岁，我们刚刚开始成为真正的朋友。我非常喜欢他那平稳、温顺和沉静性格。他从来爱我，和我玩，可是现在我带着他的女儿玩耍了……

如果不是战争，我们将会是最好的朋友，终身不渝的朋友。

战争爆发的第二天雅沙就上前线了；我们是在电话上告别的，当时他不可能来和我们见一面。他们的部队正好开赴当时最混乱的战场，即白俄罗斯西部巴拉诺维奇地区，很快他就消息不明了。

尤莉娅和加洛契卡就住在我们家里。战争刚开始的几个月，谁也不十分清楚应该怎么办，连我父亲都是如此。不知是什么原故，我们一家人——外祖父、外祖母、安娜·谢尔盖耶芙娜和她的两个儿子、尤莉娅和加洛契卡、以及我和保姆都被送到索契。八月份我从索契和父亲通了一次电话。当时尤莉娅就站在我身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脸。我问父亲，为什么雅沙没有消息，他慢慢地，清清楚楚地答道：“雅沙被俘了”。

---

① 俄罗斯蒸汽浴用的桦树枝做的小扫帚，用过后要放在通风处吹干，以便再用。

可是在我还没有来得及开口以前，他又补充了一句：“不要对他的妻子说，暂时还不要……”尤莉娅从我的脸上看得很清楚，好像出了什么使大家震动的事，我一放下听筒她就逼问我出了什么事，可是我一再说明，“他自己也什么都不清楚”。……这个消息对我是如此可怕，使我没有力量告诉尤莉娅，让别人去对她说吧。

但是指导父亲的思想决非对尤莉娅的人道主义的考虑。他脑子里出现了一个想法，认为雅沙被俘问题不简单，一定是有人蓄意“出卖”或者是“设了圈套”，是否尤莉娅与此有牵连呢？……当我们九月前回莫斯科时，他对我说：“雅沙的小女儿就暂时由你管……他的妻子看来不是个好人，必须弄清楚……”

于是尤莉娅于1941年秋天在莫斯科被捕，坐牢一直坐到1943年春天。这时“已查清”雅沙的不幸被俘和她没有任何关系。此外，雅沙被俘后的表现最后说服了父亲，雅沙并非主动投降的。

1941年秋天敌人在莫斯科撒了许多传单，上面印着雅沙的照片，他身穿军服，没有束皮带，没有肩章，又黑又瘦，这些传单是瓦西利拿回家来的，我们看了又看，希望是假的，可是不假，我们不能不承认这就是雅沙。

过了许多年，那些被俘的人们返回故里，但是从俘虏营出来，就又去我们自己的集中营，去原始大森林，去北方……他们许多人听到过雅沙被俘的事，因为德国人曾经想利用这件事达到他们的宣传目的。然而大家都知道，他的表现无愧于

一个男子汉，是值得尊敬的，他拒绝了敌人的一切阴谋，因此而遭到残酷的虐待。

1943—1944年的冬天，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在一次难得的会面时，父亲突然告诉我说：“德国人想用雅沙换他们自己的人……我才不和他们作交易呢！不，战争就是战争。”从他说话的声音可以看出他心情是不安的。关于这件事他一个字也没有再说下去，只塞了一份英文的材料在我手里，这是他和罗斯福的通信，一边说：“来，译出来！你学了那么久的英文，能翻译吗？”我译了出来，他又惊异，又满意。此刻，我们会见的的时间已经结束，因为他再没有时间了。

后来，1945年夏天，战争胜利后，他又一次和我提起雅沙。自从上次会面后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父亲了。“德国人把雅沙处决了。我收到一位比利时军官的一封信，他是个什么王子，是亲眼见到处决的人……他们都是美国人释放出来的……”他的心情沉重，不愿意多提这一话题。

我父亲原来的管家瓦莲琴娜·瓦西利耶芙娜·依斯托明娜（瓦列契卡）后来曾告诉我，说伏罗希罗夫在战争临近结束时，在德国的一个前线也听到了雅沙的死讯。他不知道如何去告诉父亲，他非常难过，因为大家都爱雅沙。这样说来，我们从两个不同的来源得知了这一消息\*。

雅沙死后，父亲大概对他有了些感情，也觉得自己对雅沙很不公平，但是，已经太晚了……雅沙度过了四年俘虏的生

---

\* 很难说他们的消息是可靠的，我觉得雅可夫之死至今仍然是个谜。

活，这对他来说比起别人更为可怕……他是个沉默寡言的英雄，他的英雄事迹也是默默无闻，真诚和无私，他的一生无不如此。

不久前，我在一本法国杂志上见到一篇苏格兰军官写的文章，他自称是雅沙之死的目击者。对这类文章要谨慎对待，因为在西方，有关我父亲及其家庭成员“私生活”的报道假话太多。在这篇文章里有两点好像是真实的：一点是里面登的一张雅沙的照片，他十分消瘦，憔悴不堪，穿了一件士兵的军大衣，这肯定不是假的；另外是作者引用的一个事实：当记者正式询问父亲是否知道他的儿子已经被俘时，他给与了否定的回答。这就是说，他假装不知此事，换言之，他用自己的答复把雅沙的命运推出不管了……这非常像我父亲的作法，因为他可以拒绝自己的家人，忘却他们，好像他们不存在一样……不过，我们对待所有的战俘也都是这样。

无论如何，雅沙的一生是真诚和正派的。他一向谦逊，任何人提到他是什么人的儿子，他都非常厌恶……他一贯真诚地拒绝任何由于他的家庭关系而可以得到的特权，所以他也从来并没有过什么特权。

后来有人企图把他作为英雄人物，为之树碑立传。父亲自己对我说过，米哈伊尔·契阿乌列里曾要上演一出木偶戏“史诗”——《攻克柏林》，他曾和父亲商量过：他想在剧中把雅沙写成一位战斗英雄。大艺术投机商契阿乌列里嗅到一种味道，他觉得从这一悲剧性的命运里可以构思出某一“主题”……可是父亲没有同意。我想父亲这样做是对的。契阿乌列



里一定把雅沙变成一个虚假的木偶，像他所创造的其它木偶一样。他所以需要这一“主题”，完全是为了吹捧我父亲，这是他在他的艺术中一向拚命追求的东西。感谢上帝，雅沙没有以这种形象在舞台上出现。

在拒绝契阿乌列里时，难说父亲是否想到了这些，他不过是不愿意突出自己的亲人，他认为这些人毫无例外都是不值得纪念的。

雅沙是值得我们以感激的心情去怀念的；在我们的时代，做一个真诚的、正派的人，难道不也是一种功绩吗？



战争爆发后，唤醒了一切人的共同感情，在共同的危险面前，一切意见分歧都退居次要地位。就是我们这个支离破碎的家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一开始，外祖母、外祖父、加洛契卡（雅沙的女儿）和她妈妈、安娜·谢尔盖耶芙娜和孩子、我和保姆都被送到索契。1941年9月前我们回到莫斯科，看到巴仁诺夫修建的兵器馆<sup>①</sup>的一角已被炸塌，正好对着我们的窗子。在我们大楼前面正在紧急地进行政府成员防空洞的收尾工程，我家有直通防空洞的出入口。后来我曾经几次和父亲一起去过防空地下室。

一切都非常可怕，生活变得颠三倒四，支离破碎了。为了上学，又得离开莫斯科。我们学校中了炸弹，这也叫人吓得不得了。

以后又出人预料地把我们大家集合起来送到古比雪夫。

---

① 克里姆林宫的兵器馆是著名的军事博物馆。

费了很长时间把东西装进一个专门车厢……父亲离不离开莫斯科,谁都不知道,为了以防万一,他的图书也都装到车上了。

在古比雪夫的少先队大街给我们腾出一座花园洋房,有院子。这儿曾是一个博物馆。房子是匆忙修理粉刷过的,发散着油漆味,过道上老鼠的气味。我们家的一大帮“侍从们”都跟来了,有:亚力山得拉·尼古拉耶芙娜、纳卡什泽、厨师、餐厅服务员、警卫人员、我们的“保卫叔叔”米哈依尔·尼基奇契·克里莫夫和我的保姆。瓦西利第一个妻子,年轻的加丽娅也来了,她当时正在怀孕,1941年10月在古比雪夫生了一个儿子萨沙。总算勉强地都在这幢住宅里安排下了,当然也少不了外祖母和亚力山得拉·尼古拉耶芙娜发生争吵。只有外祖父愿意留在梯比里斯,于是他从索契直接去那里,他在梯比里斯过了两年好日子。

我们家挤得满满的。我当时上九年级,全家每天都收听新闻广播。1941年秋天是非常令人焦虑的。

1941年10月底我去莫斯科看望父亲。他没有给我写信,通电话也很困难,因为打电话时他总是急躁,生气,除了说没有功夫和我讲话外什么也不讲。

我十月二十八日到莫斯科,就在这一天,炸弹命中了大剧院、莫霍瓦雅大街上的莫斯科大学<sup>①</sup>和老广场上的中央办公大楼。父亲在克里姆林宫的防空地下室,我就去那里见他。这里的房间也都镶了木制墙裙,一张大桌子上放着文具,和他的

---

<sup>①</sup> 即老莫斯科大学,位于红场附近。

孔策沃别墅一样，家具也和孔策沃的完全一样。警卫长们引以骄傲的是他们维妙维肖地复制了勃利日尼别墅，认为这一定能取得父亲的欢心。到这里来的还是以前的那些人，不过现在都穿上了军装。大家心情都很紧张，因为据刚才报告，有一架敌人侦察机飞过莫斯科，到处投下了小型炸弹。

父亲根本没有注意我，我碍他的事。他的四周放着地图，墙上挂的也是地图，人们正在给他汇报各前线的情况。

最后，他发现了<sup>一</sup>我，好像应该和我说几句什么……“噢，你在那里怎么样？没有交个古比雪夫的朋友吗？”他不加思索地随便问了我一句。“没有，”——我回答道——“那里从外地疏散来的孩子很多，给我们专门组织了一个学校。”我这样说了，但是并没有想到对我的话会有什么反应。父亲突然抬起头来，迅速扫了我一眼，像往常有什么事触动了他的时候一样。“什么？专门的学校？”我已看出他逐渐地忿怒了。“你们这些人哪！”他在寻找比较不太难听的话，“你们啊，该诅咒的等级制度！好啊，政府、莫斯科的人来了，要给他们办专门的学校！伏拉西克这个坏蛋，这都是他一手办的事！……”他气得要命，只是因手上有紧急的工作待他处理，加以有外人在场才使他离开了这个话题。

是的，父亲是对的，确实来了一个特权阶层，首都的上层光临这个城市，为了安排这些过惯舒适生活的家庭的住处，把他们“挤”在省城的简单的不讲究的寓所里，我们把半个城市都占了。

讲等级制度已经为时太晚了，它已经产生了。现在，自

然要按照自己的等级制度的规律存在下去。

在古比雪夫，莫斯科人的得天独厚是一眼就看得出来的。在我们的“疏散”学校里，莫斯科显贵的孩子们齐集一堂，他们闹得如此可怕，以至于有些老师拒绝到课堂来上课。谢天谢地，我在那里只学习了一个冬天，转年六月我就回莫斯科了。

1941年11月和1942年1月我也从古比雪夫到莫斯科去过，每次呆上两三天去看父亲。每次去见他时，都和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一样，他非常忙，而且心情急躁，他绝对没有时间和我说点什么，尤其顾不上我们的愚蠢的家务事。

这一冬天我觉得孤独得可怕。也许是正好到了这样的年龄，此时我已经十六岁了，充满着梦想、寻求精神和疑虑，这是我以前所不了解的。在古比雪夫我开始去音乐厅听古典音乐，这是疏散到地方的交响乐团演出的。在这里首次演出了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乐。

在我们楼下靠厨房有一个长而暗的过厅，就在这里放电影，我们看过前线新闻纪录片，看过被围中的列宁格勒，秋天莫斯科城下之战等等……战争年代的这些纪录片，很多都是在战斗中，在战壕里，在迎面开过来的坦克下面的现场拍摄的，所以是永远难忘的。

瓦西利回来看儿子，住了不久。战争爆发前他刚刚从列彼茨克航空学校毕业，当时他曾驾驶战斗机飞行，可是这时已经是空军少校，任空军总监，这是一个直属父亲管辖的谁都弄不清的职务。他在奥勒尔呆了不长一段时间，以后他的总部

迁到莫斯科，在皮罗果夫大街的非常宽大的办公室内办公。在古比雪夫时，他身边围着许多我们不认识的飞行员，他们在年轻的首长面前卑躬屈膝，巧言令色。这时瓦西利刚刚满二十岁，以后他就被这种阿谀奉承毁掉了。在他周围没有一个能和他平起平坐的老朋友……这帮人极尽吹捧之能事，他们的妻子也来拜访加莉娅，来寻求她的友谊。

我们家里挤得要命，到处都乱七八糟，我们的头脑也是如此。没有人跟我说句知心话，没有人教我学点什么，没有人对我说过一句有头脑的、清醒的、诚实的话。

在这个冬天我发现一桩对我来说十分可怕的事情。这时，我出自对外国新闻报道的兴趣和学习语言的目的，开始阅读《生活》，《幸福》，《伦敦新闻》等英、美杂志。有一天我突然看到一篇写我父亲的文章，内中作为众所周知的旧闻提到一桩有关他的往事，文章写道：“他的妻子娜杰日达·谢尔盖耶芙娜·阿利卢耶娃于1932年11月8日夜里自杀身死。”我大为震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是非常可怕，我的心已经相信这个报道了。实际上，母亲的死是发生得非常突然的，出人不意的……于是我跑去找外祖母，对她说：“我什么都知道了，你们为什么瞒着我？”外祖母大吃一惊，她把当年的真实情况详详细细地告诉了我。然后她一次又一次重复地说：“这可是谁能想到啊！谁能想到她会做出这种事来？”

从这以后，我的心就无法安静。我回忆我所记得的一切事情。我想到我父亲，想到他的性格，也想到，说实在的，和他在一起是多么困难。我开始寻找母亲致死的原因；但是没有

一个人能给我解释清楚……安娜·谢尔盖耶芙娜和外祖母本来对妈妈就不怎么了解，加上以后又发生了许多新的不幸：巴维尔舅舅去世，雷登斯和斯瓦尼泽夫妇遇难，这些事件掩盖了他们的旧痛，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的旧痛也就减轻得多了。

可是我却坐卧不宁。我的心上有东西被摧毁了，也摧毁了我对父亲的意见、意志、每一句话的绝对服从……

和不久前尤莉亚被捕有关的一切，此刻我觉得都很奇怪。为什么父亲当时在电话中对我说“暂时还什么也不要告诉雅沙的妻子！”

我开始思考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难道我父亲就永远正确吗？这样想，在那个时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因为在我周围的一切人看来，对胜利的信念，对胜利的希望以及对结束战争的希望都是和父亲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可是父亲本人离我是那么遥远，难以置信的遥远……但是这些仅仅是我的疑虑的开始。

1941年秋天，古比雪夫给父亲准备了住处。大家都等候他的来临。修理了伏尔加河岸上的几处别墅，地下修了庞大的防空地下室。城里原州委办公大楼也腾了出来，准备给父亲用，也按莫斯科的样子，在那些空荡荡的房子里安排了桌椅和沙发。可是白白等了他一冬天。

最后，到了1942年6月，加莉亚带着孩子、亚力山得拉·尼古拉耶芙娜、保姆和我一同回到莫斯科。于是我决心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再也不离开莫斯科了。

在莫斯科使我们非常难过的是，这年秋天我们心爱的祖巴洛沃被炸毁了；德国人随时都会开进莫斯科。我们都去看过祖巴洛沃，那厚厚的古老墙壁已经成为残垣断壁耸立在那里，但是，正在修一所新的、比较简易的房子，样子完全不像那幢旧的，于是我觉得有什么东西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暂时都安顿在厢房里。十月我们搬进了刚刚修好的新居；这房子怪里怪气，为了“防空”刷成了深绿色。上帝知道，这幢房子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了，它已被弄得奇形怪状，塔尖被拆了一半，几处凉台也被拆的拆，改的改了。加莉娅和孩子、瓦西利、雅沙的女儿古莉娅和她的保姆，还有我和我的保姆就在这里住下了。

1942 年底 1943 年初这个冬天，祖巴洛沃的生活很不寻常，也很不愉快……一种狂欢暴饮、花天酒地的气氛撞进了这个家，这样的事是从来没有过的。瓦西利的宾客满堂，运动员、演员、他的朋友飞行员都云集祖巴洛沃，经常酗酒作乐，唱机不停地放着音乐。这里是歌舞升平，就好像根本没有发生战争似的。但是与此同时，又是非常的寂寞，找不到一个人可以与之认真地谈些什么，那管是谈谈世界上和我们国家发生了什么事，谈谈自己的思想……我们家从来都是寂寞的，我已习惯于闭门索居和孤独自处。但是如果说以前是寂寞而安静，那么现在是寂寞而喧嚣。

1942 年秋天丘吉尔访问了莫斯科。有一天亚力山得拉·纳卡什泽打电话告诉我，要我进城，因为晚上在我们家里宴请丘吉尔，所以父亲要我一定在家等着。我去到克里姆林宫，一直在盘算：是说几句英文合适呢，还是最好不讲话？



我们的寓所空荡荡，一点也不舒适。父亲的餐厅里，摆着空书橱，他的图书都已经运往古比雪夫。家里忙碌不堪，这时外交部来了电话，告诉我们如何接待外宾。

最后，客人们穿过过厅，进入餐厅，我也进去了。我父亲对客人十分殷勤周到。他的好客精神和亲切态度使全体客人为之倾倒。他说：“这是我的女儿！”然后用手摸着我的头，又说了一句：“红头发！”丘吉尔微笑地说：他年轻的时候也是红头发，可是现在成什么样了，说这话时他用雪茄碰了一下自己的头……以后他说：他的女儿在皇家空军服务。我听懂他的话，因为我有些拘束，没有说什么。和我的谈话结束了，话题转了航向——谈论大炮，飞机……他们的谈话，在翻译巴甫洛夫没有翻出之前，我几乎就全懂了。但是父亲没有允许我多听他们的讲话，他吻了我，对我说：我可以做自己的事去了。

为什么父亲要我见丘吉尔，我当时并不明白。可是现在我明白了：他想使自己多少像一个普通的人。他喜欢丘吉尔，这是看得很清楚的。

从十月开始，我开始在十年级读书了。老师们都是战前的老教师；以前的学生有一半不在了，来了许多不认识的新同学。学校很冷。可是莫斯科文学课优秀教师安娜·阿列克席耶芙娜·雅斯诺波尔斯卡娅的课温暖着我们的心的，增长我们的智慧。这一冬天我们的文学课大纲定得很广泛。开始我们学歌德和席勒，后来学契诃夫和高尔基，从唯美派到马雅可夫斯基、叶遂宁的诗，以及全部苏联文学。

那个时期，我曾生活在音乐、文学、绘画等艺术的世界里，

我刚刚开始对这个世界发生兴趣，在这方面安娜·阿列克席耶芙娜对我们讲了很多。那时我们都完全陶醉于诗歌和英雄业迹之中。

“事情是这样的！

战争、灾难、理想和青春

都一起来临，

这一切啊！

都深深藏进我的心，

岁月流逝啊！

它们方于心田中苏甦！”

达·萨莫依洛夫在他的一首美妙的诗篇《四十年代，苦难的岁月》中曾这样描写过那些时日。

1942 年底 1943 年初这个冬天，我认识了一个人，他名叫阿列克席·雅科夫列维奇·卡甫列尔，为了他，我和父亲的关系永远地破裂了。

阿列克席·雅科夫列维奇·卡甫列尔现住在莫斯科，在电影学院教书，培养年轻的专家，他写作电影剧本，带学习班，是公认的电影界的大师，一位老专家……他的生活，正像许多遭受命运打击之后的幸存者一样，经过十年流放和集中营囚禁之后，已经走上了正常的轨道。

1942—1943年初的冬天，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屈指可数的几小时；过了十一年，1955年在一起的时间也同样是屈指可数的几小时……仅此而已……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和一个中学女学生的昙花一现的相遇，再加上以后的短短的继续交往——难道这是值得提起和回忆的事吗？

1942年10月末瓦西利把卡甫列尔带到祖巴洛沃来。当时正计划创作一部新的描写飞行员的电影，瓦西利答应给他们当顾问。为此目的，瓦西利结识了罗·卡尔曼、米·斯路茨基、康·西蒙诺夫、伏·沃依切霍夫；可是，除了吃喝玩乐以外，工作似乎没有什么进展。最初，我和卡甫列尔彼此似乎都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后来我们被约请到格涅兹德尼科夫街去

看电影,这时我们第一次谈了一些电影的问题。

刘夏·卡甫列尔(人们这样称呼他)对于我对电影略有所知,感到惊奇。当他知道我不喜欢那些表演踢腿舞和大腿的红极一时的美国影片时,他很满意。当时他提议由他挑选几部优秀的影片到祖巴洛沃来放映,于是下次来时他就给我们带来了格丽泰·嘉宝主演的《克里斯蒂娜女皇》<sup>①</sup>。当时,这部片子使我深为感动,因此刘夏对我非常满意……

很快就是十月革命节。来了很多客人:有西蒙诺夫和谢洛娃,沃依切霍夫和采里科斯卡娅,卡尔曼和他的妻子尼娜(她是莫斯科出名的美人),飞行员,还有些什么人,记不得了。

欢乐的酒宴后就开始跳舞。刘夏犹豫地问我:“您会跳狐步舞吗?”……那天我穿的是家里请好裁缝给我做的第一件漂亮的衣服,衣襟上别上了我妈妈的旧物——一颗石榴石的别针,穿着平跟皮鞋。也许我很像一只可笑的雏鸡,可是刘夏说我跳舞跳得轻松自如;在他身边我觉得愉快,温暖和心情舒畅!我觉到自己对这个胖胖的,态度友好的人有一种非一般的信任,我突然想把头靠在他的胸前,闭上眼睛……

“您今天不愉快吗?”他问我,并没有去想我会有怎样的回答。这时我们踏着舞步,我开始向他倾吐一切,我告诉他我在家中很寂寞,和哥哥、亲戚在一起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告诉他今天是我母亲逝世十周年,但是已经没有人记得这个日子,也没有一个可以与之谈这件事情的人,等等。忽然这一切都从

---

① 《克里斯蒂娜女皇》是美国影片,在中国上映时,译为《琼宫恨史》或《瑞典女皇》。

我的心中涌了出来，新唱片一张接一张地换着，我们也一直跳着舞，没有人注意我们。

这天晚上，有一条坚韧的线把我们联结在一起，我们已经不是陌生的人，而是朋友了。刘夏听了非常吃惊，也深为感动。他具有和形形色色的人交往都能使人觉得轻松愉快，毫不拘束的才能。他很和善、愉快，对什么都有兴趣。但是同时他又有些孤独，好像也在寻求一个什么人的支持。

这时他刚从白俄罗斯游击区回来，在那里他收集了大量有趣的材料，准备写电影剧本。他住在不生火的萨沃依旅馆，他的许许多多的朋友，战地记者，都到那里去看他。

我们两个都不能克制自己，相互情牵意连。十月革命节后刘夏还可以在莫斯科停留几天，然后他就要出差去斯大林格勒。在这几天里我们设法尽可能多见面，可是处于我的那种生活方式，这是难以想象的困难的事。可是刘夏到我们学校来找我，他躲在学校旁边的大楼门口等着我出来。当我看到他在那里等着我，我的心高兴得都快要蹦出来了。……我们一起去那冰冷的，不生火的特列其雅科夫战时美术馆<sup>①</sup>观看战争题材作品展览。我们在那里久久徘徊，留连忘返，直到闭馆的铃声响了，没法再呆下去为止。以后我们就去剧院看戏。那时考涅楚克的《前线》刚刚上演，提起这个戏，刘夏对我说：“在这部作品中简直连艺术的影子也看不见。”我们看过《青

---

① 特列其雅科夫美术馆为苏联最大的美术馆，以收藏家特列其雅科夫命名。收藏俄国及苏联大量油画珍品，战时这些珍品都已疏散，故称为战时美术馆，用以展览战时题材的美术作品。

鸟》，以后又看了《黑桃皇后》。刘夏承认他完全不能忍受歌剧，但是我们十分喜欢在剧院璇厅散步。

在格涅德尼科夫街电影委员会的放映厅里，刘夏给我放映了狄斯耐的《白雪公主和七个矮人》和一部非常好的片子《青年林肯》。大厅里只有我们两人。

刘夏给我带来了海明威的《富人与穷人》，《钟为谁鸣》\*，阿尔廷顿的《四海之内皆敌人》等书。他还拿一些“大人”看的有关爱情的书给我看，他完全相信我能理解。我不知道那时我是否理解了这些书，但是直到现在我都很清楚，好像昨天刚读过似的……刘夏送给我很厚的一部《从象征主义至现代俄罗斯诗选》，在他心爱的诗篇旁边打上记号和小叉叉。从那时候起，我能背诵阿赫玛托娃、古米耶夫、霍达谢维奇等人的诗……这是一部多么好的诗选啊！这本书我长久地保存在家中，我简直随时都要看它。

我们在那满街白雪、漆黑一片的战时莫斯科街道上漫步，我们的话是永远说不完的……我那可怜的“保卫叔叔”克里莫夫就在我们后面远远地跟着，他被已形成的局面，弄得束手无策。刘夏和蔼地和他打招呼并且把香烟递给他，给他点火吸烟。我们也没有去理会“保卫叔叔”，因为他也不过是时而并无恶意地看我们一眼。

对我来说，当时刘夏是最聪明，最善良，最好的人。他焕发着知识的魅力和光辉。他给我打开了艺术的大门，这是我

---

\* 他给我的《钟为谁鸣》是俄译本，当时已经到处传阅，不知何故至今未见出版！

不熟悉的,没有探索过的世界。我理解、倾听和吮吸着他的话语,并在我心中引起共鸣。对此,他一直感到惊奇,而且认为这是极不寻常的。

刘夏不久就到斯大林格勒去了。这正是斯大林格勒会战的前夜。刘夏知道:他在那里所见到的一切,我都非常感兴趣,由于他的骑士风度和轻率从事,终于迈出了令人震惊的一步……在十一月末,有一天我打开《真理报》,看见了该报特约通讯员阿·卡甫列尔的一篇文章,题为《L 中尉寄自斯大林格勒的书信。第一封信》。往下看,就是某中尉写给他情人的信,描写举世瞩目的斯大林格勒所发生的一切。

看见这篇文章,我全身都冷了。我可以想象父亲翻开报纸的情景……问题在于,我的奇怪的,极其异常的行为已经有人向父亲“汇报”了。有一次他已经以十分不满意的口气向我暗示:我的行为是不能允许的。我没有理睬他的暗示,我的这种行为还在继续下去;毫无疑问,现在他一定会看这篇文章,这里一切都写得十分明白,连我们在特列其雅科夫美术馆的漫步都描写得那么准确。

文章最后一段写得更加要命:“现在,莫斯科大概正在下雪,从你的窗里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宫的雉堞”……天啊!现在可怎么办呀?

1943 年新年前夕,刘夏从斯大林格勒回到莫斯科。很快就见了面,我只恳求他一件事:不能再会面,不能再通电话。我已经感到,可能会闹出十分可怕的结局。他自己也弄得束手无策,他说这篇文章并没有寄给《真理报》,是他的“朋

友们捉弄了”他。看来，他自己也明白：我们引起了人们的危险的关注，于是他同意我们必须分手。

有两、三个星期，整个正月所剩下的时间，我们彼此没有通电话。这样我们反而彼此更加想念。过了十二年以后，当我们对证当时的情况时，刘夏告诉我，在这段时间里，他足不出户，两眼只盯着身边的电话。

最后，我自己首先忍不住了，给他打了电话。事情又重新开始了。我们每天在电话里谈天不下一小时。我们家里的人都快吓死了。

他们决定使刘夏头脑清醒些。伏拉西克将军的亲密助手和得力左右臂鲁缅采夫上校给刘夏打了电话。鲁缅采夫也是父亲警卫人员中的一个人物。当然这些人知道我们的事，他们甚至于知道我们之间没有的事……鲁缅采夫采取了外交手段，建议刘夏离开莫斯科，到较远的地方去出差……刘夏骂了他，叫他见鬼去，就挂上了电话听筒。

整个二月我们都一起去看电影，看戏，或者在一起散步。悬在我们头上的乌云越来越重，我们已经感到了这一点。二月最后一天是我的生日，我已经满十七岁了。我们想找个地方，在这一天安静地坐一会儿，可是怎么也想不出如何办才好。我们两人彼此都不能到对方的家里去，我们只能找个中立的地方。于是我们就到库尔斯克车站附近的一所空房子里去，这里是瓦西利的飞行员有时集会的地方。我们不是两个人单独去的，陪我们一起去的还有我的“保卫叔叔”克里莫夫；当他看见我放学后突然没有朝着通常回家的方向走，都快



要吓死了……这样，他就坐在隔壁的房间里，装成看报的样子，实际上，正在想方设法观察隔壁的房间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我们房间的门是大敞四开的。

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不能再谈心，我们站在一起默默地吻着。我们知道：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会面。刘夏已经明白：一切都不会有好结果，所以决定离开莫斯科。他准备去塔什干出差，他应该在那里拍一部他写的描写白俄罗斯游击队的影片——《她在保卫祖国》。我们一方面非常难过，同时心中又十分甜蜜。我们默默无言，彼此看着对方的眼睛，浸在亲吻之中。我们感到无限地幸福，虽然我们两人都泪流满面。

以后我就回家了，非常疲倦，非常伤心，已经预感到灾难快要降临。我的“保卫叔叔”跟在我后面，想到他自己会有什么下场，也吓得全身发抖。

刘夏回家去收拾东西，想过几天就离开莫斯科。三月一日那天塔尼亚·泰斯去看过他。十二年以后，塔尼亚和刘夏两人都告诉我：那天刘夏非常悲伤，心情沉重地坐在家里……第二天，1943年3月2日，当他已经准备好要走的时候，家中来了两个人，请他跟他们走一趟。他们一起到了梁宾卡监狱<sup>①</sup>。刘夏在这里看见了我们的鼎鼎有名的伏拉西克将军，他来亲自监看是否一切都遵命执行了。是的，一切都已照办无误……刘夏被搜了身，向他宣布：他已被捕。理由是和外

---

① 梁宾卡监狱是国家保安部系统的监狱，专门关押政治犯。

国人有关系。他确是不止一次出过国，在莫斯科他几乎认识所有的外国新闻记者。他不能否认这些。所以，要判处他任何罪名这些都是足够了。

可以想象，关于我，自然是一个字也没有提。这样刘夏就开始了另一种生活，这种生活，从这一天开始，过了长达十年之久。

三月三日早晨，当我准备去上学的时候，父亲突然回到家里，这是非常不寻常的事。他快步走进我的房里，我的保姆一看见他那眼神，就惊呆了，两只脚就像钉在屋角的地板上似的，一动也不能动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父亲这副样子。一般缄于言词，不动感情的父亲，这时已是怒不可遏，喘不过气来，他好不容易才说出一句话：“都在哪里？在哪里？”又接着说：“你的作家的那些信都在哪儿，在哪里？”

我无法描写他是用多么鄙视的口气说出“作家”这个词儿的。“我全都知道了！你们在电话里的谈话，都在这儿！”他用手拍他的衣袋，“来，拿出来！你的卡甫列尔是个英国间谍，他已经被捕了！”

我从我的桌子里拿出刘夏写给我的便条和他从斯大林格勒给我带回来的，上面有他签名的照片。他的笔记本，一些短篇小说的初稿，一部写肖斯塔科维奇的新的电影剧本都在我这里，还有我过生日那天他交给我的一封告别的长信，用以留念的。

“可是我爱他！”我说，最后我终于恢复了讲话的能力。“你爱！”父亲对这个“爱”字满腔仇恨，大喊了起来，于是有生

第一次打了我两个耳光。“保姆，您想想看，她到了什么地步了！”他再也克制不住自己，说：“现在仗打得这样，可是你却干出……！”他说了一些俚俗粗野的话，他再也找不出别的话来表示他的愤怒了。

“不，不，不。”我的保姆站在屋角里不断重复地说，摆动着她那只手，好像要驱赶什么可怕的东西。“不，不，不！”

“你‘不’什么，‘不’是什么意思？”父亲一句不让，虽然他打了我耳光之后，已经出了气，说话也平静了一些。“‘不’是什么意思？我全都知道了。”他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置我于死地的话：“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可有谁需要你！他身边有那么多娘儿们，你是个糊涂虫！”说完，他拿上所有的信件等等回到他的餐厅去了，他想要亲自看看这些东西。

我心上的一切都毁灭了。父亲最后的一句话击中了我的要害。如果他们枉费心机地想要在我的心目中给刘夏抹黑，是不会成功的。可是当人们对我说：“你看看你自己”，我于是明白了，确实这样：谁能需要我呢？难道刘夏会认真地爱上我吗？为什么他会需要我？说“你的卡甫列尔是个英国间谍”我还没有马上意识到是怎么一回事。一直等到我心不在焉地，机械地收拾书包上学时，我才终于明白刘夏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一切都像在梦中一样。

像在梦中般地我从学校回了家。“到餐厅去见爸爸！”人们对我说。我默然地去了。父亲正在撕我的信和像片往废纸篓里扔。“还是作家呢！”他嘟嘟囔囔地说。“连像样子的俄语都不会写！你就不能找一个俄国人！”卡甫列尔是犹太人，似

乎是使他最生气的事……

我已经对一切都完全无所谓了。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回到自己的房里。从这一天起很长时间我和父亲成了路人。我们几个月都不说话，一直到夏天我们才又见了一次面。但是，以后我们永远没有恢复起以前的关系。我对他来说，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受到他宠爱的女儿了。

不久，刘夏被流放到北方，为期五年。他住在沃尔库塔<sup>①</sup>，在剧院工作。流放期满后，他决定去基辅看他的父母，他是被禁止进莫斯科的。但是他冒着一切危险，还是到莫斯科来了，他只作了短暂的停留。这是在 1948 年……

他到莫斯科来了。当他已经坐上火车，想去基辅时，有人进了他的车厢，于是他就在下一站被押送往完全不同的方向……这次已经不是流放外地，而是去集中营，到一个最可怕的茵塔集中营的煤矿上劳动，为期又是五年，原因是违反禁令。

1953 年 3 月他服刑期满。要求允许他回到沃尔库塔，那里有个剧院，他想去那里定居。但是出乎意料之外，他又被转到莫斯科的梁宾卡监狱。

过了不久，1953 年 7 月，当局对他说：“您自由了。您可以回家。您的住址？您想给谁打电话？”

他出狱了，走在那阔别多年的莫斯科街道上，沿着炎热的

---

① 沃尔库塔是北极地区的集中营，这里监禁过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员，当地有矿井，犯人在井下工作。

七月的街道和街心公园走着。

\*

\*

\*

这十年中,我几乎完全不知道刘夏的准确消息;我的生活方式使我不可能和他的朋友见面,否则就会马上被人知道。我只知道“因为他和外国人有关系”被流放到北方。我也不知道他 1948 年到过莫斯科,作过短暂的停留。

给我留下的只是刘夏赠与我的幸福瞬间的回忆。

1953 年到来了。又是三月,距离我父亲盛怒之下走进我的房里打了我两记耳光的那天整整十年了。这时我坐在父亲病榻前,他已是弥留之际。我坐着,看着周围医生们的忙碌,我也想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也想到刘夏,他已被捕十年了。他的命运如何? 现在谁和他在一起?

又过了一年,在克里姆林宫举行苏联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灯火辉煌的乔治大厅里我遇见了刘夏,距我们最后一次会面已经过了十一年了……

## 17

1943 年春天，我中学毕业了。从三月三日那天起，我已经四个月没有和父亲见过面和通过电话了。一直到七月我给他打了一次电话，告诉他：我中学毕业了。“来吧！”他声音不很清楚地说。

我把毕业证书带给他看了，告诉他：我想考莫斯科大学语文系。我喜欢文学，我们学校的老师安娜·阿列克席耶芙娜建议我学语文。

“你想当文学家！”父亲不满意地流露了一句。“你就喜欢风流名士派！他们都是些不学无术的人，你也想做这样的人吗？……不行！你必须去受良好的教育，那管是考历史系也行。应该学习社会史，一个文学家也必须懂得历史。先学历史，以后你愿意学什么，就学什么……”这就是他的结论。虽然这结论是绝对不能违反的，然而我已经准备好和一位同学一同报考语文系，——但是，最后，我还是又一次相信了父亲的权威，考进了历史系。

我永远不会后悔我学了历史，我在历史系所受到的完整

教育是很有益处的。只是父亲没有想到：我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成为一个“有教养的马克思主义者”；得到的结果是完全相反的，这正是因为我学了社会史。

家里又很安静很寂寞了。从1943年春天起，祖巴洛沃就被“关闭”，父亲说：我们把这里变成了罪恶的渊藪。那年夏天外祖父和外祖母到这里来，只好到“松树”疗养院去住。

雅沙的女儿小古莉娅，回到他母亲那里去了；按照惩处被俘人员亲属的可怕的条例，她坐了两年监狱。所有被俘人员，甚至如受伤被俘的雅可夫，一律以“投降敌人”论处。就这样，政府置他们命运于不顾，不肯给予战时成百万被俘军官和士兵以任何关怀。那么战争结束以后，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不愿意回国，难道有什么可奇怪的吗？

瓦西利也像我一样，由于“腐化堕落”被赶出祖巴洛沃，根据父亲亲下的手谕（是以国防部长的名义吧），他被关了十天特级禁闭<sup>①</sup>。

克里姆林宫的寓所也出了事。亚力山得拉·尼古拉耶芙娜被赶出我们的家，这使我高兴万分，她罪有应得，俗语说“告密者首恶”。她对我的秘密监视，偷看我的信和笔记本，窃听我和卡甫列尔在电话里的谈话等等也没有救了她……父亲已经讨厌她的愚蠢，加上她没有尽到她的职责，她没有把我“保护”好，使我免于各种诱惑。……她迅速地和一位格鲁吉亚的负责同志结了婚，永远离开了我们的家。其实，这样的结局她

---

① 指特别残酷的禁闭室，其中包括橡皮墙禁闭室和只能站着不能休息的禁闭室等等。

自己也非常高兴。

1943 年秋天，当我进了大学的时候，我的“保卫叔叔”克里莫夫也被“调离”我们的家。这是因为我恳求父亲取消对我的“保卫”制度，因为我在大学同学面前实在难为情。出我意料之外，父亲理解了我，同意取消了。

只有我的保姆还和我在一起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她 1956 年逝世。她还和以前一样，在我的房里，坐在我身边缝缝补补，她的缝纫机仍然嗒嗒地响。有时她悄悄地给我送来一盘削了皮并切成小块的苹果，或者端来一杯茶和几片夹香肠奶油面包，我就一直埋头读我的书。

我难得见到父亲。他不像以前那样回家吃午饭了，现在他带着他周围的那些人一同去孔策沃，他们在那里共进午餐。

1944 年春天我结了婚。我的第一个丈夫和我一样，是个大学生，我们是中学同学，已经认识很久了。他是个犹太人，这是我父亲觉得不合适的。他似乎有所妥协，不想把事情弄得太僵，于是他同意了这一婚姻。

为了商量我的婚事，我专程去找了父亲。

和他谈点什么事都是很困难的，因为我已经永远不会使他满意了，他已经对我万分失望。

五月的一天，父亲的别墅繁花似锦，稠李花怒放枝头，雪白一片，十分恬静，只有蜜蜂在嗡嗡地叫……“那么说，你想结婚了？”父亲说。以后他半天也没有作声，眼睛看着树木……“是的，春天来了……”他突然说了一句。以后又加了下面的话：“见你的鬼，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这句话的意思是很多的。这是表示他不会妨碍我们，因此我们得以过了三年有保障的生活，能够安安静静地上学读书。生了一个孩子，也没有用我操心，根本没有用我管，有两位保姆带他，一位是带过雅沙的女儿、我的侄女古莉娅的保姆，一位是我的老保姆。

父亲只坚持一件事，就是我的丈夫不能到他的家里去。在城里给了我们一套房子，我们本来满意这样过日子……只是他使我们失去了一样东西，那就是他的亲热，他的爱，一般的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他一次也没有见过我的丈夫，并且坚决地说，永远不会见他。他对我说：“你的那个年轻人太会打算了。你看，前方打得多么可怕，那里是枪林弹雨，你看他，躲在后方享清福……”我没有作声，也没有坚持要父亲见他，因为即或见了面，也一定会闹出点什么事来。

这时我见到父亲的机会非常少。这次以后，又过了半年，秋天的时候我才又见到他。我告诉他：我怀孕了。他的心软下来了，允许我和我的丈夫到祖巴洛沃去住。他说：“你需要多呼吸新鲜空气。”我们两人到祖巴洛沃去了。这里真是人去楼空！瓦西利带着他的师在前方打仗，以后他又带了兵团。他简直是步步高升，青云直上，当了将军，满胸勋章和奖章，此外酒也越喝越多。

1945年5月9日，当收音机广播了战争结束的消息时，我给父亲打了电话。这是清晨。我心情万分激动，莫斯科已经一片沸腾，欢天喜地，大家都已经知道我们胜利了……“爸爸！祝贺你，祝贺我们的胜利！”我好不容易才说出这样一句话，

我激动得真想哭。

“是的，胜利了！”他说。“谢谢你，也祝贺你，你的自我感觉怎么样？”我感觉自己非常非常好，和今天莫斯科所有的人一样！

我和丈夫一起把所有的熟人都请到我们家里来，我们寓所挤得满满的，大家喝香槟酒，跳舞，唱歌……街道上人山人海，我不敢出去，因为再过两三星期就要分娩了。孩子生得很顺利，因为1945年的五月所有的人都心情愉快，喜出望外！

我再见到父亲时已经是八月了。这时他刚开完波茨坦会议回来。我记得我去看他的那天，他的那些常客进来告诉他说：美国人在日本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大家都忙于讨论这一情况，因此父亲也没有心思和我谈话。我也有对我说极重要的新闻。我生了一个儿子！他已经三个月了，名字叫约瑟夫……然而这样的琐事挤在世界大事件之中，当然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此没有人会对它有什么兴趣……加上我哥哥在父亲面前说了我丈夫一些什么坏话，因此父亲对之十分冷淡，一点也不关心，一句话也没有说。

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和父亲才又见了面。……父亲生病了，而且病得很重，时间也很久。战争时期的紧张和疲倦，现在都有所表现，人也上了年纪，他毕竟已经是六十六岁高龄了。

我已经不记得1945—1946年这个冬天我是否见到过他。……这时我又在大学读书，我正在补我生小孩所耽误的一年功课……我们两个住在城市的寓所，都在上大学。我的儿子

在我的和他的两个保姆的照顾下，住在祖巴洛沃。看来，我父亲显然认为我所需要的一切全都办好了，还能再有什么要求呢？可是他坚决不肯认识一下我丈夫。

我父亲从来没有要求我们离婚。我们在共同生活了三年之后，出于我们之间的个人的原因，1947年春天我们分手了。因此，当我后来听到有人说，似乎是我父亲坚持要我们离婚，似乎这是出自他的强迫，我极为惊奇。在这期间我大约还看过他两次。

1946年夏天，父亲去南方，这是1937年以来他第一次度假。他是坐汽车去的。长长的车队在当时还是很坏的路上行驶。在这以后，开始修建通往西姆费罗波尔的汽车公路。他们在各个城市停留，住在州委书记、区委书记的家里。父亲想亲眼看看人们是怎样生活的，可是举目所及都是战后的一片破坏景象。瓦莲琴娜·瓦西里耶芙娜一直跟着父亲到处出差。她后来告诉我：当父亲看到人们还住在地下掩体里，到处一片废墟，他的情绪很坏……瓦莲琴娜还告诉我：当时有一些同志（他们现在都是高官显贵了）到南方来向父亲汇报乌克兰的农业情况。他们带来了多不胜数的西瓜和哈密瓜、水果和蔬菜，以及成捆成捆的各种金黄色的小麦——请看吧！这就是我们富饶的乌克兰！可是这些同志中有一位同志\*的司机对父亲的“服务人员”说：在乌克兰到处一片饥馑，村里什么也没有了，农民用牛耕地……瓦列契卡<sup>①</sup>一面哭，一面喊道：

---

\* 指赫鲁晓夫。

① 瓦列契卡是瓦莲琴娜的爱称。

“他们多么没有羞耻，为什么他们这样没有羞耻地欺骗他！”可是现在，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他身上了！

这次南方之行以后，那里又修了几处别墅，现在这些别墅称之为“国家别墅”。按规定政治局委员都可以在这里度假。然而当时，除了父亲、莫洛托夫、日丹诺夫以外，一般没有人使用过这些别墅。在苏呼米又修了一所别墅，离新阿芳不远，同时在里察湖畔也修了许多别墅，形成一个组群，在瓦尔达依也修了一座别墅。

父亲自然非常满意我和第一个丈夫离了婚，父亲从来没有喜欢过他。在此以后，他对我的态度缓和了些，但为时不久。归根到底，因为我没有成为他所期望的人，所以总会惹他不高兴。可是他对我的儿子却非常温柔。

1947 年夏天，他约请我八月陪他去索契的霍洛德河边休假。这是多年以来我们两人第一次在一起度过约三个星期的时光。这使我既欣喜，又悲伤，而且觉得非常困难……

我又一次无法习惯他那日夜颠倒的作息时间：半个白天睡觉，下午三时吃早餐，晚上九时进午餐，然后和同志们在一起一直要坐到快天亮。

和他谈话非常困难，而且奇怪的是我们也没有什么可谈的。……当我们两人独处的时候，我精疲力竭地寻找话题，说点什么好呢？我有一种感觉，好像是你站在一座高山的脚下，而他在高山之巅；你向着高处喊叫，声嘶力竭，然而上面能听到的只有个别的词句……从他那里传到你的耳朵里的也只是片言只语，这样就无法畅所欲言。我们有时在一起散步，这就

容易得多了。我给他读报纸、杂志,这使他喜欢。他老了。他愿意安静。有时他自己也不知道他需要什么……晚上放映电影,都是一些战前的老片子,如他喜欢的《伏尔加啊!伏尔加!》和卓别林的影片等等。

总有很多人来和他一起进午餐——贝利亚,马林科夫,日丹诺夫,布尔加宁,还有其他人。他们在餐桌上要一连坐三、四个小时,老是听着千篇一律的一百年前的旧闻,好像世界上就再没有别的新闻了<sup>①</sup>——这真是既折磨人又枯燥无味。我总是精疲力竭,告退下去睡觉。他们还要坐到后半夜才散。

我不久就回到莫斯科,又在大学读书了。这时我住在克里姆林宫空空的寓所里,家里空无一人……瓦西利这时住在城里自己的家里。代替亚力山得拉·尼古拉耶芙娜来执行“管家大姐”任务的是警卫长伊万·伊万诺维奇·波罗达乔夫。他是公安部门的一位大尉,他神圣地保卫着委托给他管理的一切“财物”,当我从父亲餐厅的书橱取书时,都要一本一本地登记……

我的儿子和我的保姆与我同住,我的保姆在我学习的时候依旧给我削苹果,依旧端来一盘夹香肠奶油面包放在桌子上。……

秋天我收到父亲的一封信,我已很久没收到过他的信了。……这是战前年代的遥远的回音,非常地遥远,而且已经失真了……

---

<sup>①</sup> 德热拉斯在他写的一本题为《和斯大林的谈话》的书关于这些宴席有很多描写。

你好！斯维特卡！

收到你的来信。你没有忘记父亲这很好。我身体很好，生活得不错，也不觉得寂寞。送给你一点小小的礼物——桔子。吻你。

你的约·斯大林

(1947年10月11日)

1947至1949这几年，真是烦闷已极。我的生活是与世隔绝的。虽然克里莫夫早已不跟在我后面了，可是我每走一步都要受到监视。欧夏<sup>①</sup>在别墅里长大，成了个农村的野孩子，我有时候几个星期也见不到他。我在上大学，很少去戏院，可是常去音乐厅。我本来没有多少熟人，想扩大一些交往的范围，又不可能。

安·阿·日丹诺夫死后，我常去他们家，比起我那烦闷的城堡，觉得这里愉快一些。每逢星期日，有些青年人来这里玩，他们是尤里·安德列耶维奇<sup>②</sup>的同班同学和大学里的朋友。我父亲一向很爱安·阿·日丹诺夫，因此也很尊重他的儿子，而且总是希望两家能够“结亲”。这件事很快就发生了，这是在1949年的春天，婚事并非出自特别的爱情和特别的眷恋，而是出自理性的思考。……我觉得这样做可以使我有可能进入另一个家，给我哪管是一点点的自由，给我打开接近人们的大门，这是我十分缺少的。

可是父亲却另有打算。我突然知道：在他的孔策沃别墅

---

① 作者的儿子约瑟夫的爱称。

② 尤里·安德列耶维奇是安·阿·日丹诺夫的儿子，作者的第二个丈夫。

正在增建宽敞的第二层楼……然后他到祖巴洛沃来了一次，在各个房里走了走，对我说：“你为什么要搬到日丹诺夫家里去住？那些女人们能把你吃掉！那里女人太多！”（关于婚姻的问题已经自然而然地解决了，我想大学毕业后，就搬到日丹诺夫家里去住。）

他不喜欢日丹诺夫的孀妻季娜依达·亚力山得罗夫娜和她的姐妹们……

我真吓坏了——我无论如何不想再在家里留在父亲身边，尤里·安德列耶维奇也决不会同意住到我们家里来。

看起来父亲随着人已年迈，对于独自一人的孤独的生活感到苦闷不堪。他已经是如此与世隔绝，如此高高在上，以至于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真空地带，没有能够与之谈点什么的人。

1948年夏天他送我、欧夏和古莉娅去克里米亚度假。古莉娅是雅沙的女儿，他还时常想起她，问及她……后来他往克里米亚给我寄了一封信，说：“十号以前你到我这里来，然后我们一起去南方。吻你！你的好爸爸。”他想我们能像去年夏天那样，同去霍洛德河畔，可是我不想去……整个八月里，我想和我的保姆和儿子在祖巴洛沃度假，于是他生气了。……

转晚一些时候，1948年11月我去南方看他。这里天气很暖和，阳光灿烂，海水虽然已经冷了，望着大海却使人心旷神怡。这时正盛开着玫瑰花，还用不着穿夹大衣……父亲非常不高兴，吃饭的时候当着众人的面骂我“白吃饭的人”，又说我一“件有出息的事都没做过”。大家都不敢作声，偻偻不安，

我也沉默着,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次日,他突然第一次和我谈起我的母亲。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正值十月革命节,十一月九日是她逝世的纪念日。这件事总是破坏他的节日情绪。最后这些年,他一直去南方度过十一月。

我也觉得六神无主;我不知道如何和父亲谈这个题目——我很怕谈起它。我们两人在一起吃了很长时间的早餐,和往常一样,早餐有许多水果和好酒。“不过是支不起眼儿的小手枪!”他谈着,突然变得怒不可遏,用手指比着是多么小的一支手枪。“这不过是一个小玩具!这是巴维尔带给她的。送什么不行,偏送这个!”

他在寻找罪魁祸首。他想找出原因或罪人,以便把这一重担推到这个人的肩上。这一重担压得他越来越厉害了。看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常想到母亲。一会儿,他突然想起母亲曾和波琳娜·谢苗诺芙娜<sup>①</sup>要好,是她“给了她很坏的影响”;一会儿又骂那本母亲死前读过的当时流行的书《绿帽》。他根本不想去思考在他们的共同生活中使母亲极感困难的其它严重的原因,他想找出出事的直接的“原因”,似乎全部问题正是在这里。

对此我很为难,无言以对。我觉得他第一次对我平等相待,把我作为一个成年人和我谈起这件事,然而当我感受到他对我的这种信任时,我的心情无限沉重。

1948年11月我们同乘火车回到莫斯科……我们包厢里

---

<sup>①</sup> 波琳娜·谢苗诺芙娜是莫洛托夫的妻子,曾被捕入狱。



有一本《艺术》杂志，我坐着翻阅上面印的一些美术作品。父亲走了进来，看了杂志一眼，问道：“这是什么？”“这是列宾的绘画和他的草稿”。“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突然说了这么一句，他的声音十分忧伤，使我非常难过……我在设想，如果父亲突然在哪一天，不，在专门为他个人开放的一天，谢绝其他人参观，去看一看特列其雅科夫美术馆，那会怎么样呢？天哪！那以后可就不得了啦！那一定先是忙得天翻地覆，然后就是瞎吹一气，却扯一通……也许父亲自己很清楚，别人能够享受到的那些普普通通的消遣，对他来说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也没有这些打算。也许是他害怕吧！我不知道。他从来没有怕过人民，今天有人说“他不爱人民”，这些假话听起来是多么愚蠢。

停车时，我们在月台上散步。父亲一直走到机车旁，和铁路员工打招呼。我们没有见到其它旅客，因为我们乘的是专列，没有人走到月台上来……这情景使人觉得悲伤、忧郁，是不祥之兆。这一切是谁想出来的呢？是谁发明的这些花招呢？不是他。这是制度，在这一制度里，他自己像一个囚徒，看不见人，孤独、空虚使他窒息。

我带着万分沉重的心情回到莫斯科。列车没有到站就在莫斯科郊区停了下来，汽车就等在此地，又是为了不走城里，因为城里人多。肥胖的伏拉西克将军，因为居官显赫，又对白兰地有些贪杯，所以更加发福了。他在这里跑来跑去，忙碌了一阵。担任警卫的其他将军和上校们都被公家的美味佳肴养得脑满肠肥，行动起来也直喘气。整个专列都是他们这些

人——侍从，内廷人员，食客。父亲一看见他们就气得咬牙切齿，他不错过任何机会，借故用许多粗鲁话骂他们。他对服务人员从来不用这种语气说话。

我回克里姆林宫的寓所，他回孔策沃去了。过了好几天我才休息过来，身心恢复正常。和他在一起非常困难，神经功能有着巨大的消耗。我们彼此相距已经太远，这是我们两人都清楚的。每个人都渴望回到自己的家里，单独地好好休息一下，不受对方的干扰。我们两个人，每人自己都很委屈。每个人都很悲伤和痛苦，——生活为什么这样愚蠢呢？每个人都觉得责任在对方……

1948 年底，一个逮捕人的新浪潮又起来了。我的舅妈和姨妈（巴维尔和雷登斯的孀妻）和她们的熟人都被抓进监狱。我第一个丈夫的父亲伊·格·莫罗佐夫老人也被逮捕，接踵而来的是反对“世界主义者”的运动，又抓了许多人。

波琳娜·谢苗诺芙娜也被逮捕，他们不顾此举会给莫洛托夫多么可怕的打击。洛佐夫斯基也遭逮捕，米霍艾尔斯<sup>①</sup>被枪杀。他们被控为参加了“犹太复国主义中心”。

“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把你那第一个丈夫丢给你的”。父亲过了些日子这样对我说。“爸爸，青年人对复国不复国是无所谓的，哪有什么犹太复国主义？”我试图反驳他。“不对！你根本不懂！”他声色俱厉地说，“他们老一代人都染上了犹太复国

---

① 米霍艾尔斯(真名沃弗西)·索罗门·米哈依洛维奇(1890—1948)，苏联名演员和名导演，苏联人民演员，犹太族，斯大林奖金荣膺者。

主义的毛病，他们又用这种精神教育青年人……”然而和他争辩是无益的。

当我问他，我的舅妈和姨妈犯了什么罪时，他说：“她们太喜欢说。她们知道的事情太多，说的也太多。这对敌人有好处……”他那冷酷无情抵抗全世界的情绪到了极点<sup>①</sup>。

他到处都看见敌人。这已经是一种变态心理，是一种迫害狂，这都来自他的孤独和心灵的空虚。

“你也常有反苏言论。”他曾绝对严肃地、凶狠狠地对我这样说……我没有反驳，也没有问他这些情报是从哪里来的……

我想离开这个家，随便到什么地方去。1949年的春天，我大学毕业了，和尤里·安德列耶维奇·日丹诺夫结了婚。我和欧夏搬到克里姆林宫日丹诺夫的家中。

我父亲说得也有道理：在日丹诺夫的家中，完全不像我想象的那样轻松和愉快。在我们自己的家里觉得忧伤、空虚、寂寞、不舒适、日子过得很困难，虽然如此，我们家完全没有市侩气息。

可是在我现在走进的这个家里，是故意表现的、形式主义的、虚伪的“党性”和最露骨的“女人的”市侩气息的结合，家中“财宝”满箱，摆设俗不可耐，从花瓶、小垫子<sup>②</sup>到墙上挂的静物复制画无不如此。日丹诺夫的寡妻季娜伊达·亚力山得罗

---

① 斯大林晚年觉得到处都是敌人，他处于全世界敌人包围之中，所以他的反抗情绪到了病态的程度。

② 指桌、椅、沙发上放的花边小垫子。

芙娜管理家务；她正好就是虚伪的“党性”和市侩的无知相结合的体现物。

我们结婚以后，不知何故，青年人不再来了。闭锁在家庭的圈子里很难忍受，而且也非常寂寞……

我艰难地度过了从 1949 年到 1952 年这段岁月。这也是所有的人都感到艰难的岁月：整个国家都喘不过气来，每个人都忍受不下去了。这时我居住的这个家笼罩着一片正统的“党性”，但这决不是我外祖父和外祖母、我妈妈、斯瓦尼泽和其他老党员所具有的那种党性。这里的一切都是装给别人看的、夸张的、表面的。

尤里·安德列耶维奇也是莫斯科大学毕业的。当时大学的年轻人都很爱他，但是他为自己在中央机关的工作而烦恼，因为他很不适合做这个工作。他很少在家，晚上很晚才回来，这是当时的习惯，夜里十一点才下班。他有自己的工作和操心的事，加上他天生性情古板，所以他也注意不到我的情绪和苦恼。在家里，他对母亲唯命是从，称她为“英明的猫头鹰”，他完全按照他母亲的情趣、风格、习惯和判断的渠道行动。我是在自由的气氛中长大的，所以我来这里不久，已经闷得喘不出气来。……

我请求允许我的保姆搬来和我同住，她是唯一能体贴我的亲人，可是他们对我说：“一个没有文化的老太婆在我们家完全无事可做，她只会把欧夏惯坏。”于是我的老保姆留在祖巴洛沃，把她搬到服务人员的厢房去住。我常到她那里去作客，我们一起喝茶，吃果酱，她和我说她病，我们商量一些我

们共同的事情，她也到我们的乌斯平斯科耶（日丹诺夫的别墅）来看过我两三次，这里像对待下人那样接待了她，只是欧夏高兴得不得了，向他的“好奶奶”扑了过去，她很快就走了。她很不习惯这种对人态度，在她的一生中，到处都把她看成我们的家庭成员，就是那些“资产者”，革命前她的主人也比这里的人对她和气一些。她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我很久很久没有看见父亲了。1949—50年的冬天，我由于怀孕病得很厉害，这次和上次不同，反应非常厉害。转年春天我进了医院，一个半月以后，我带着一个又瘦又小的喀琪娅回到乌斯平斯科耶别墅。疾病、孤独、意识到第二次结婚的失败、必须生活于其中的家又是十分不愉快等等，使我难以忍受。

巧得很，我和斯维特兰娜·莫洛托娃躺在一个病房里，我从童年起就认识她。她也生了一个小女孩，过了两天，像正常人家的父母那样，莫洛托夫就来看她了……这样的对比使我悲伤万分，久病缠身使我的神经变得非常脆弱，于是当天晚上，我满心委屈地写了一封信给父亲……我收到了他的回信，这也是他给我写的最后一封信：

你好！小斯维特兰娜！

收到了你的信。我很高兴！你总算平安地过来了。肾脏是开不得玩笑的。又加上分娩……你说我丢下你不管了，你是从哪里想出这些来的？作梦才能看见这些东西……

我劝你不要相信梦。珍重万千，好好照看你的小女儿！  
国家需要人，早产婴儿也不例外。再稍等一等我们会见面

了。吻我的小斯维特兰娜。

你的“好爸爸”

(1950年5月10日)

接到他的信,我很高兴,我本来没有特别指望他会给我写回信。……可是一想到:我那生死未卜的小女儿,“国家也需要她”,我不由得非常难过。……唉!我十分清楚,我们是不能很快见面的。

一直到下一年——1951年夏天,他去格鲁吉亚的波尔若米度假,才把我叫了去,我们才见了面,又在一起呆了不多日子,约两星期左右。他在休息,我看见他是多么陶醉于格鲁吉亚的沁人心脾的空气和库拉河上吹过来的微风,库拉河从他所住的丽凯宫脚下流过……他已经七十二岁高龄,仍然精神抖擞地迈着矫健的步子在花园里散步,那群肥胖的警卫部队的将军们气喘吁吁地一拐一瘸地跟在他后面。有时他掉个方向,转过身来,正好就撞上他们,这时他简直要气炸了,找个随便什么微不足道的理由,先碰上谁,谁就被他大骂一顿。

按他夏天的习惯,在花园的树下进早餐和午餐。他有时请人在库拉河里捕几条鲜鱼吃,这时他一面想着这些鱼的名称用格鲁吉亚话该怎么说,一面重温那愉快的旧梦。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在他心里暗暗地想着,一般来说,他不喜欢说出自己的感情,他说这是“女人们的事”……他仅仅提起一件事,他说:1922年,妈妈刚刚生了瓦西里,他们一同到格鲁吉亚来过,当时他和妈妈就住在这丽凯宫。至于详细情景,他

没有说。

所谓的“宫殿”是某一公爵的当年行猎的别墅！建筑丑陋，没有任何风格，很俗气，然而环境极其幽美，它位于峡谷之中，库拉河从此流过。河岸一边悬崖峭壁，巨石峥嵘，在山崖的高处耸立着一个古城堡，已是断壁残垣，这是格鲁吉亚常见的景色。另一岸是缓坡，在一段不长的山谷间开辟了森林花园——一半森林，一半花园，我们的别墅就位于此处。我父亲的随行人员总是一大帮，没有多少可供勤务人员居住的地方，对他们极不方便，因此将军和警卫长们直骂街。可是父亲觉得很方便，整个别墅总是供他一个人住。

到此地来，一路上都使他不愉快。他最忍受不了的是一大群人给他鼓掌，向他大喊“乌拉！”——这时他总是脸都气歪了，十分难看。在库塔依西火车站上，他的格鲁吉亚同乡们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使他走不出车厢，无法上汽车离开车站……人们差一点没有卧倒在车轮下面，他们扑过来，大声喊着，投来一束束的鲜花，把孩子举到头上。这是本地人民出自他们纯洁内心的真情表露，而父亲却非常不高兴。他已习惯于这样的场面：他一到，车站空无一人，他一走，路上也是空空的，他不习惯人们对着他的汽车喊叫，他忘却了世上还存在着真挚的感情。

因此，后来他便很少出门，只有一次，他从波尔若米出发想去巴库里安尼看看，结果半途又折回来了，因为路上欢迎得太过分……他经过的第一个村子，路上铺上了地毯，所有的村民都到公路上来了，以致汽车无法行进……只好下车，坐到

桌前接受宴请……谢天谢地，当时我不在场，我会为类似的场面而羞愧得无地自容。就是在莫斯科，在大剧院或庆祝他七十寿辰宴会上简单的“欢呼”，我也总是羞愧难当。在这种情况下，我真害怕他会站起来说两句什么马上使所有的人寒心的话，因为我看见他的脸已经气得多么难看。他以前曾恶狠狠地说：“张着大嘴伸着脖子喊，简直是木头！……”也许他猜出了这些欢呼中的虚伪。他对伪善是十分敏感的，在他面前不可说假话……也许，他的心灵已经如此空虚，使他不相信人们还有善良的、赤诚的感情，就是在此地，在格鲁吉亚，他也这样想；然而不应该怀疑最普通的农民的喜悦是虚伪的。

看来，格鲁吉亚决定表示一下他们不屈从于莫斯科国家保安部以及它规定的秩序，表示格鲁吉亚的人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表达自己的感情。这使得他没有可能离开这里前去第比里斯和哥里，大约去那里本是他的心愿。于是他成了自己荣誉的俘虏，坐在波尔若米，不能越出猎“宫”范围一步……

我先回莫斯科去了，他直到深秋才回来。从波尔若米回家的路上，我和瓦西利访问了哥里，这时我们才突然感受到，这也是我的故乡。哥里座落在库拉河湾的一块小小河谷上，库拉河绕着一座坡度不大的丘陵流过，丘陵上面有一个城堡。这小城市就在山脚下，周围都是果园和葡萄园，阳光充沛，银波闪闪的库拉河水不深，静静地流过。四围的群山汇入山谷，此处就是阿切尼村，它盛产金色的上等葡萄酒；进入深谷，就是格鲁吉亚古典建筑阿切尼教堂，墙上有十一世纪的壁画。

当我看见这葡萄园中屹立的教堂，桃李园中的小城市，这



慷慨的大地赐与的一抔沃土，大地上面覆以蔚蓝色的苍穹，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像这里独得阳光之厚，看见了这里的一切不由得心潮澎湃！可惜，我的访问和游览完全被隆重接待和参观“斯大林纪念馆”和他的旧居所破坏。这所旧居是鞋匠一家所住过的小茅屋。根据贝利亚的倡议，修了一个大理石的亭子，把它罩在下面，因此活像一个地下铁道的小车站。在这大理石的覆盖下，要好好看一眼这处小草屋就很困难了。没有这块大理石，保存它原来的面貌，这本身能说明自己的历史……每件东西都作为圣物诚惶诚恐地摆在这里。这使我痛苦而且羞愧，我想要马上离开这里。

这个秋天我在格鲁吉亚的时候，我想起我的祖母叶喀捷琳娜。她葬在第比里斯的达维多夫山上哥里波叶多夫<sup>①</sup>墓的近旁，靠近圣达维德教堂。这里宁静而幽美，幸好未被破坏，没有被庸俗化。

我记得在1934年，雅沙、瓦西利和我被派到第比里斯探望我们的祖母，当时她正在生病。

可能这次探望就是贝利亚倡议的，我们就住在他的家里。我们在第比里斯呆了一星期左右，可是探望祖母只有半小时。……她住在一个古老的、美丽的、带花园的宫殿里，她只占了一间阴暗、矮小的房间。窗子很小，开向院子。屋角上放着铁床、屏风，房里满是上年纪的老妇人，按格鲁吉亚的习惯，她们都穿着黑衣服。床上坐着一个老妇人。人们把我们带到

---

① 哥里波叶多夫·亚力山大·谢尔盖耶维奇（1795—1829）俄国大文学家，以他的著作《聪明误》闻名文坛。

她的面前，她很热情地用她那干瘦的骨节粗大的双手依次同我们拥抱和亲吻，并用格鲁吉亚语说了几句什么……只有雅沙懂格鲁吉亚语，他作了回答，我们站在一边一声不响。

在她那苍白的满是雀斑的脸上生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她手上也长满了雀斑。头上包着头巾，但是我知道她的头发年轻时是土红色的，这是父亲告诉我的；在格鲁吉亚认为土红色的头发是美丽的。当时坐在祖母房里的她的朋友——那些老妇人也依次吻了我们，并说我很像祖母。她手里端着一小盘冰糖招待我们，泪水从她的脸上流下。我们没法交谈，因为我们各操不同的语言。贝利亚的妻子妮娜陪我们来的。她坐在祖母的身边和祖母聊了几句，大约，她们两人彼此都互相深为鄙视。

房间里人很多，都是出于好奇来看热闹的，窗台上放着一捆捆的草药，发散着药香。我们很快就走了，没有再去“宫”里；我一直在惊异：祖母的日子为什么过得这样贫寒？我有生以来，还没有看见过比祖母的这张铁床更难看、更可怕的床。

祖母有自己的原则，这是一个信仰宗教的人的原则，经历了严峻的、艰难的、诚实的一生的人的原则，无愧于天地鬼神的人的那种原则。她的坚定、顽强、严以律己、清教徒的道德观念，她那英勇不屈的性格都传给了我父亲。

伫立在她的墓前，回忆着她的一生，难道能够不想到她如此虔诚信奉的上帝吗？

## 18

今天当我从书报上看到或者听人说到：我父亲生前几乎自认为他就是上帝，我甚为奇怪，因为这些话是出自那些深知他的人们之口……是的，父亲一生并不特别民主，但是他从来也没有认为自己就是上帝。

最后的几年，他的生活非常孤僻。1951年秋天去南方，是他最后一次外出旅行。他再也没有离开过莫斯科，一直住在孔策沃，这里翻来复去改建个没完没了。最后这些年，在大房子旁边修了一所小木屋子，因为这里空气好；父亲常常就在这里的一间有壁炉的房间里度日。那里没有任何奢侈的东西，只有木制的墙裙和地上铺的高级地毯是比较值钱的东西。

从世界各地送给他的礼物，他指示收在一起交给博物馆，这决不像有人认为是那样，是一种虚伪，是故意做出的高姿态，因为他确实不知道他应该如何处理这许许多多值钱的，甚至是贵重的东西，如绘画、磁器、家具、枪支、衣服、家庭用具、各民族的工艺美术品等等；他不明白送这些东西给他做什

么。

他有时送给我一点什么礼物，如罗马尼亚或保加利亚的民族服装之类。但一般来说，就是那些指名送给我的东西，他都认为是生活中不允许应用的。他的理解是：这些东西所表达的感情是象征性的，因此也应该做为一种象征来处理这些东西。1950年“礼物博物馆”在莫斯科揭幕，在父亲生前和死后，都有一些认识的夫人们对我说：“啊呀！那博物馆里有多么漂亮的家具和餐具啊！唱机真好极了！难道就不能给您一套吗？”不行，不能！

从格鲁吉亚回来以后，我就见过父亲两次。我已经谈过：1952年秋天过十月革命节时，我如何带了孩子到别墅去看过他。

以后，1952年12月21日，他七十三岁诞辰那天，我去过父亲那里，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这一天，看样子他身体很不好\*。看来他已经感到了疾病的征兆，可能是高血压——因为他突然戒烟了。他对自己能下决心戒烟感到骄傲，他吸烟已经五十年了。看来，他已经感到血压很高，但是没有任何医生给他看病。他信任的唯一的医生是维诺格拉多夫院士，他已被逮捕；其他的医生他都不信任，根本不允许他们接近自己。他自己服用一些丸药，把几滴碘酒滴在一杯水里吃下去；不知从那里弄来的这些不三不四的偏方。但是他自己做了一件不能允许的事：在我这次来看

---

\* 1952年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以后，大约因为有病，他曾两度向中央提出辞职，要求退休。十九大当选的中央成员都清楚这一事实。

他的两个月之后，在他中风之前二十四小时，洗了一次蒸汽浴，他的别墅里有个为他修建的专门的浴室，这是他从西伯利亚回来之后留下的老习惯。任何一个医生也不能允许高血压病人做出这样的事，但是他身边没有医生……

他生命最后一个冬天发生了“医生谋杀案”。瓦莲琴娜·瓦西利耶芙娜后来告诉我：父亲对这一系列的事件深为苦恼。她听说过吃午饭时是怎样研究这一案件的。她是伺候餐桌上菜的人。她听父亲说：他不相信这些医生做了“坏事”，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可是有齐玛舒克医生的揭发为“证”，所以在坐的人，像往常遇见这种情况一样，一句话也不说，保持沉默。

瓦莲琴娜·瓦西利耶芙娜一向偏袒父亲。她不愿有什么阴影落在我父亲身上。可是还是应该听听她讲的许多事情，人们从她讲的故事中可以提取一些健康的因素，因为她在父亲家中度过了最后的十八年，而我是很少在他身旁的。

因为我不常去看父亲，许多人都责备我。人们对我说：“喂！你为什么不去看父亲？打电话问他让不让去，如果说不行，那么过些时候再打电话，有朝一日他总会找到时间见见你。”

也许他们说得对。也可能是我太不愿意麻烦人。每当我听到他恶狠狠地、生气地回答我说：“我很忙”，然后扔下听筒时，我就几个月也振作不起精神来给他打电话。

我最后一次看他时候，我哪里知道这就是最后的一次呢！和往常一样大家坐在一起吃饭，还是那些常来的客

人\*，还是往常的那些言谈、俏皮话，以及谈了不知多少年的那些笑话。奇怪的是：父亲没有吸烟；奇怪的是：他的脸色红润，他平时脸色总是很苍白，看来他的血压已经很高了。然而他仍像往常一样，一小口一小口地品着格鲁吉亚的清淡的、度数不高的、味道香醇的葡萄酒。

房内的一切都很奇怪：墙上挂着俗不可耐的作家肖像，那张《扎波罗什人对苏丹的回答》的复制品，杂志上剪下来的儿童照片……一个人不喜欢他的墙光秃秃的，这并没有什么奇怪，令人费解的是，怎么就不能从人家送给他的成千上万的绘画中选一幅挂上呢？是的，在一个屋角上挂着一幅镶在框子里的中国刺绣画，那是一只色彩鲜明的斑斓大虎，然而这是早在战前就挂上了的，大家已经看惯了。

进餐的情景也和往常一样，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好像周围的世界根本不存在。难道说坐在这里的人们今天早上就没有听见什么从全世界四面八方传来的新闻和有趣的事物吗？他们比任何人掌握的情报都多，可是就好像他们什么情报都没有似的。

当我要走的时候，父亲把我叫到一边，给了我一些钱。  
1947年工资制度改革后，取消了免费供应政治局成员家庭开

---

\* 最后的一段时间常来的客人有：贝利亚、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和米高扬，有时赫鲁晓夫也来。莫洛托夫自从1948年妻子被捕后，实际上已有职无权，甚至于连我父亲病危的日子也没有叫他来。应该指出，在最后这段时间，甚至父亲的多年亲信都已失宠：长期受宠的伏拉西克1952年被捕入狱，父亲的私人秘书波斯克列别舍夫也被撤职，他曾在父亲身旁工作了二十年左右。

支的制度。在这以前,如果不算大学的助学金,我总是一点钱也没有,所以我老是向我有钱的“保姆们”借钱,她们的工资都是很高的。

1947年以后,在我们难得的会面时,父亲常问我:“你需要钱吗?”我总是回答:“不需要。”“你胡说,”他说,“你需要多少钱?”我真不知道怎么对他说。父亲不会按新币算帐,他完全不知道什么东西值多少钱,因为他对钱还是革命前的概念:好像一百卢布是一宗大得不得了数目。当他给我两三千卢布时,他已经认为是给了我百万巨额,我不知道他是叫我用多少时间:一个月?半年?或者是两星期?

他每月的工资都装在一个袋子里放在他的桌子上。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存款折,大概不会有。他自己从来不花钱,他也没有地方用钱,也没有什么可买的。他的生活用度、许多别墅、住房、服务人员、伙食、衣服等全部由国家支付,为此在国家保安部系统内专门设了一个局,有专门的会计科,真不知道花了多少钱……这些情况,他是完全不知道的。有的时候,他找那些警卫部队的将军们和警卫长们,找伏拉西克大闹一通,骂道:“你们这些寄生虫!在这里发了财,我全知道!有多少钱在你们手中像水倒在筛子里一样流走了!”可是他确实是什么也不知道,但是他直觉地意识到开销很大……他也想检查一下他的家务用度,但是他什么也检查不出来,因为人们用虚假的数字搪塞他。他大发雷霆一顿,仍然什么也搞不清楚。虽然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他却无力反对这种制度;这一制度像巨大的蜂房一样在他周围成长起来,他既不能摧毁,甚至

也无法控制……伏拉西克将军在父亲的名义下，支配着千百万卢布的巨款，用于修建，用于旅行时规模很大的专列开支，而我父亲甚至于弄不清楚这些钱用于何处？用了多少？用到什么人身上。

他大概明白，无论如何我需要钱用。最后这几年，我在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学习，当研究生。当时我得到较高的助学金<sup>①</sup>，生活是有保障的。可是我父亲还是不时地给我一些钱，并且说：“这是给雅沙女儿的。”<sup>②</sup>

这年冬天他为我做了许多事情。这时我已和第二个丈夫离了婚，搬出日丹诺夫家。父亲决定让我住在城里，但不住在克里姆林宫，给了我一套房子，我和孩子至今还住在这里。但是他向我提出一个附带的条件：不能再使用公家的汽车和公家的别墅。“这是钱，自己买辆汽车，自己开，但是把司机证拿来给我看看。”他这样说。这正合我的意。这使我有了某些自由，有可能和人们正常交往，如果再住到克里姆林宫我们的老寓所去，连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当我告诉父亲，我要离开日丹诺夫的家了，他回答说：“随你的便吧！”可是他不满意离婚，他不喜欢这类事情……

有一次，他在盛怒之下问道：“你还是过寄生虫的生活，一切享受现成的吗？”等到他知道我从食堂买饭付钱时，才平

---

① 这一时期的研究生的助学金约七百到一千旧卢布，有的外国研究生的助学金为一千二百至一千四百旧卢布，对学生来说，这是个不小的数目，我不清楚作者属于那一类。

② 雅沙的女儿由斯维特兰娜抚养。



静下来。当我搬到城里新居去住的时候他很满意：因为我不再靠父母过日子了……总之，没有人像他那样，向子女不断灌输独立生活的思想，要子女经济上不依靠父母和别人。“别墅、公家的汽车、房子，这些都不是属于你的，不要认为是自己的东西。”他常常把这句话翻来复去地说。

就是这时，他最后一次把一个封着钱的袋子交给我时，还提醒我说：“这个——交给雅沙的女儿。”

我走了。我原想三月一日星期天再去看他，但是没有打通电话。去看他的手续非常复杂：首先要打电话给警卫部队的值班负责人，他会说：“有活动”或“暂时没有活动”。“暂时没有活动”——是指我父亲正在睡觉或正在房间看东西，没有在他住宅内外走动。如果回答说“没有活动”，那就用不着打电话了；我父亲常常在白天的任何时候睡觉，他的作息时间是颠倒的。

1953年3月2日我被从科学院的课堂上叫出来，要我去孔策沃……我已经都描写过了。我正是从这里开始我的信札的。

然而我的信还没有结束。我还不想马上结束。

## 19

1953年3月2日瓦西利也被叫到父亲身边，他也在那挤满了人群的大厅里坐了几个小时。可是他喝得醉醺醺的，很快就走了。最后这段时间他经常喝得烂醉。他到服务人员的房里去，在那里又喝酒，又大闹，破口大骂医生，大喊有人“杀害了父亲”或“正在杀害父亲”，直闹到回家走了为止。

他这时是总参学院的学员，因为他不学无术，父亲送他进这个学院学习。可是他根本没有学习。他根本不能学习了，他已经是个病人，他得了酒精中毒症。

他的命运是很悲惨的。他是这种环境、制度和这种政权机器的“产物”和牺牲品；这一国家机器产生、培育并往人们的头脑中灌输了“个人崇拜”的思想，正因为如此，他才得以迅速地飞黄腾达。战争开始时瓦西利是二十岁的大尉，战争结束时年方二十四岁，已是中将军了……

人们揪着他的耳朵把他提拔上去，根本不考虑他的能力、才华和缺点，只想如何去取得父亲的“欢心”。1947年他从东德回到莫斯科，马上被任命为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员，虽然那

时他已是酒精中毒症病人,已经完全不能飞行了。那时,根本不去考虑这些问题。父亲看见他这种样子,无情地骂过他,当着众人的面,像对待一个孩子那样,叫他下不来台,骂个不停,然而一点用处也没有,因为和疾病作斗争需要采取另一种办法,可是瓦西利并不愿意这样做,而且也没有人敢建议他去治病……对他来说,父亲是唯一的权威,其他的人都不在话下。一些乌七八糟行迹可疑的人,什么足球运动员、按摩师、体育教练,体育大亨<sup>①</sup>围着他转来转去,教唆他去干各种营私舞弊的事,如和足球队、冰球队勾勾搭搭用公家的款项进行各种修建:盖游泳池、文化宫、体育宫等等……他毫不在乎,随便处理公款,他有权支配军区的巨额款项,挥金如土。

他住在公家的大别墅里,在这里他置办了巨大的家业,猎狗成群、骏马满厩……他要什么有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伏拉西克极力投其所好,以便有朝一日,瓦西利能在父亲面前替他美言几句,包庇一下。他利用在父亲身旁的有利条件,把他不喜欢的人一脚踢开,甚至还把什么人关进了监牢。有比伏拉西克更重要的人物<sup>②</sup>庇护着他,他们像玩傀儡那样,操纵着他,给他勋章、军衔、汽车、骏马,把他往坏处带,教他腐化堕落,当他还被需要的时候。父亲一死,他们不需要他了,就把他扔到一边,忘掉了……

不过,撤掉他在军区的职务是1952年夏天父亲亲自决定的。1952年五一节是个阴天,风很大,所以空军司令部下

---

① 指体育界一些从事不法活动的人。

② 他们是贝利亚、阿巴库莫夫、布尔加宁。

令禁止空军列队飞过红场。可是瓦西利却擅自下令空军飞过红场，结果糟得很，不仅不能保持队形，而且差一点撞在历史博物馆的塔尖上……着陆时有几架飞机堕毁……这是骇人听闻的违抗上级命令行为，而且造成惨重的后果。因此父亲亲自签署了撤消瓦西利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员职务的命令。

可是把这位中将放到什么地方去呢？父亲希望瓦西利能在总参学院毕业，像阿尔乔姆·谢尔盖耶夫那样。谢尔盖耶夫是瓦西利童年时代的老朋友，可是瓦西利早已中断了他们之间的友谊。父亲对他说：“我已经七十岁了，还在学习！”并把自己读的历史、军事、文学等书籍指点给他看……瓦西利同意父亲的意见，进了总参学院。然而他一天也没有去过，他已经不能学习了。应该马上送他进医院去治病，医治酒精中毒，此刻还为时不晚。可是他自己不愿意治病，那么有谁能强迫一个将军治病呢？何况是这样一个将军！？

他待在别墅，继续喝酒。他用不着喝多少，只要喝上一口伏特加，立刻就瘫倒在沙发上昏睡过去。他天天处于这种状态。父亲之死使他极为震动。他怕得要命，因为他确信父亲是给“毒死”或“杀害”的；他看到一个世界就要毁灭了，失去这样的世界，他就不可能生存下去。

大丧期间，瓦西利的状态是可怕的，他的表现也同样可怕，他责怪所有的人，他埋怨政府、医生和一切可能埋怨的人，说医治有错误，丧事办得不像样子等等……他对现实世界和他自己所处的地位都失去了判断能力——他觉得自己是继承王位的太子。

国防部长<sup>①</sup>把他叫去,要他安静下来。给他安排了工作,建议他去指挥某一个军区。他断然拒绝了,非在莫斯科不行!非去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部不行!决不能低于这些!当时下达了命令:指定他去某地工作。他拒绝执行命令。人们对他**说**:“这还得了,你不服从国防部长的命令吗?你不认为自己是军人了吗?”他回答说,他不认为自己是军人。于是国防部长非常生气,说:“去掉他的肩章。”他离开了军队。以后他就待在家里喝酒,是一个退伍的将军。

他把他的第三个妻子也赶跑了。他曾经把他第二个妻子接回家中,这时她自己又离开了他。和他已无法相处。他完全成了个孤家寡人,没有工作,没有朋友,他是无人需要的酒鬼。

这时,他完全糊涂了。1953年4月他在各个饭店里鬼混,遇上谁就和谁一起喝酒,自己也不记得说了些什么。这些情况都一五一十地汇报上去了。人们向他提出警告:这样下去不会有好结果。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抱着无所谓的态度。然而他忘记了:时代不同了,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大人物了……一次,因为和外国人一起酗酒,1953年4月28日被逮捕。

开始审查他的问题。营私舞弊,挥霍公款,滥用职权等等全都揭出来了。此外还揭发他在执行任务时动手打人,在上层搞阴谋,结果有人下狱,有人死亡。

因为瓦西利小施伎俩而进了监狱的阿·阿·诺维科夫将

---

① 国防部长是布尔加宁。

军回到空军……现在所有的人都反对他，没有一个人愿意为他辩护，相反，都在火上浇油……所有的人：从他的副官，参谋长，一切和他不和的将军，以至于国防部长本人都出来“作证”……被控罪行如此之多，十个被告的罪行加在一起，也没有他一个人的多。

军事委员会判处他十一年狱中监禁。他简直不相信这是事实。他写信给政府，满篇失望情绪，承认了一切罪行，然而却进行威胁。他完全忘记：他现在已经什么也不是了……

大家怜悯了他。1954—1955年冬天他生了病，被送进监狱医院，并决定从这里把他转到另一个医院。以后，叫他去“巴尔维哈”疗养院，从疗养院送他回家，到别墅去住。这是1954年12月赫鲁晓夫把我叫去对我说的，那时他正在设法使瓦西利的生活正常化起来。

不幸事出意料。在医院里，他的那些老朋友，那些运动员、踢足球的、做教练的、还有一些格鲁吉亚人，都到医院来看他，大瓶小瓶的酒往医院里带。他的生活又出了轨道，他已经忘记自己的全部诺言，又开始大吵大闹，威胁，要求不可能办到的事……结果他没有从医院回家，而是去到伏拉基米尔监狱。军事委员会的判决继续生效。

我和他的第三个妻子卡比托琳娜·瓦西利耶芙娜去伏拉基米尔监狱看过他。卡比托琳娜真心实意想帮助他。

这次痛苦的探视我永远不能忘记。我们在典狱长的办公室见面。墙上挂着父亲的大幅肖像，这是从前遗留下来的。典狱长坐在照片下他的办公桌前，我们坐在他面前的沙发上。

我们在交谈，典狱长不时地悄悄地瞧着我们；他可能正在吃力地左思右想，想弄清楚眼前发生的事情。

典狱长个子不高，一头金发，脚上穿着打了补丁的旧毡靴。他的办公室光线很暗，十分阴郁，在他面前坐着瓦西利和来自京城的两位身穿华贵皮大衣的夫人……他心情有点紧张，脸上的表情说明他在费力地思索。

瓦西利要求我和卡比托琳娜到一切可能去的地方跑跑或打电话为他的事托人求情，不惜任何代价把他从这里弄出去。他失望已极，自己也不否认这点。他在痛苦地考虑求什么人最好？给什么人写信？他给政府所有成员都写了信，回忆他过去和他们会面的情景，提出保证，请他们相信自己已经认识错误，准备重新做人。

卡比托琳娜是一个勇敢、坚强的女人，对他说：“不要给什么人写信，再忍耐一下，刑期已经快满了，要表现得好一些。”瓦西利马上顶了她：“我求你帮忙，你却劝我不作声地等待！”

后来他告诉我一些可以去找的人的名字。“你自己就可以给任何人写信，”我说。“你亲自写比我去说强得多。”

在这次见面后，他又给我来过几封信，要我去找人，写信说服人家……他甚至于想和中国人取得联系。“他们会帮助我！”他这样说不是没有根据的……我和卡比托琳娜当然什么人也找不到，也没有写什么信……我知道赫鲁晓夫本人正在设法帮助他。

瓦西利在伏拉基米尔监狱一直坐到1960年1月。在1960年1月，赫鲁晓夫又把我叫去。他有个计划（不知是谁替他

想出来的): 建议瓦西利到外地随便什么地方去,不能留在莫斯科,在那里工作,把家属带去,改换一个不惹人注目的姓名。我告诉他: 我想瓦西利不会同意这样做。我一直设法使人们明白: 他的酗酒已经是一种病,他已经不能像一个健康人那样对他的一言一行负责了。然而我未能说服别人。不久尼·谢·赫鲁晓夫召见了瓦西利,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从被捕到这一天已经七年过去了……后来瓦西利说: 赫鲁晓夫像“亲父亲”一样接待了他,他们相互接了吻,两个人都哭了。一切都结束得很美满,瓦西利又在莫斯科住下来。在伏龙芝沿河大街给了他一套房子,在茹可夫卡,离我住的地方不远给他一所别墅。他的将军军衔、党籍(不中断判刑期间的党龄)、退休金、汽车都恢复了,与此同时,发还了他的全部战功勋章。只向他提出一个条件: 找点什么事情做,安安静静,奉公守法,不要去扰乱别人和自己。另外还要求他不去格鲁吉亚,因为瓦西利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要求允许他去那里。

一月、二月、三月,他都住在莫斯科,可是为时不久,他又故态复萌。一些格鲁吉亚人马上就聚集在他的周围,拖他到“阿拉格维”<sup>①</sup> 饭店去喝酒,吹捧他,对他焚香顶礼……他又觉得他是继承王位的太子了……在格鲁吉亚,人们就这样称呼他啊! 应该到那里去住啊! 难道现在住的这套房子还算个房子吗? 难道这也叫家具? 给他用这样的家具,简直使他蒙羞被辱! 去格鲁吉亚会给他在苏胡米修建别墅,他去那儿住,才

---

① “阿拉格维”是一家格鲁吉亚饭店。



适合他的身分嘛！……此外还出现了一个并不年轻的格鲁吉亚女人，她立刻就提出愿意和他结婚，同他一同去苏胡米。

他的儿女都已成年，劝他、恳求他把这些格鲁吉亚人统统赶出去，并且警告他：如果这样下去，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可是他回答说：他自己知道怎么办，用不着他们教训自己的父亲……他又喝了起来，他已经完全不能控制自己，而他的那些狐朋狗友，特别是格鲁吉亚人，还是无情地把他往死里灌。

最后，四月份他终于去吉斯洛伏得斯克“治病”了；他的女儿娜佳陪他去的。她来信说：瓦西利在那里又大喝起来，而且闹得翻天覆地，满城风雨，吵架，打人，恫吓人，威胁人，教训人，吉斯洛伏得斯克全城的人都跑来看他的热闹。又从格鲁吉亚开着汽车来了一些坏蛋要接他去。他没有和他们一起去，可是却不知去向了；过了五天，又出现了，原来他钻到当地一个铁路扳道岔的小屋里，同一个什么扳道岔的女工混了好几天。

他回到莫斯科以后，在家里没住多久。四月底，我们才知道，他又去“继续服刑”了，就是要去服满未服的八年刑期，他是提前释放的，本来是出于宽大为怀，以期他能够开始新的生活……可是现在“请”他坐满自己的刑期，因为恢复自由后，他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样子。

他仍未能服满刑期。1961年春天因为健康状况很坏，把他从列佛尔托夫监狱释放出来。他肝脏有病，胃溃疡，整个身体已经虚弱不堪，因为他一生中都没有吃什么东西，光是往胃里灌伏特加酒。

他重新获得释放,但是附有比较严厉的条件:他可以在他愿意住的地方安居,只是不能在莫斯科,也不能在格鲁吉亚……不知道为什么他选择了喀山,他把一个偶然在医院认识的、护理过他的一个女护士玛莎带走了。

在喀山给他一套只有一个起居间的房子,发给他退休将军的养老金。可是他,无论是从精神上还是从肉体上都已完全不行了。1962年3月19日,他和一些格鲁吉亚人大喝了一顿酒之后,一昼夜没有醒过来,就死去了。尸体解剖之后,发现他的整个机体都酒精中毒了。他仅仅活了四十一岁。

他的第一个妻子所生的一儿一女,和他的唯一的朋友——他的第三个妻子卡比托琳娜参加了他的葬礼。

几乎喀山全城的人都来送葬了……大家惊异地看着他的儿女和卡比托琳娜。可是那个不久前才和瓦西利非法登记结婚的女护士玛莎到处讲,说她是瓦西利一生中“忠实的伴侣”……她几乎没有让两个孩子走近瓦西利的棺木。

在喀山墓地里,至今还有瓦·约·朱加什维利将军的坟墓,墓碑上有玛莎装腔作势地刻上去的字样:“献给我唯一的人”。

## 20

听我给你讲的这没完没了的死亡,我的朋友,你大概已经十分厌倦了……的确,难道就没有一个人能有个平平安安的命运吗?在父亲周围,好像被画上了一个黑圈子,凡是落入这圈子之内的一切人,不是惨死,就是家破人亡,再就是从生活中消失了。

他本人离开人世已经十年了。巴维尔舅舅的寡妻叶芙根尼娅·亚力山得罗芙娜·阿利卢耶娃,雷登斯的遗孀,我母亲的姐姐安娜·谢尔盖耶芙娜·阿利卢耶娃,都已出狱回家。我的同庚表哥,斯瓦尼泽舅舅的儿子也从哥萨克斯坦流放地回来了。千千万万的幸存者都回来了。他们的归来是我们国家的伟大历史性转折——救人于死神之手,其规模之大,是难以想象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我的个人生活,现在也变得较为正常了:难道我以前能够这样自由地生活吗?现在出门不用请示,可以和我愿意来往的任何人来往了。难道我的孩子们在从前能像现在这样不受讨厌的监视,自由地生活吗?大

家都能比较自由地呼吸了，压在一切人头上的沉重的巨石卸掉了。然而，可惜的是，太多的事物还没有什么改变，惰性和传统紧缠着俄罗斯，千百年的积习的力量太强大了。

然而，在俄罗斯有远比丑恶的事物多得多的善美的事物，它是根深蒂固的，也许正是这永恒的善美支持着俄罗斯，保存了她的面貌……

我的保姆亚力山得拉·安德烈耶芙娜一生都和我在一起，在我的身旁。如果不是这个善良的巨大的火炉以不断的恒温暖着我的心，也许我早就精神失常了。所以，我的保姆，或者如我的孩子和我自己所称呼的，我们的“好奶奶”的逝世，实际上是我失去的最亲最爱，也深深爱着我的，和我真正最贴心的第一个亲人。

她于1956年病故，她活过了我的父亲、外祖父、外祖母，等到了我的舅妈、姨妈出狱归来。她比任何人都最配称为我们的家庭成员。在她逝世前一年，我们庆祝了她的七十大寿，这是一个友好、愉快的节日，它把甚至是结了永世冤仇的亲戚都团结在一起了，大家都爱她，她也爱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对她说几句温存的话。

我们的好奶奶远不止是我的保姆，因为她天赋的品质和才能都很高（虽然命运未能使之发展），所以她对教育远远超过一个保姆的职责。

亚力山得拉·安德烈耶芙娜是梁赞省人；她的村庄属于玛丽亚·亚力山得罗芙娜·贝尔女地主的庄园。十三岁的萨

莎<sup>①</sup>就到主人家去做仆人。贝尔和戈林格一家有亲，我的保姆的姨妈安娜·季米特里耶芙娜在戈林格家当仆人，她把普希金的玄孙、玄外孙儿带大，现在她还和他们一起住在甫洛特尼科夫大街的作家大楼里。我的“好奶奶”就在彼得堡的这两家，和这两家的亲戚家做过使女、厨娘、管家，最后当了保姆。她在著名的戏剧评论家、名导演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契·叶夫列因诺夫家工作了很久，给他的儿子做保姆。从当年的照片上看，“好奶奶”是一位漂亮的彼得堡的女佣人，发髻高高地梳在头上，穿着立领的衣服，一点也看不出是从乡下来的人。

她是一位善于思索而聪明的姑娘，所以她看到周围的事情很容易就学会了。她的一些女主人都是自由知识分子，她们不但教会她穿衣服，梳头发，而且教会她读书，向她打开了俄罗斯文学世界。

她不像有教养的人们那样去读书。对她来说，书中的主人公都是活生生的真人，书中所写的一切都是真事。她从来不认为这都是虚构的故事，她从来没有怀疑过，她认为“穷人”<sup>②</sup>是真有其人，就像高尔基的外祖母也都是真人真事一样。

1930年母亲还活着的时候，有一次高尔基到祖巴洛沃看望父亲。我的“好奶奶”站在关着的门的后面，从门缝中向穿衣间里偷看，被伏罗希洛夫看见，抓住她的手把她拖了进去，她向伏罗希洛夫解释道：“我非常想看高尔基一眼。”阿列克

---

① 亚力山得拉的爱称。

② 《穷人》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

塞·马克西莫维奇<sup>①</sup>问她读过他的什么书，当高尔基得知凡是他写的书她几乎全都读过时，感到非常惊讶。“那么，您最喜欢那一本呢？”他问。“您写的那本小说，好像您自己给女人接过生似的。”保姆回答说。确是如此，《出生》最使她赞叹不已……高尔基非常满意，感动地和她握手，她为此一生都感到幸福，以后常常对人谈这件事。

在我们家，她也见到过杰米扬·别得内依<sup>②</sup>，但她并不欣赏他的诗篇，她仅仅说他是“老调皮”<sup>③</sup>……

她在叶夫列因诺夫家一直工作到革命爆发。十月革命后，叶夫列因诺夫一家都去巴黎了，他们极想约她同行，可是她不愿意走。她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在饥馑的二十年死于农村。她不得不在农村住了几年，这时她已无法在农村生活了，她以一个习惯于城市生活的城里人的感情骂农村了。农村对她来说，只有一个字：“脏，脏，脏！”现在她害怕农村的迷信，不文明，没有知识和粗野，虽然乡下的各种活计她样样拿手，而现在她却对此全无兴趣。土地已经不再对她有吸引力，以后她想使“儿子受教育”，为此，她必须到城市里去挣钱。

她到莫斯科来了，她一生都看不起这个城市；她习惯住在彼得堡，她已经永远地爱上了这个城市。我记得1955年我第一次去列宁格勒时，她是多么高兴啊！她告诉我许多街道的名

---

① 高尔基的名和父名。

② 杰米扬·别得内依(1883——1945)，苏联著名诗人，写过尖锐的政治讽刺诗。

③ 指诗人的文笔诙谐。

称,她常去的那家面包店,她住过的地方,她推着小孩车常坐的地方,涅瓦河上她常去“买鲜鱼”的养鱼场。我从列宁格勒给她带回一套列宁格勒的风景画片,上面有街道,马路,河岸等景致。我和她一起欣赏这些画片,她回忆起一切,感慨万分……“可是莫斯科是个村子,比起列宁格勒来不过是个村子,不管它怎么改建,也比不上列宁格勒!”她一再重复地说。

二十年代,她不得不住在莫斯科,开始在萨马林<sup>①</sup>家中当佣人,后来在玛尔金医生家帮工,1926年春天,因为我要出世,我母亲劝她辞了医生家的工作来到我们家。

在我们家里,她只崇拜三个人。首先是我妈妈,虽然她很年轻,只有二十五岁,好奶奶来我家时已经四十一岁了,但是,她非常尊敬妈妈……其次她崇拜布哈林,他是大家都热爱的人,他每年夏天都带着妻子和女儿住在我们祖巴洛沃。我的好奶奶还崇拜我外祖父谢尔盖·雅可夫列耶维奇。母亲在世时,我们家的气氛使她喜欢并感到亲切。

“好奶奶”受过彼得堡的良好的训练和调理;她对家中一切人都处得十分得体,对客人殷勤款待,周到体贴,干活稳妥麻利,从来不过问主人的事情,对他们一律平等相待,从来不允许自己对“上房”的事情和生活说长道短或者妄加批评。她从来不和任何人争吵,口角,十分善于对一切人都做点什么好事;只有我的家庭女教师丽吉娅·乔治耶芙娜才想把“好奶

---

① 伊万·瓦西里也维奇·萨马林(1817—1885),俄国著名演员,扮演过《聪明误》中的查茨基和奥斯特罗夫斯基一系列话剧中的角色。晚期从事教学活动。

奶”赶走。为此,她自己倒了楣。甚至于父亲都很尊敬和器重“好奶奶”。

最初的儿童书籍是“好奶奶”给我读的。她是教我和我的孩子们读书、写字的最初的老师。她有教孩子的非凡的才能,一边玩一边学,愉快而轻松。这大概是她以前从那些朝夕相处的优秀家庭教师那里学来的本领。我还记得她是如何教我算算数的:先用泥做了许多小球,染上各种颜色,一堆堆放好,然后把这些小球一会儿摆在一起,一会儿又分开,这样我们就学会了算术的加、减、乘、除,这是纳塔丽娅·康士坦丁诺芙娜来我家以前的事。以后她送我到洛莫夫家学龄前儿童音乐学习班去学音乐。大概她在这里学到了一些音乐游戏。她天生听力很好。我们坐在一张桌子前,她用手指在桌上敲着某一熟悉的歌曲的节奏,叫我猜是哪支歌曲。然后,我用手指在桌上敲,她猜是什么歌曲。她给我唱了多少的歌啊!唱得那么美妙,那么愉快!她知道多少童话、顺口溜、乡下人的歇后语、俏皮话、民歌和浪漫曲啊!……她能没完没了地讲故事,唱歌,听她讲和唱真是难得的享受。

她的语言丰富……她的俄语说得那么准确,干净,简洁,美丽,现在已经很难听到了……她的那些不知从哪里学来的(也许都是她自编出来的吧)使人愉快的俏皮话和聪明的歇后语,总是和规范的、正确的语言(这毕竟是彼得堡的语言,而不是乡言俚语)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在她去世前不久,有一次她说绕口令:“马凯使十个听差,听差实是个马凯。”<sup>①</sup>……说完,

---

<sup>①</sup> 原文直译是:“从前的马凯有两个听差,现在的马凯自己当了听差。”



自己大笑不止……

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期,那时老克里姆林宫里人很多,到处都是孩子。我的老保姆把我放在小车里推着散步,许多孩子——艾特里·奥尔忠尼启则,梁梁·乌里扬诺娃,多吉克·孟仁斯基,都围在她的身旁,听她讲故事。

命运使她见到了许多世面。最早她住在彼得堡,她熟知她主人们的那个生活圈子。这都是些优秀的艺术家们,如叶夫列因诺夫,特鲁别茨科伊<sup>①</sup>,穆辛—普希金一家<sup>②</sup>,戈林格一家<sup>③</sup>,冯—吉尔维兹,兰谢列<sup>④</sup>等等……有一次我把一本写画家谢罗夫<sup>⑤</sup>的书给她看,她发现书中的许多人她都认识,许多姓名她都熟悉,这些人都是当年彼得堡艺术界知识分子圈子里的人……

在她的头脑里有许多有关他们这些人的故事,谁常去他们的家,他们穿着如何,他们如何常去剧院欣赏夏里亚平<sup>⑥</sup>的歌剧,他们吃什么,怎样教育孩子,男主人和女主人都有些什么浪漫的故事,他们如何偷偷地求她传递情书。

她已经完全掌握了现代的术语,把她以前的主人称为“资

---

① 叶·尼·特鲁别茨科伊(1863—1920),俄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社会活动家,语言学家,哲学、法学博士。

② 穆辛—普希金一家,俄国古老的贵族家族。

③ 戈林格一家——普希金亲戚的后代。

④ 叶·叶·兰谢列(1875—1946),苏联画家,科学院美术院士,1942年斯大林奖金获得者。

⑤ 瓦·亚·谢罗夫(1865—1911),俄国著名画家,肖像画巨匠。

⑥ 费·伊·夏里亚平(1873—1938),俄国伟大的歌唱家。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产者”，然而她讲起这些人时，并无恶意；相反，她常以感激的心情回忆季娜伊达·尼古拉耶芙娜·叶夫列因诺娃或老萨马林。她知道，虽然他们取之于她的甚多，他们也使她看见、知道和了解了许多东西。

以后，命运把她推进了我们的家，推进了当时还多多少少有些民主的克里姆林宫，在这里她认识了另一个圈子，也是“有名望的”圈子，它有着另一些秩序和规矩。后来她提起当年的克里姆林宫时，讲得多么出色啊！她讲过“托洛茨基的女眷”，“布哈林的女眷”，克拉拉·蔡特金，她也讲过台尔曼<sup>①</sup>来时父亲如何在克里姆林宫的寓所接待了他，还有孟仁斯基姐妹，捷尔仁斯基一家等等，天啊！她真是一部活的本世纪的编年史，可惜她把许多有趣的故事都带到坟墓里去了……

母亲死后，家中一切都变了，母亲的精神也很快就被荡除了，她请来的人都被赶走，只有“好奶奶”一人是我们家的坚不可摧的，稳如泰山的堡垒。

她一生都是和孩子们一起度过的，而她本人也像个孩子。她一生性情温和，善良，沉着。她早晨替我收拾，打发我上学，照顾我吃早餐，等我放学归来，照料我吃午饭，我做作业时，她就在隔壁的房里做她自己的事情，然后就安排我去睡觉。她对我有许多亲昵的称呼：“小浆果，小金金，小鸟儿”。我在她的轻吻里入梦，第二天早晨又在她的轻吻中醒来，听见她的轻声呼唤：“小浆果，起来，小鸟儿，起来。”在她愉快而能干的

---

<sup>①</sup> 埃·台尔曼(1886—1944)，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44年8月18日在法西斯集中营里被杀害。

照料下，一天开始了。

她从来不搞宗教那一套或其它假惺惺的事情；年轻的时候，她信奉宗教，后来，她摆脱了宗教仪式和“习俗的”农村的、多半是清规戒律和成见所造成的宗教观念。上帝在她的心中可能还是存在的，虽然她一直强调说不信奉他了。在她去世之前，她还是想做一番忏悔，虽然是在我面前，于是她对我谈了有关母亲的一切事情。

革命前，她也曾有过一个家庭，以后他的丈夫打仗去了，因为农村的饥馑他不愿意再回家了。这时她的心爱的小儿子死了，从此她永远诅咒把他们留在饥饿的农村的丈夫。……后来，丈夫知道她在什么人家帮工，以他纯属农民的狡猾没完没了地写信轰炸她，暗示他想回家，——这时她在莫斯科已经有一套房子，他的大儿子住在那里。但是她态度坚决，非常鄙视她从前的丈夫。“好啊！”她说，“日子不好过，多少年来音信皆无。现在，突然想起我们来了！叫他在那里干想吧！我要叫儿子受教育，没有他也照样过日子。”\*

许多年过去了，她丈夫一直徒劳地试图请她回去，她没有回过信。于是他就教唆他第二个妻子生的两个女儿给她写信，说日子不好过，向她要钱……他的女儿写信来了，还寄来了照片，从照片上看，面孔痴呆，直瞪着两只眼睛。“瞧！生出这种歪嘴斜眼的东西！”她大笑地说。虽然如此，她还是心疼这些

---

\* 我的保姆娘家姓罗曼诺娃，后随丈夫姓贝契科夫。她说：“真倒霉，把一个皇家的姓改成了牲口的姓了。”（译者按：俄文中贝契科夫(娃)是公牛的意思，她娘家和罗曼诺夫王朝的国王同姓。）

“歪嘴斜眼的东西”，给她们定期寄钱。简直没有不向她要钱的亲戚。她死的时候，银行存折只剩下二十卢布(改革前的旧卢布)。她从不攒钱，也没有存款。

“好奶奶”待人接物很有分寸，不卑不亢。父亲喜欢她从不卑躬屈膝，阿谀逢迎，她对任何人都是一样，对“男主人”和“女主人”也是如此。她的这种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因此她从来不去判断此人是否“大人物”，或者考虑他是什么人……只有日月诺夫家里的人称她是“没有文化的老太婆”。所以我想：就是在以前她做过仆人的贵族的家中，她也不会得到这种不礼貌的称呼。

战争期间或更早一些时候，我们家的全部“服务人员”都战时化了，因此也需要给“好奶奶”授予国家保安部“职员”的职称，这是这里的规矩。以前是母亲付给她工资；当军事当局通过了对她的鉴定并推荐为“职员”，授予下士军衔时，她取笑了一阵子。她跑到厨房去对厨师敬礼，并对他说：“得令！”“听您的命令，长官！”等等。她像对待愚蠢的笑话或游戏那样对待这一任命。这些乱七八糟的规矩是与她不相干的，——她生活在我身边，知道自己的职责是什么，至于给她什么鉴定，授予什么级别，是毫不在乎，嗤之以鼻的。她已经把生活看透了，许许多多的变迁都在她的眼前经过了。她认为：“肩章可以今天取下来，明天再给你戴上”，可是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所以，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应该把本职工作做好，爱护孩子，帮助人们活下去。

她生命最后这段时间，总是生病，她有心脏痉挛的毛病。

此外，她又特别胖。当她的体重超过了一百公斤时，为了不影响情绪，从此不再称体重了。虽然如此，她一点也不肯节食，相反，随着时间的增长，她的讲究饮食的习惯已经变成病态的癖好。她能像看小说那样，一页不漏地读菜谱，时而赞叹地说：“是啊！对、对！我在萨马林家里也是这样做雪花冰淇淋的，还在中间放一个盛酒精的小杯子，把酒精点燃，关上灯端到桌子上去！”她在生命最后的两年里住在甫洛特尼科夫大街自己的家中。她常带着小孙女到狗市广场的小花园里散步，阿尔巴特大街的一些领取养老金的人都聚集在她的身旁，象个俱乐部似的。她告诉他们怎么做白菜肉馅烤饼，怎么烤鱼。听她讲得那么津津有味，好象已经饱餐了一顿似的！她对身旁的东西，特别是食品，喜欢用小称，如“小黄瓜”，“小西红柿”，“小面包”，“坐下来，读一读这本小书”，“拿一支小铅笔来”等等。

最后，她是因为好奇爱看热闹病故的。有一天，她在我们别墅里，坐着等看电视，这是她最喜爱的消遣。忽然有人告诉她电视马上要转播吴努来访、伏罗希洛夫在飞机场欢迎他的实况。“好奶奶”非常好奇，想看看吴努是个什么样的人，此外，她也想看看伏罗希洛夫，她说看看他“是否已经很老了”，于是她从隔壁房间飞快地跑了出来，忘记她已经上了年纪，人也太胖，心脏不好，腿脚有病等等。她一脚绊在门槛上，跌倒了，把一支胳膊跌伤，受了惊吓……最后的病就是这样开始的。

她死前两周我见过她，她很想吃“新新鲜鲜的小鲈鱼”，要我给她弄一条来。以后我就走了，二月四日她的孙女给我打

来了电话，一面哭，一面说：“奶奶叫我去开小气窗，我只走开一分钟，等我回过身来，她已经断气了！”

一种非常绝望的、奇怪的感情支配着我……我在想，我的亲人都一一下世，我已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应当对死亡已经习惯了，可是不然，我非常痛苦，好像我的心被割掉了一块。

我和她的儿子商量了一下，决定一定要把“好奶奶”葬在新处女墓母亲的坟旁。可是怎么办呢？\*有人把莫斯科市苏维埃和市委首长们的电话号码给了我，但是，给他们打电话是不可能的，加上我怎么向他们解释“好奶奶”是什么人呢？后来我就拼命给伏罗希洛夫的夫人打电话，告诉她我的保姆去世了。大家都知道“好奶奶”，很尊敬她。伏罗希洛夫马上亲自接了电话，也很伤心，很难过……他说：“当然，当然，只能把她葬在那里。我跟他们去说，一切都会办好的。”

于是，我们把她安葬在母亲的坟旁。每个人都哭了，和她吻别，我吻了她的额和手，没有对死人的那种恐怖和不愉快之感，我的感情中只有深切的悲伤和对于在这人世间我最亲最亲的人的温柔依恋。她也离开我仙逝了。

现在，我一面写，一面流泪。我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好奶奶”对我意味着什么吗？我现在非常难过。“好奶奶”是一棵慷慨的、粗壮的生命之树，它繁叶满枝，众鸟在这里栖息，它受着雨水的洗濯，在阳光下灿烂辉煌，它是一株永生之树<sup>①</sup>，不

---

\* 新处女墓被认为是“政府成员”的墓地，因此要葬在这里必须经过高级机关的批准。

① 《圣经》上说有一棵火烧不死的灌木，称之为“永生之树”。

朽之树，尽管狂风暴雨不断袭击着它，要把它摧毁，它依然繁花似锦，结实累累……

她，我的“好奶奶”已不在人间，然而她那愉快、善良的性格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在我和孩子的心上她是我们的  
一家之长，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她给我们的温暖。凡是知道她  
的人，难道能够忘却她吗？难道能够忘掉善行吗？

---

永远不要忘掉善。凡是经历了战争、集中营（德国人的和我们的）、监狱（沙皇的和我们的），看见过二十世纪给我们降下的一切苦难的人们，他们不会忘记童年时代那些善良、亲切的面容，那块小小的阳光灿烂的角落。不管心灵受了多少苦难，以后它可以一生在这里悄悄地休息。如果一个人连一块心灵能够赖以休息的地方都没有，那就太悲惨了……就是心肠最冷酷、最残忍的人，他也会在他那罪恶的心灵深处，不为外人知晓地保存着一块童年回忆的角落，小小的一束“阳光”。

善终究会胜利。

善会战胜一切，唉！虽然常常为时过晚，那些被赋予美化我们大地使命的善良而优秀的人们都已经不公正地、不可思议地、无声无息地死去了，这是为什么呢……

---

我给你写的信，我亲爱的朋友，我想到此结束。

感谢你的坚持，否则，我一个人是无力搬动一下这样的重负的。现在，当我从身上卸下了这一不堪忍受的重担时，我觉得是如此轻松，就好像我久久地扒着峭壁悬崖攀登高山，最后

终于达到了顶峰。此时此刻，群山在我的脚下，四周是起伏的山峦，峡谷中的河水波光闪耀，在这上面是明亮的蓝天，平静而安详。

谢谢你，我的朋友！

你也做了另一件事情。你使我重温了过去的一切，得以和我那早已辞世的至亲好友重逢……你使我挣扎于一种矛盾而又十分困难的感情之中，费力地去思考它，这是我对父亲的感情中从来感受到的东西：爱他，怕他，不了解他，同时责备他。

这一切又重新从四面八方向我袭来，甚至我想：和这些向我紧紧围上来的影子、幽灵去交谈，我已经没有力量了。

但是，和他们重逢是多么甜蜜。然而从这场大梦中醒来又是多么可怕——我真想再听一听他们的声音，然而他们突然沉默了，消失了。

这都是些多么优秀的人啊！性格如此纯真，满腔热血，多么富于浪漫主义的理想主义，连同他们自己一同被带进了坟墓，他们是早期革命的骑士，赞美革命的歌手，为革命而献身者，令人赞叹的苦行僧，革命的殉难者……

至于那些想置身于革命之上的人，那些想加快革命的到來，想在今天就可以看见明日才能取得的成果的人，那些想用恶的手段和方法达到善的人，想使时间和进步的车轮转得飞快的人，他们达到预期的目的了吗？

千百万的人毫无意义地牺牲了，成千累万的天才、智慧的明灯过早地泯灭了，这不但是二十封信容纳不下的，而且二



十本厚厚的书也写不完的；如果让这些人活在世上，为人民服务，而不仅仅是在人类的心灵上留下“以命偿命”的痕迹，那不是更好吗？

历史的审判是严峻的！它会弄清楚：谁是为善而献身的英雄，谁是追求虚荣和空名之辈。这不是我能判断的。我没有这种权利。

我有的只是良心。良心告诉我说：如果你没有在自己身上看见大错误，那么就不要再硬指出别人身上有小毛病，……我们对每件事都应该负责任。

让那些后来者去裁判吧！他们未曾经历过我们的时代，不认识我们所了解的人们。让那些意气风发的青年人来做这件事吧，对他们来说，我们所经历的年代就像伊凡雷帝统治时期那样遥远，那样不可理解，甚至是离奇和可怕的……

很难说，他们会称我们的时代为“进步的”时代，也很难说，他们会说我们的时代是为“伟大的俄罗斯造福”的时代，很难说……

最后，他们将说出自己的新的语言——真正新的，目光远大的语言，不发牢骚，不是哀诉。

他们将会这样做的，他们将以痛苦、悔悟、困惑不解的、沉痛的心情翻过我们国家历史的这一页，这种感情将促使他们过另一种生活。

只是请他们永远不要忘记：善是永恒的，它活在并且点滴地积存在人们的心灵中，甚至是存在于人们从来都认为它不存在的地方，而且从来没有死灭和消失……

每个活着的，呼吸着的，跳动着的，发着光的，开着花的，  
结着果的，都为着善和理智而生存，都以善和理智的名义而生  
存于我们亲爱的、灾难深重的大地上。

1963年7月16日—8月20日

于茹科夫卡



## 译 后 记

斯维特兰娜·约瑟夫娜·阿利卢耶娃是斯大林的女儿，生于1926年。1943年，遵循父亲的意见，中学毕业后考入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毕业后，1952年进苏联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作研究生，毕业后，在莫斯科大学任教。1962年后，在莫斯科外文书籍出版社作翻译工作。

1962年在莫斯科俄国东正教教堂受洗礼，皈依宗教。1963年写了本书。

1964年她和印度共产党党员布拉杰什·辛格同居，当时布拉杰什已五十七岁，他出身于著名的辛格家族。1966年布拉杰什重病，苏联当局不准他离苏就医，10月病故于莫斯科。12月斯维特兰娜护送布拉杰什骨灰去印度安葬，在他的故乡小住后，决定去美国。她离开印度，先去意大利，后到日内瓦，六个月后抵美。1967年发表本书于纽约，次年又写了另一本书，名《一年间》。两书出版后，因涉及许多苏联内幕，1969年12月1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剥夺她的公民权。

1970年4月，她和美国人威廉·彼得斯结婚。彼得斯是建筑师，次年生了一个女儿奥尔加。据说因为彼得斯不适合于过家庭生活，他们于1973年5月离婚。现在母女两人住在美国，从丈夫姓彼得斯，1978年底取得美国国籍。她原来的两个孩子约瑟夫·莫罗佐夫和塔琪扬娜·日丹诺娃仍在苏联。

斯维特兰娜在斯大林身边长大，她目睹了苏联二十年间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在这过程中，她失去了所有的亲人。斯大林去世后，在肃清“个人崇拜”运动中，她又处境困难，所以思想上十分空虚，对现实感到失望，终于皈依宗教。

本书虽然只是从范围不大的生活方面反映了斯大林和苏联在这些年中所经历的重大事变的一些侧面，但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值得一读。

本书原版为俄文，1967 年在美国由“纽约哈伯和罗图书出版社”出版，我是根据这个版本译出的。

译完本书后，有人对我说：如果对子女教育不好，就会出现斯维特兰娜这样的人。我想：问题要复杂得多，无论是斯维特兰娜，还是瓦西利，都是苏联整个一个时代的产物，也是它的畸形儿。但是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可能在这短短的《后记》里用几句话就说得清楚。

书中的某些观点是不能同意的，但是，这些问题最好交给读者去思考和判断。

我没有提笔已十多年了，加以给我的时间又十分短促，来不及推敲和润色，请读者和我的朋友们给以指正。

在翻译过程中，参看了王作民同志从英文版翻译的译本，得到外文出版局、人民日报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同志们的帮助，他们给我找到了原文，提供了图片和资料，并帮我做了许多技术性工作，特此致谢。

译 者

一九七九年九月三日于北京